

2004年2月號

# 批判與再造 4

## 反全球化運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 阿任可莎多·布佳林 (Aleksandr Buzgalin)  
訪問薩米爾·阿明 (Samir Amin)

譯■鄭國棟

## 反全球化運動的特徵及其在911事件後的發展

■權偉太 / 王宏偉

# 批判·進步·解放

### 走出憂傷的深谷

>> 訪RCA梁台英女士

### 逆旅劬勞

>> 外籍勞工在台灣

### 充滿歧視的廣告

### 美利堅帝國的吹鼓手們

>> 美國新保守主義評介

評《全球化陷阱—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

### 當前中國工人階級狀況

葉紀東談——**我所認識的謝雪紅**

【追憶終戰前後的恐怖歲月】

### 霜降 (四)

>> 顏世鴻的回憶錄

### 蒙面叢林 (完)

>> 探訪墨西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

# 紅色熱血的青春與白色恐怖的年代

## 知識分子的歷史見證

### ——台灣民主運動紀實文集

《葉榮鐘全集》收錄葉榮鐘對日治時期社會運動的紀錄，及長年的散文、雜文作品，是知識份子對歷史的見證。葉榮鐘所觀照的各個層面，在在顯示身為歷史記述者的犀利議論與深度觀察。也展示出台灣歷史文化各時期的豐富面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獻。

#### 《葉榮鐘全集》書目：

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下)

NT：650元

台灣人物群像

NT：420元

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

NT：380元

半壁書齋隨筆(上)

NT：400元

半壁書齋隨筆(下)

NT：350元

少奇吟草

NT：270元

葉榮鐘日記(上、下)

NT：850(上下冊不分售)

葉榮鐘早年文集

NT：390元

近代台灣金融經濟發展史

NT：320元

葉榮鐘年表

NT：200元

---

## 大時代的社會運動紀錄

### ——藍博洲五〇年代的台灣社會運動報導

藍博洲長久從事台灣民眾史的探訪與報導寫作，全面呈現出五〇年代，當時台灣社會運動紀錄。《天未亮》、《麥浪歌詠隊》，二書整理了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始末，並採訪當時目擊事件發展或身陷其中的見證人，試圖釐清一段在過去隱約呈現的台灣歷史。《紅色客家人》則述說台灣客家人投入改革的情形，也呈現出一九四〇、五〇年代的台灣政治風貌。這三本書透過藍博洲一針見血對於白色恐怖的紀實報導，使讀者得以了解那段被人們湮滅與刻意遺忘的歷史的真實面貌。

#### 書目：

1. 《天未亮：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師院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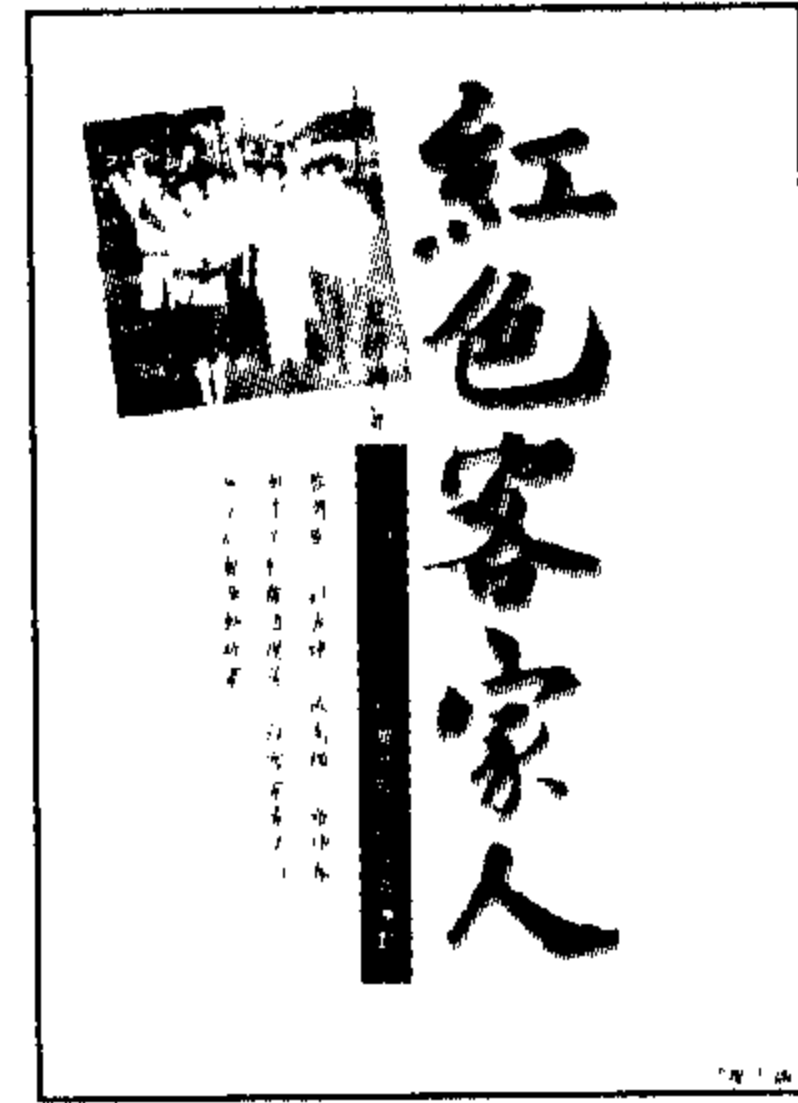
NT：380元

2. 《麥浪歌詠隊：追憶一九四九年四六事件(台大部分)》

NT：380元

3. 《紅色客家人》

NT：380元



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ADD: 407 台中市工業區30路1號 // TEL: 04-23595820

FAX: 04-23597123 // E-mail: bluehan@morning-star.com.tw

http://www.morning-star.com.tw

## >> 全球化批判

- 01 反全球化運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阿任可莎多·布佳林 (Aleksandr Buzgalin)  
訪問薩米爾·阿明 (Samir Amin)  
譯■鄭國棟 / 圖■苦勞網 提供

- 11 反全球化運動的特徵  
及其在911事件後的發展**  
文■權偉太 / 王宏偉 / 圖■苦勞網 提供

## >> 社會現場

- 【RCA職工系列專訪之三】  
**18 走出憂傷的深谷**  
——訪RCA梁台英女士  
訪問■杜繼平 / 整理■林芳如

- 21 逆旅劬勞**  
——外籍勞工在台灣  
文■陳信行 / 圖■黃子明

- 25 充滿歧視的廣告**  
文■劉文超 / 圖■黃子明

## >> 帝國主義批判

- 27 美利堅帝國的吹鼓手們**  
——美國新保守主義評介  
■汪立峽

## >> 書評

- 33 評《全球化陷阱——  
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  
■金寶瑜

## >> 大陸形勢

- 37 當前中國工人階級狀況**  
■劉實 (原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

## >> 歷史檔案

- 41 葉紀東談——我所認識的謝雪紅**  
訪問整理■葉芸芸

## 【追憶終戰前後的恐怖歲月】

- 46 霜降 (四)**  
——顏世鴻的回憶錄  
著■顏世鴻 / 編註■藍博洲

## >> 文化廣場

- 57 蒙面叢林 (完)**  
——探訪墨西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  
■吳音寧

發行人 范振國  
社長 黃德北  
總編輯 杜繼平  
執行編輯 陳乃慈 宋文揚

發行所 批判與再造雜誌社  
社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84巷12號  
編輯部 台北縣新店市德正街27巷29弄  
60號3樓  
電話 (02) 8914-7520  
傳真 (02) 8914-7520  
電子信箱 critra99@yahoo.com.tw

北市建商商號092字第255400號

## 歡迎捐款贊助

郵政劃撥帳號：19803670  
帳戶：批判與再造雜誌社

零售	90元 / 本	
訂閱	台灣地區 (一般訂戶)	一年 1,000元
	(榮譽訂戶)	5,000元
	歐美地區	一年 50美元
	大陸、港、澳地區	一年 40美元
	亞洲地區	一年 45美元
【美金支票請寫明 Pay to Huang Te-Pei】		

# 反全球化運動的 過去、現在與未來

譯 ■ 鄭國棟

圖 ■ 苦勞網 提供

阿任可莎多·布佳林 (Aleksandr Buzgalin) 訪問薩米爾·阿明 (Samir Amin)

二十多年來，在美國主導的資本全球化肆虐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矛盾日甚一日的加深，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運動隨之風起雲湧，大有湯湯洪水方割的波瀾壯闊之勢，呈現了反體系運動洶湧澎湃的巨大潛力。但在可喜的局面下，仍有隱憂，如：缺乏全球的總體戰略、觀點分歧、組織渙散、甚至利益衝突等等，因而取代資本主義體系的具體方案尚未見成形，換言之，仍處於破而未立的階段。要從大破走向大立，當然需要經過一段艱苦漫長的歷程，非一朝一夕所可為功，但從戰鬥過程中不斷累積經驗，總結成敗得失，建立理論，規劃取代方案，則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不二法門。在全世界的反全球化運動中，成立於2001年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是個重要的全球組織，每年約集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團體聚會討論策略、組織等問題。在2003年一月的「世界社會論壇」年會上，世界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阿明 (Samir Amin) 接受布佳林 (Aleksandr Buzgalin) 的訪問，從500年來資本主義向全球擴張的歷史論述了反全球化運動的意義，總結了反全球化運動的得失，並提出未來發展的策略，很有助於我們瞭解反全球化運動。關於反全球化運動的方向、戰略及組織方式，歷來頗有爭論，本刊日後將經常刊載相關文章，共同推進反全球化運動，探索邁向社會主義的途徑。「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有志者，盍興乎來！ ■ □ 編者



「世界社會論壇」第四次大會今年一月在印度舉行，此為開幕前大遊行。

##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不變的特性

■：如果想要了解「反全球化」（或者，用我們比較喜歡說的詞「另類全球化」），就必須從定義著手。定義就意味划定界線。我們的「反全球化」，或是「另類全球化」運動不同於十九與二十世紀的傳統反對運動，其意義何在？這個新運動的主要新原則為何？它們的本質矛盾是什麼？還有一個問題，很重要的問題，即：左派政黨與「反全球化」運動的關聯是什麼？這些問題並無新意，但非常重要。

□：我先從我對資本主義長期擴張史的看法談起，資本主義的發展始終是朝向全球擴張的，或者說總是以全球擴張為目標的，然後再試著指明資本主義擴張的每個主要階段的特性。我認為，不用提醒，大家都知道，馬克思從很早以前，在《共產黨宣言》就指出：資本主義是向全球擴張的，因而社會主義革命不管怎樣（但未論及細節）也必須要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所以，對我們這些馬克思主義者或以馬克思主義

為基礎的人來說，過去二十年間突然冒出來的所謂全球化的論調，當然不是什麼新鮮事。

但我所論不僅止於此。我要說的是，資本主義五百年的擴張史從一開始就是帝國主義性質的，帝國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的一個階段（不論是最後的或不是最後的），而是不變的特性，是資本主義擴張的持續狀態。我的意思是，資本主義的擴張從一開始就造成兩極分化，也就是加深它的中心與外圍之間的不平等。如果落後是指外圍可以趕上並且變得與中心一模一樣，那麼兩極分化就不是因為有些國家處於落後狀態的產物，兩極化一直是發達的中心國家同時運用經濟與政治手段造成的，發達與落後是一體的兩面，兩者無法分割。所以從資本主義向全球擴張之日起，從重商主義時期與當時的大西洋歐洲把美洲設置為其外圍，到十九世紀亞洲和非洲淪為殖民地，亞非被塑造為歐洲資本主義中心的外圍，帝國主義都是資本主義

持續不變的特性。

但同時，“帝國主義”的特性始終是“多數的共生結合”（這對現在和未來都是問題）。也就是說，不是“帝國主義”而是“帝國主義各中心國家”在不斷發生衝突，在某些時刻衝突還極其暴烈。不斷的衝突並非為了霸權，而是為了分配與再分配全球體系的利益。資本主義擴張的歷史就是持續戰爭的歷史，絕不是像誇張不實的論述所說的那樣是市場與民主和平擴張的歷史。在某個時刻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衝突成了世界舞台的主戲，拿比較近的時期來說就是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此而論，資本主義的擴張史一直都是戰爭的歷史。

我們審視一下帝國主義在前一階段（即從十九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中葉）是怎麼決定了中心與外圍的劃分，就可以發現中心與外圍之別幾乎就等同於工業化與未工業化的地區、國家、區域之分。那些未工業化的地方，不論是正式的殖民地或如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所說的半殖民地、被支配國家，在政治上也被置於下屬的地位。那種型態的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式的資本主義擴張，兩者是不可分割的，當然會遭到反擊。反擊的力量基本上出現在資本主義體系的外圍地區，或者也不妨稱之為半外圍地區。俄國在一九一四年到底該定位成什麼樣的國家呢？一個半外圍的國家，但已經朝向工業化發展，有了全國與地方的資產階級等等。它的社會結構形態是複雜的……。

## 上一階段的反全球化運動的特點與侷限

■：俄國也有殖民地，所以俄國具有兩重性……。

□：是的。所以，資本主義體系遭到名為社會主義的反擊。兩個顯例是俄國與稍後的中國。這些政治勢力以馬克思主義、以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為旗幟，得到工人階級強力的支持，但它們得以勝利還得歸功於它們能夠組成龐大的政治“人民聯盟”（特別是與農民），這點在俄國的例子中很清楚，在中國的情況就更其明顯了。（這些以社會主義為名的社會在革命後怎麼演變，此處姑且不論）但在俄國（其後的蘇聯，俄羅斯帝國變成了蘇維埃聯邦）與中國發生的事實上是場混雜的革命。之所以說混雜是因為這場革命既含有共產主義理想國（具體的理想國）的成份，又含有一個落後國家，一個外圍或半外圍國家志在趕上中心國家的成份。列寧所說的：「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電氣化。」確實一語道出這場革命的混雜性質。“電氣化”是為了“趕上”，而“蘇維埃”則意指用紮根於人民而不是資產階級的另一套政治制度來達到“趕上”的目的。後來我們便看到“電氣化”佔了上風而“蘇維埃”卻空有其名。

時隔未久，二次大戰後，在亞洲與非洲也爆發了民族解放運動，反抗前一階段帝國主義全球化所造成的未工業化、落後等等惡果。那些民族解放運動的綱領與“電氣化加某物”相去不遠，即“電氣化加民族人民體制”，這與蘇維埃模式屬同一類型，只是經過稀釋，遠不那麼激進，有時是一點兒也不激進，有時則是半調子……。在拉丁美洲則採取不同的形式，因為拉丁美洲在形式上並沒有被殖民，拉丁美洲是在十九世紀就與美國一道贏得了獨立；在拉丁美洲實行的是“發展戰略”，即在發展的同時又為一種含混不清的人民



為所有人爭取有尊嚴的工作！

民主體制奠立了基礎。

以上就是人民對付上一階段帝國主義全球化的挑戰方式。為了達成反帝國主義全球化的目的，人民創造了各種鬥爭與組織形式。它們組織了高度集中、統一，很能動員民眾起來行動的工人（或所謂工人）的政黨（俄國的布爾雪維克黨的模式對此產生了一些影響，但更早期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也有作用）。他們也建立了工會、農民的政黨與組織。他們創建了許多種反抗形式，他們聯合各種不同的民族、族群、宗教團體、階級等等，形成了民族解放的統一戰線，或多或少產生了成效。

■：順便一提，比較一下上一階段的反全球化運動與民族解放陣線是頗有趣的。

□：是的，它們系出同源。它們也創造了與其組織形式相符的有效行動方式，包括所謂的和平罷工、示威，而只要選舉不是太過於造假或沒有意義，有時也會參與選舉，但它們也進行戰爭、打游擊、起義、革命……，所有這些形式都發揮了作用。

從二十世紀七〇年代初或七〇年代中期開始到二十世紀末期這三十年間，所有抗拒上一波全球化的形式都逐漸碰到了歷史的侷限。它們並非毫無成就，也不是不理性或者愚蠢，即使它們有許多不民主的地方（但民主畢竟在人類歷史中是非常晚期才出現的東西）。它們言而有信，履行了承諾因而具有正當性；它們確實向前追趕了中心國家，雖然有些緩慢，它們確實也在資本的權力之外，為其他型態的權力建立了基礎。它們在社會進步、教育、健康等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就此而論，蘇維埃模式有其可稱道之處：雖然沒有民主，蘇維埃制度在教育上的成果卻比資本主義的發達國家好得多。它們促成了社會的進步，即使是亞洲與非洲的民族主義民粹政權也有很大的成就。我僅舉個數據為例來說明，一九六一年我訪問了前比利時的殖民地剛果共和國，當時剛果剛剛獨立，在歷經比利時一世紀的所謂教化、所謂“開化”殖民之後，只有九個剛果人受

過大學教育，而三十年之內，在非洲（可能也是全世界）最醜惡的莫布杜政府統治下卻有數以萬計的剛果人唸完大學，所以，這個成就可謂巨大。諸如此類的例子所在多有。但正因為它們頗有建樹，它們所賴以成立的矛盾卻愈益加深、擴大，它們終於碰到了極限。在達到極限之際，便帶著或多或少的擾攘不安，逐漸壞蝕，甚至陷入泥淖，僵滯不前，蘇聯的狀況是紛紛擾擾，亂成一團，其他的情況，像中國則是從內部腐蝕起，走向了資本主義，但中央政府仍牢牢掌控了資本主義化的進程。在第三世界國家則由民族的民粹主義轉變為新的買辦政權。當上一波反全球化的各種形式碰到歷史的侷限時，只要它們不再能踐履反抗資本主義擴張的全球化，就會腐蝕地愈來愈厲害，從而喪失其信譽與正當性。這就為全球資本主義的進犯創造了條件，導致蘇聯模式的崩潰，中國的演變，民族—民粹體制的坍塌，並按照中心國家資本主義進一步擴張的邏輯重新改造世界。

## 中心國家的根本變化

但現在我們得探究今天中心國家的資本主義是什麼狀況？它在質上已和五十年前不同。這種質上的差異，大部分的文章都強調技術革命及其應用等等，但從根本上發生變化的其實與勞動的組合形式、資本的形式、勞動的形式密切相關。前此的工業組織型態已逐漸汰換，新的工業組織型態與組合勞動過程的新方式正冒出頭來，當然，這意味前此的勞動組合方式日益失效了。新舊之間的交替也不是一蹴可及的，人無法在二十四小時內就創造出新的方式，須有相當的一段時間來累積經

驗、進行鬥爭，如此等等才能形成新的勞動組合方式。過去的工會與政黨不是由一群知識份子憑空建立起來的，好像一群知識份子發表一些聲明，第二天人民就依照他們規劃的路線組織起來了。現在也是一樣。因此，我們所處的這個時期的特點是：四分五裂，各方人馬力圖創造出新的形式。鬥爭持續不懈，但各是其是，人員渙散，組織鬆垮，不知戰略目標為何等等。這種狀態就使主動權依然操在資本的手裡，反全球化的鬥爭為因應資本的新挑戰而有所調整，但還沒有強大到足以迫使另一方，即資本，也有所調整。這是個很根本的變化。

另一個根本的變化是，帝國主義朝向我所說的“三合一的集體帝國主義”發展，即美國（加上它外部的分支加拿大）、歐洲（我現在不知這該把它的邊界劃在哪兒，該不該把波蘭也包括在內）與日本。二戰後，它們聚攏在一塊兒，簡單的解釋是，它們面臨共同的危險、共同的敵人——蘇聯與共產主義的挑戰。這是可以理解的，全世界的資產階級聯合起來防止革命烽火四起，或者蘇聯的入侵（雖然我認為沒有蘇聯入侵的危險）。但現在蘇聯已冰消瓦解了，它們為何還抱成一團？我們可以看到它們還藉由充當管治全球經濟與政治的機構結成團伙。管治全球經濟的工具，即管治集體帝國主義的經濟、帝國主義的全球化的工具，基本上是七國高峰會（是G-7，即使俄國想晉身為其中一員，以形成八國高峰會或“七又二分之一高峰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世界銀行的重要性不像一般人說的那麼大，我認為它有點像在幹宣傳部門的事，主要是製造華而不實的論調，但



IMF就重要了)與世界貿易組織。在政治層面，就是由美國帶頭的軍事聯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我們還可加上另一個美日軍事同盟。這就是新的集團帝國主義。

### “三合一”集體帝國主義的矛盾

由此而引發了一系列的重要問題：為什麼集體帝國主義是這樣？它穩定嗎？它們之間不再有矛盾嗎？如果有矛盾，那些矛盾的現狀又是什麼？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矛盾？我認為是有矛盾且會長期存在著，矛盾會持續是因為事情已經變化了，我剛剛提過勞動的狀況有所變化，但資本亦然，資本的集中程度已不同以往了。結果，現在主要的跨國資本的公司為了有效率必須進軍全球市場。這是新生事物——資本的積聚與集中程度遠高於希法亭(Hilferding)、霍布森與其後的列寧所分析的壟斷資本時代的資本集中水平，在那個時代，他們的分析是正確的，但我們今天已遠遠超過那個年代。資本的高度集中使得管治全球化成為跨國資本的共同利益，使它們滋生了利害與共之感。這就是在經濟上用新自由主義模式，而在政治上用軍事聯盟模式來管治全球化的基礎所在。

但正因為這樣，美國現身成了要角。就像任何資本主義體系，這個體系需要國家，而任何其他的社會體系可能也都需要國家。這個體系不能單單只由它的經濟與經濟學的邏輯治理。資本主義需要國家是因為資本家的利益像在叢林中相互競爭，需要一個最少能使競爭不致失序的共同服從的權威，這就是國家。但在集體帝國主義的層次上並沒有國家，沒有一個涵蓋美

國、歐洲、日本的單一國家，由於許多顯而易見的原因，在可見的未來這個問題大概也不會提到議程上來。即使歐洲有組織歐洲聯邦與歐洲整合的規劃，要創建一個共同的政治體系（即使不是成為一個國家，甚至不是鬆散的邦聯）也困難重重。歐洲尚且如此，三合一的美歐日集體帝國主義就更是難上加難了。不共組為一個國家又怎麼共同治理新自由主義下的全球化，這對它們來說是個難題。此外，這還使矛盾更加尖銳，“三合一”和資本主義中心國家的各個不同夥伴的政治文化與政治發展的可能性差異很大。例如，在歐洲，至少在歐洲大陸，由於諸多原因，長期以來具有我們姑且稱之為“社會主義”與工人政黨、社會民主黨的傳統。所以，用新自由主義的模式來治理歐洲本身不容易被接受，而且在歐洲本身會有愈來愈多數的人越來越不接受新自由主義。這對管治全球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體系正構成重大的難題。這是當前矛盾的重要方面之一，而且正日益深化。

### 美國用武力彌補經濟的弱勢

如今，美國在這樣的情勢下所幹的事兒就是佔居它的同夥歐洲與日本的上風，利用在軍事上的相對優勢想強自充當領導者，不僅是領導者而是霸主，就像在蘇維埃體系裡“小兄弟們”的“老大哥”。美國是個國家而歐洲不是，美國特別是為了與蘇聯競爭已經發展出極危險的毀滅性能力，如核子與其他武器，這些都是事實，因而它可以躍為代表“三合一”集團執行國家職能的國家，但這個國家首先當然是支持美國本身利益的，我是指不公平且是非常不公平地分享大餅。這樣就使矛盾日



印度婦女爭取女權。

益加深。常被提到的事情之一是：美國不僅有軍事優勢，加上它們是個國家，而且是個大國，此外還有其他優勢。有時，有人會說到美國的文化優勢，對我來說，那看來並不很重要，但也有人說美國在經濟上是“三合一”集團的龍頭，這就完全背離事實了。你調查一下美國經濟所有生產部門的產業，不論是傳統部門，這些部門是前一階段經濟增長的基礎（福特式工業、化學工業等）或所有與傳統部門配合的基本工業（冶金工業等），或輕工業（紡織業與其他），甚至與現代技術（信息學、遺傳學）有關的工業，你就會發現在所有那些產業，美國的輸出貿易都有越來越大的赤字，可能在信息科技與遺傳工程方面赤字要少一些，但其他的所有產業則非常明顯，這意味它們越來越沒有競爭力，在現代工業、現代部門競爭不過歐洲與日本；在紡織或普通工業則競爭不過中國與我不確知的其他國家，像巴西。那就是說，美國的經濟真的很虛弱。這樣的結

果就反映在國際收支帳上，也反映在美國經濟之得以苟延殘喘是拜國外不斷流入的資本所賜，這些外資基本上來自歐洲與日本，但也有從第三世界國家通過外債與許多其他途徑流入美國的。頗令人想一探究竟的是，這是帝國主義的一個新特點，以前帝國主義的中心國家輸出资本，現在則倒過來了。美國處於高度寄生的狀態。檢視它的國民收入帳，美國的國民儲蓄是零，甚至負數。也就是說，美國的所有投資加上所有鉅額的軍備支出都是由世界其他國家資助的。那是個極為易脆、軟弱的狀態而不是強大。正是因為脆弱，美國當權的統治階級才會走向窮兵黷武。也就是說，他們無法用競爭的實力達成的，就會訴諸戰爭來解決，即為了他們的利益對全球實施直接的軍事控制。這樣他們才能轉虧為盈，才能彌補經濟上的弱勢。

所以，在討論我們自己的戰略之前，必須分析敵人的戰略。敵人的戰略就是軍國主義，置全球於軍事控制之下以補其經

濟弱勢之不足。這不僅必然要激起人民的反抗、人民的反應，當然，特別是受害者會起而反制，這也會深化與他們的同夥之間的矛盾，特別是歐洲人，歐洲統合的準則是：“我們的競爭力與美國人旗鼓相當，甚且猶勝一籌，那們我們便該受到尊重。”美國的軍事控制會完全摧毀歐洲的規劃。這就是美國之所以選擇中東地區與中亞的原因。有兩個理由：一、直接完全控制石油，不僅是阿拉伯與伊朗的油，也包括中亞、裡海等地，以對歐洲施加壓力，使歐洲淪為附庸，從而削弱其競爭能力；再者，也出於地緣戰略、地理學的考慮，因為從這些地區他們可擊中俄國、中國與印度這些大國境內的目標，也可擊中伊朗、巴基斯坦、敘利亞等國，但基本上是以大國為目標。這就是敵人的戰略。

## 美國的全球戰略與希特勒的本質雷同

現在，看看我們這一邊，我要說的是所謂的“反全球化”運動，實際上他們是“反全球化”的第一步，因為通常鬥爭是從反對當前正在進行的事物，並說：“我們不要！”開始，而沒有提出正面的另類選項。因此，既然他們是拒絕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醜惡的社會後果的運動，它們就是“反全球化”的運動。看看在巴西阿列格里港（Porto Alegre）舉行的第一次「世界社會論壇」，一大堆個人與大大小小的運動團體聚在一起，幾乎全是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大會的共同內容就是：新自由主義正導致社會退化，有張非常醜惡的“社會臉孔”，我們不要它，僅此而已。這是場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強烈抗議運動，運動從那樣的方式開始是正常的。但看看這次的第三次「世界社會論壇」，已有長足的進展。

第一，因為美國的黷武戰略這時已經明白可見了。美國的黷武戰略並不是「9·11」之後（因而，甚至也不是在「第一次世界社會論壇」之後）才開始規劃的，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初期已著手。而且在八〇年代末期，戈巴契夫會搞垮蘇聯的跡象已露之際，就已明確表述過了，但當時人們尚未察覺美國在軍事方面的野心，或者不夠重視美國軍國主義的重要性。現在，在第三次的「世界社會論壇」大會上，他們已完全了解了。此所以會有大規模的示威反對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戰爭。

■：順便提一下，在義大利的佛羅倫斯有一百萬人反戰……。

□：是的。這不僅因為人們喜愛和平。他們是愛和平，那並不壞，但這次運動起而反對的是我所說的“美國製造的戰爭”，也就是說，戰爭是經過策劃，在華盛頓決定的，根據一整套控制全球的戰略計畫，先在那個區域發動，但接著又向前推進。那是用希特勒征服世界的眼光制訂出來的戰略，兩者並無不同。

我們也可以繼續比較這兩個國家：德國曾是重要的工業國，但不是最強的工業國，正是為了彌補經濟的弱勢，希特勒才發動戰爭：“我們會征服歐洲，我們會征服俄國，我們會從烏克蘭的奴隸手中拿到免費的玉米，我們會有不要錢的法國奴隸”等，那就是希特勒的憧憬，跟美國當今的憧憬很接近，他們的本質雷同。

這次的反戰運動向前跨了一步，很大的一步，它表現了運動如何連結經濟（或社會）和政治層面，此所以現在世界社會論壇的章程不只是聚集反自由主義的運動，而是把反自由主義和反美國軍國主義的運動結合起來，這非常重要。

■：有個小細節：現在的反戰鬥爭和六十年代的和平運動有何差別？和平運動的規模也非常龐大，看起來很相似。

□：六十年代的和平運動反對的是以前的戰爭型態（可稱之為殖民戰爭的遺緒），基本上是指已屬過去的越戰；我是說，只要民族解放運動發展得太過激進，美國就要加以制止，越南就是這種情況，但越戰已屬前個時期。現在是侵犯性的戰爭，是美國為了用武力控制全球而策劃的一系列戰爭。

■：好，這非常重要。

### 深化民主與社會進步相結合

□：第三點，在從正面提出具體的另類選擇上也有長足的進展，我們可以說，即使理論、意識形態的觀點不同，幾乎每個人（不是每個人但是大部分活躍的運動者）同意或匯聚在三個領域內的三條戰線上。

第一是社會進步，這個社會進步並不是社會主義，不是另一套經濟社會體系，但對不同國家的人民來說其內涵是清楚的。對那些曾有社會福利等制度的國家，像歐洲，社會進步就是繼續維持社會福利，在曾有優良社會制度的國家，像前蘇聯，社會進步就是捍衛其成果。大體上說，社會進步意指平等或儘可能減少不平等。我不喜歡這種說辭，但“公分母”就是消滅貧窮，也就是說，減少不平等，事實上，認真說來，我們不是在“慈善”的價值體系中消滅貧窮，而是減少不平等，選擇容納更多人而不是排斥人的發展模式。

第二是他們正朝向深化民主的需求匯集，那就是有傳統定義的多黨制、自由結社等民主，但又不僅止於此。民主的目的

何在？民主必須有助於社會進步，而不僅是我所說的“意興闌珊的民主”，你可以自由投票，但沒什麼用，因為國會沒有實權，因為是市場在決定而非議會決定，所以，在那種情況下你幹嘛投票？這種民主的衰敗（在西方國家本身！）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這會導致新民粹主義和半法西斯主義那類東西。這也會使前蘇聯、東歐和南方國家民主的正當性受到質疑。俄國人明天可能會自問，投票所為何來？

■：現在已經是這樣了。大部分人對民主抱持相當負面的態度，因為民主對日常生活中的經濟、社會問題毫無用處。

□：是的，所以，我看到的是一股強勁的成熟趨勢，如同歷史上常見的，成熟的程度不一，但認識到要深化民主並把它和社會進步連繫起來是日益成熟了。為了社會進步的民主，這樣的社會進步不同於以往的模式，不論是過去蘇聯與中國的社會主義，或是我說的南方國家的民族民粹主義，都用非民主的方式達成社會的進步，是政府從上而下推動的，而非通過民主。

第三個正日益成熟的領域是了解到，如果不根據承認國家權利（不僅是法律權利）的原則建立全球體系的框架，就不可能通過民主來達成社會進步。

■：抱歉，有件事牽涉到第二點的民主問題，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補充說，人們也越來越了解到我們應該超越舊式的民主方式，發展像是參與式民主、草根民主這類事物？

□：那當然，這與舊的組織形式（政黨等等）漸漸失去信任和效率有關。

■：就是你一開始就提到的……。

□：是的，人們想要再創造，需要再創新的組織形式。

回過頭再談，第三個愈趨成熟的層面



反對美國軍國主義的侵略。

或領域是了解到，如果國家之間的關係、國際組織、全球組織的模式不修正，如果不改變由中心國家（特別是美國）支配的等級結構，為夥伴之間的協商談判留下餘地，就不可能透過民主推動社會進步。此即我所謂的“協商下的相互依賴”，這種相互依賴不是透過強者通吃的市場，而是通過協商。而這正是美國亟欲去之而後快的，此所以美國對待聯合國與希特勒對待國際聯盟完全如出一轍，“我們不在乎安全理事會投不投票，我們會自行開戰，我們照轟炸彈不誤。”，這並不只在法理上全然違法（順便提一下，這是場違法戰爭，因此，根據法律，那些決定要開戰的人是戰爭犯），這也是完全退化。人們了解這點，於是便起而反對美國製造的戰爭。

所以說，我認為運動進展很快，也許也有人可以說還不夠快……。

### 必須克服運動渙散的狀態

■：我認為這個運動非常快，二年間跨了一大

步，真難以置信……。

□：是啊！不可思議。我們在世界論壇、在海德拉巴（印度）的亞洲論壇，在佛羅倫斯（義大利）的歐洲論壇，以及我參加的許多國家的社會論壇，都看到了驚人的進展。他們同聲相應；當然，我們仍未窺全貌。我們在社會論壇看到的是冰山的頂端，我的意思是，發生變化的是在局部的層次，在草根的層次，正是在那個層次進行著政治鬥爭和政治變化、社會力量的平衡或不平衡，反映在全球層次上，就是我們在全球世界論壇上所碰到的了。

但是這運動仍然渙散，我所謂的渙散是什麼意思？首先，在國家的層次渙散：我不是夢想要回復到過去領導一切鬥爭、權力集中的先鋒黨，因為這不是人們所要的，可能也不是最好、最有效的方法。但是我們需要人民陣線，需要在每個國家有具備戰略目標的人民陣線。即使它是在尊重政黨、組織與特定目標的分歧下妥協的產物，在國家的層次，我們需要某種連結

我們的目標的共同紐帶。在許多情況下我們在區域的層次也需要人民陣線，因為在某些區域中國家層次之間的相互依賴程度比較強些，歐洲就是這種情況，但對拉丁美洲（反對FTAA運動）、非洲也一樣。也許除了幾個主要大國（世界上有五個大國：美國、俄國、中國、印度、巴西），除了本身是大陸國家的之外，我們需要區域的層次。即使是俄國的情況，屬前蘇聯的國家也需要區域的聯合。

最近幾年來很少有建立起國家人民陣線的例子。但只要建成了，就有取得勝利的巨大潛力。巴西就是這種情況，魯拉與巴西工人黨（PT）、巴西總工會（CUT）、無地農運動（MST）一系列組織，包括

巴西共產黨和其他組織，聯手取得了勝利，我不準備再談巴西的未來與魯拉上台後的困難。

■：但勝利本身就非常有代表意義了……。

□：是的，但我看不到多少國家已到了變革的關頭，寥寥無幾，也許某些小國，如此而已。我說的運動渙散就是這個意思，這是在世界社會論壇無法解決的問題。

■：但要克服渙散，創造第五國際也不是個辦法……。

□：沒錯，創造第五國際會非常危險，可能會失敗，也會很糟，或許以後會出現，我不知道，但人民陣線不是創造第五國際的工具或手段。

■：非常謝謝。◎

---

# 反全球化運動的特徵 及其在911事件後的發展

---

文■權偉太 / 王宏偉

圖■苦勞網 提供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快，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日益凸現。與此相應，“反全球化”的呼聲不絕於耳。無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8國峰會、世界經濟論壇等國際組織的會議在哪裡召開，反全球化的人群就尾隨到哪裡。抗議浪潮此起彼伏，並時有暴力衝突事件發生。“反全球化”已經成為世界範圍內的一場大規模、有組織的群眾性運動。這是上個世紀60年代反體制的新社會運動爆發以來所未曾有過的，所以格外引人注目。“911”事件爆發之後，美國以打擊恐怖主義為由，加大了對反全球化示威者的盤查、管制力度。但“反全球化運動”並沒有就此沉寂，並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勢。

## 一、“反全球化運動”的起因

在國外“反全球化”研究中，阿默里·斯達撰寫的《認準敵人：反公司運動對抗全球化》一書被認為是西方第一部系統研究“反全球化”的力作。在這本書裡，作者寫道，美洲理事會是一個由200個在拉丁美洲開展業務的美國公司組成的機構。在1972年的年會上，美洲理事會探討的主題就是如何應對“反公司主義（anti-corporatism）”。這是關於“反公司（anti-corporatism）”一詞比較早地被人們使用，其情境顯然是在公司受到攻擊的情況下。國外的一些“反全球化”力量宣稱：“反全球化的實質是反資本主義，而反資本主義的核心是反大公司暴政（corporate tyranny）”。以此推斷，“反全球化運動”出現較早，1999年西雅圖的抗議活動決不是“反全球化運動”的開端。

“反全球化運動”的興起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經濟方面的原因：既有國內的原因，又有國際的原因；既有政策性的原因，又有制度性的原因。總的說來，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 1、**全球化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拉大，南北矛盾日益突出。**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處於主導地位，是全球化“遊戲規則”的制定者。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則處於弱勢地位，呈現出被邊緣化、附庸化的狀態。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下，發展中國家處於“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被動局面。在某種意義上講，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是以發展中國家遭受剝削為基礎的。一向以“雙贏”為宗旨的世界貿易組織的總幹事莫爾也不得不承認：“富裕國家向最貧困國家的商品實施的平均關稅事實上比他們向其他富裕國家徵收的關稅還要高。比如說，在美國和加拿大，這種關稅還要高兩倍。”窮國越來越窮，富國越來越富，南北矛盾突出，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不僅如此，發達國家利用自己的先發優勢，以跨國公司為主體對外推行新自由主義，進行資本輸出和經濟擴張，發展中國家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 2、**全球化使發達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拉大，勞資矛盾日益激化。**經濟全球市場的全球化、資本的全球化。由於資本家對利潤的無限度追求，他們總是傾向於把觸角伸向最為有利可圖的地方。在全球化背景下，資本主義已經由私人壟斷、國家壟斷走向了跨國壟斷。西方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成為世界生產活動的主要組織者，被稱為“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生產核心”。為實現產品成本的最小化、獲取利潤的最大化，發達國家通常把資金投向勞動力和原材料價格低廉的發展中國家。這造成了發達國家“產業的空心化”，大批工人紛紛失業，生活每況愈下。即便是在社會民主黨執政國家裡，政府為了增強企業的全球競爭能力，也不得不削減福利以減少公司的納稅負擔。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勞資矛盾不斷激化。“20世紀70年代，美國最富有的20%的家庭年平均收入是137500美元，而最窮的20%的家庭年平均收入為13300美元，兩者相差10倍之多。到了1996年，這一差距已經擴大到15倍。”有的反全球化人士將全球化形容為“經濟世界化、利潤個人化”就說明了這點。
- 3、**全球化使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不斷地惡化。**全球化進程與全球生態退化的進程幾乎是同步而行的。目前，日益嚴重的大氣污染、水土流失、物種減少、資源枯竭等環境問題都對人類的生存構成巨大的威脅。只佔世界總人口15%左右的西方國家不僅集中了世界上的



四海之內皆兄弟。

絕大部分財富，而且消耗了全世界大部分的可開發資源，並產生了大量的污染物。此外，“發達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把高污染的經濟部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它們一方面高喊“環境保護”的口號，其目的不過是構築“綠色貿易壁壘”，限制發展中國家優勢產品的競爭；另一方面，它們操縱的跨國公司又瘋狂地攫取第三世界國家寶貴的資源。為達到這一目的，發達國家通過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將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計畫強加給發展中國家，迫使其降低對跨國公司的環保要求。污染是無國界的。資本主義追逐利潤的貪欲最終造成人類生存環境全面惡化。

- 4、**全球化使世界經濟的投機性和風險性增強**。總的來看，經濟全球化具有三大特點，即**資本流動全球化、社會生產資訊化和經濟構成虛擬化**。隨著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對金融管制的放鬆和資訊技術的迅猛發展，股票、債券等金融衍生工具在資本主義經濟中佔據了重要地位，期貨市場和期權市場逐漸發育。這降低了資金跨國流動的成本，同時提高了其流動的效率，並使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節。目前，國際範圍內的金融立法滯後，世界融資結構不合理，國際金融市場上存在著大量的投機性短期游資。“據統計，全世界只有3%的金融活動與生產、貿易有關，其餘97%的金融活動則屬於沒有實物經濟基礎的投機行為。”此外，一些國際金融機構受西方大國的操縱，盲目地推行全球自由化政策，又加重了金融資本的投機性。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二戰後在美國主導下成立的，又是主要由美國出資捐助的。該組織在對外援助時，強制受援國接受“華盛頓共識”。這很容易造成泡沫經濟，並釀成金融危機。

## 二、“反全球化運動”的特徵

通過考察近年來爆發的反全球化示威活動，我們發現“反全球化運動”體現出以下特徵：



一是抗議活動的頻發性。1999年11月30日到12月初，世界貿易組織部長級會議在西雅圖召開，擬就發起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達成協議。成千上萬的反全球化示威者雲集會場之外，導致會議無果而終。此後，哪國舉行大型國際會議，反全球化力量移師到哪裡，搞得主辦國寢食不安、如臨大敵。2000年1月底，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在瑞士小城達沃斯召開，反全球化的示威者蜂擁而至。2月14日，聯合國貿易與發展組織在泰國首都曼谷召開會議，反全球化的示威遊行再度爆發，矛頭直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5月1日，英國倫敦爆發了反全球化、反資本主義的大規模示威遊行。此後，在一系列國際會議的會場外都少不了反全球化者的身影。他們先後衝擊了2000年9月中旬的澳大利亞墨爾本世界經濟論壇亞太地區會議、9月下旬的布拉格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10月20日的漢城第三次亞歐會議、12月的尼斯歐盟峰會、2001年4月的魁北克美洲國家首腦會議、6月的哥德堡歐盟峰會、7月的熱那亞8國峰會……。

可見，將“反全球化運動”形容為“浪潮”是恰如其分的。這些抗議活動規模大、影響廣、爆發的頻率高、間隔的時間短。許多反全球化組織不斷地奔波往來於世界各地，投入各個示威遊行的行列中。不僅如此，在每次大型抗議活動爆發時，一些地方還舉行小規模的示威遊行以示聲援，造成了此呼彼應的聯動效應。

二是力量構成的龐雜性。“全球化”是一個具有模糊性和寬泛性的概念，容易被各種不同的社會團體做出自己的解釋。與此相應，“反全球化”也是一個十分模糊和寬泛的概念。因此，在“反全球化”的大旗下聚集著形形色色、甚至魚目混珠的社會團體也就不足為奇了。“反全球化者主要來自富國，他們的構成非常複雜，只是因為反全球化而走到一起，主要有：擔心失業的工會活動分子、認為全球化加劇了環境惡化的環保主義者、同情債務纏身的第三世界以及根本就參加不了的最不發達國家者、反對各國政府與國際組織的無政府主義者、發達國家的農產品保護主義者、抵制新經濟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左翼力量，以及那些擔心全球化將導致資本統治的民主派。他們的組織形式是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組織與抗議聯盟。”對於“反全球化”力量，阿默里·斯達在其《認準敵人：反公司運動對抗全球化》一書中，將形形色色的反全球化運動歸納成三種類型：一是主張通過民主制度和直接行動限制公司的權力；二是主張一種全新的全球化，即“自下而上的全球化”；三是主張使地方、社區與全球經濟“脫鉤”（delinking），以小型社會取而代之。在熱那亞八國會議期間，義大利媒體按照反全球化者的暴力傾向的輕重將其分為“紅色軍團”、“黃色軍團”、“藍色軍團”和“黑色軍團”。總之，反全球化者人數眾多、主張各異、良莠不齊、且處在不斷的分化組合之中，人們可以從不同角度對反全球化力量進行不同的分類。

反全球化大潮由若干個支流彙集而成，而每個支流又由眾多的組織構成。比如，“50年就足夠了”是一個全球性網路，由來自50個國家的170個非政府組織組成。各支各派的觀點、主張有相互交叉之處，更有分歧和矛盾。比如，對於WTO的問題，美國的勞聯——產聯主張進行改革，在未來的國際貿易協議中加入一個核心勞動標準，包括禁止使用童工和犯人工作、反對歧視、反對侵犯工人組織和工會據理力爭的權利；而來自第三世界的經濟學家瓦爾登·貝羅則認為“改革WTO的主張是錯誤的”，堅持要最大限度地削弱其權力。

三是鬥爭手段的暴力性。反全球化的抗議隊伍中不存在等級制度，沒有一個統一的領導機構

進行控制和指揮。反全球化者通過國際互聯網傳遞資訊、彼此聯絡。在每次抗議活動前，志同道合的反全球化者在各地組成多個“親和團體”，之後開往抗議活動舉行的地點。到達目的地之後，主張相近的“親和團體”再次組合為規模更大的團體，並選出自己的發言人。所有發言人每天召開一次會議，就食宿、法律指導、抗議活動內容等問題地行磋商，再把資訊回饋到各自的團體。各個團體之間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各負其責。有的負責就餐、住宿、交通等，有的負責宣傳、籌集資金、培訓等。培訓的科目包括使用網際網路、手機、攝像機、爬牆攀樹、搭人牆、偵察和與員警周旋的辦法，如用煤油和醋浸透的碎布來對抗催淚瓦斯等。

由於缺少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儘管反全球化的示威者聲稱自己的行動是非暴力的直接行動，但實際上經常與員警發生不幸的暴力衝突。極端主義分子將其他抗議者作為“人體盾牌”，從事暴力活動。他們經常在示威活動中擲石塊、扔燃燒瓶等，甚至還砸毀過文化帝國主義的象徵麥當勞連鎖店。在熱那亞抗議活動中，反全球化者還裝備了模仿古代戰爭中使用的撞城槌、彈射器、用廢舊輪胎製成的“衝鋒戰車”、適宜向海上目標衝擊用的“皮筏”。所以，對於反全球化者，有專家指出：“他們的行為特點是激進的非理性的，甚至偏愛街頭暴力對抗。因此，儘管反全球化人士的一些言論揭露了當前世界上存在的不公正現象的事實，但反全球化運動在更大程度上成了當前國際社會一支不受管制的、橫衝直撞的無政府力量。”反全球化者的暴力行為激起了各國軍警的瘋狂鎮壓。2001年7月20日，在熱那亞8國首腦會議期間，義大利青年卡洛·吉尤利艾尼在衝突中遭員警槍擊身亡，成為第一個為反全球化而喋血之人。

在西雅圖的抗議活動中，身穿玄衣的無政府主義者實施的破壞財產的行為是組織者所始料不及的，並引起了反全球化者的爭論。一些主張非暴力行動者譴責暴力行為，認為這給反全球化運動抹黑，運動的戰術應該通過民主的方式決定。而其他人則認為，暴力行為以及警察的彈壓有助於使運動得到媒體的特別關注。芭巴拉·伊普斯坦稱：“重要的是反全球化運動樹立了一種發洩憤怒的形象，或者說一種根據自身道德觀念行動的形象。”

**四是產生影響的兩重性。**對於“反全球化運動”，我們應當以“兩點論”加以審視。客觀地講，“反全球化運動”既具有正面影響，也具有負面影響既具有積極意義，也具有消極意義。孤立、片面地強調任何一個方面都是錯誤的。

首先從正面來看，“反全球化運動”雖然包含了暴力與非理性的成分，但它說明了全球化進程的複雜性，有助於人們辨證地認識經濟全球化的本質，促使人們正視、並反思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將全球化導引向公正、合理、沒有剝削的未來，使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民能夠享受到全球化的福祉。此外，“反全球化運動”將會敦促主導全球化進程的西方發達國家在改革現存無序的國際經濟和金融秩序等問題上邁出實質性的步伐，改革和完善國際協調管理機制，使全球化的利益分配更加趨向公平、合理。再者，有的學者認為：“當前的反全球化運動有著反對霸權主義和反對新殖民主義的一面，有利於遏制美國的單邊主義傾向。”

其次，從反面來看，“反全球化運動”也有不可忽視的消極影響。“反全球化運動”破壞性強，為追求轟動效應常常訴諸暴力。與此同時，它並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措施以消除全球化的負面影響，通常是批判性言行多，而建設性方案少。另外，反全球化與貿易保護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比如，長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一直在以環境保護為藉口，尋求構築“綠色貿易壁

壘”。服裝是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中的優勢產品。由於它和人體的直接接觸，西方國家將其稱為“人的第一環境”。一旦“綠色貿易壁壘”得以建立，發展中國家將蒙受巨大的損失。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新的統治壓迫論把關注的焦點放在全球化的消極方面，其重要的價值是指出了經濟全球化中的不平等關係和潛在的巨大危險，要求更加平等，更加人道的全球化，並且強調保護全球化中的弱者。”

### 三、“911”事件後“反全球化運動”的發展

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受了恐怖主義分子的暴力襲擊。隨後，美國舉起了“反對恐怖主義”的大旗，在世界範圍內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恐戰爭。“911”事件使引人注目的“反全球化運動”經受了嚴峻的挑戰、並呈現出新的特點。

在“911”事件發生後，美國等西方國家將“反對自由貿易”、“反全球化運動”和恐怖主義聯繫在一起，加大了對於反全球化示威者的打壓力度。這使“反全球化運動”的發展方向表現出了很大的不確定性。“反全球化運動”向何處去？這成了一個不容迴避的問題。

為什麼美國把“反全球化運動”和恐怖主義相提並論？首先，本·拉登及其“基地”組織成員一向將美國看成是全球化的策源地，並對全球化持反對立場。他們把世界貿易大廈作為襲擊目標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其次，本·拉登的信徒分佈在60多個國家，其扁平化的組織結構不存在等級制度，與“反全球化運動”相似；還有，儘管反全球化的示威者聲稱自己的行動是非暴力的直接行動，但實際上經常與員警發生暴力衝突。在這種情形下，“反全球化運動”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既要對在恐怖事件中的遇難者表示同情、進而劃清和恐怖主義的界線，又要凝聚反全球化民眾的人心、避免使運動本身走到土崩瓦解的境地。從總體上看，“911”事件後，“反全球化運動”呈現出了以下趨勢：

**第一，全球化示威活動次數減少，規模變小，部分反全球化力量投身于和平反戰運動。**受“911”事件後形勢的影響，反全球化組織不得不取消了原定於2001年9月下旬舉行的、估計將有10萬人參加的反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抗議活動。同年11月，在世界貿易組織卡塔爾部長級會議期間，反全球化抗議活動參加人數較少，示威者也保持了比較克制的態度。此外，鑒於美國在“911”事件後軍國主義傾向增強，相當一部分反全球化人士集結到了反戰的旗幟之下。

**第二，“反全球化運動”的暴力性減弱。**在第二屆世界社會論壇舉行期間，反全球化力量也舉行了示威遊行，但並沒有與員警發生暴力衝突。只是在喬姆斯基發表演講時，人群發生了擁擠，並未引起騷亂。在論壇結束時發表的最後公報中，各個組織的代表雖然表示了要“為全球社會正義、經濟公平、民主、消除外債等目標而奮鬥”，但也委婉地做出了“非暴力”的承諾。

**第三，“911”事件的發生使“反全球化運動”內部分歧加大。**美國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911”事件使本已低迷的美國經濟雪上加霜，進而造成了全球性的經濟衰退。為此，反全球化力量得到的經濟資助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在“反全球化運動”內部，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工會為了確保本國工人的就業和福利，呼籲限制勞動力的跨境流動，主張抬高某些產品的貿易壁壘。這與“反全球化運動”中發展中國家工人組織的意願相悖。

2001年1月31日，第三十二屆世界經濟論壇（WEF）年會在美國紐約開幕。同日，第二屆世界社會論壇（WSF）在巴西南部海濱城市阿雷格里港召開。兩個世界性的論壇在美洲大陸的一南一北唱開了“對臺戲”，這並非巧合。它們都要對經濟全球化進程施加某種影響，所不同的是：前者代表了主導全球化的“精英人士”的利益，被稱為“精英論壇”；而後者則代表了全球化中弱勢群體的利益，被稱為“百姓論壇”。

世界社會論壇是形形色色的反全球化力量雲集、交流、爭論、協調的場所，被稱為“‘反全球化運動’的運動”。相比較而言，此次世界社會論壇更加值得人們的關注。因為它召開於“911”事件發生之後，且2002年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破例走出達沃斯，移師遭受恐怖主義襲擊的紐約曼哈頓島。第二屆世界社會論壇的如期召開表明“反全球化運動”並沒有就此沉寂下去。

第二屆世界社會論壇是在美國展開反恐戰爭、阿根廷爆發經濟危機和全球化引發的資本主義矛盾日益尖銳的背景下召開的，其主題就是圍繞三A，即阿富汗、阿根廷和替代。此次論壇得到了全球媒體的廣泛關注，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專門發來了賀電，法國的3位總統候選人和6名部長也來到了阿雷格里。在第二屆世界社會論壇上，反全球化力量明顯地分為兩大陣營：改良主義者和激進主義者。前者包括非政府組織成員、學者、ATTAC組織（交易徵稅援助公民聯合會）成員、世界社會論壇的大多數組織者，巴西工人黨中的社會民主派；後者主要來自巴西農村無地工人運動、一些左翼政黨的代表、工會、城市運動等。改良主義者反對全球化和美國的軍國主義化，提出通過遊說和與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談判促使其兌現“賦予全球化人性面孔”的承諾；而激進主義者則將跨國公司的擴張與帝國主義國家聯繫在一起，高舉反對帝國主義的旗幟，主張實現所有權和社會生產關係的激進變革，推動以新階級為基礎的國際運動。改良主義者認為，新自由主義使國家管理受到削弱，未加限制的全球資本流動是造成“全球化綜合症”的病因；而激進主義者則把矛頭指向資本本身。關於全球化發展的未來，改良主義者主張“經過改良的資本主義”；而激進主義者則主張“以社會主義的全球化取代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這種分歧、矛盾的存在將決定著未來“反全球化運動”走向，應該得到人們的進一步關注。

“反全球化運動”並非一個曇花一現的暫時現象，而且今後還有不斷壯大的趨勢。它在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仍然會對國際經濟與政治的發展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刊摘）

轉載自：<http://globalview.cn>

## 感 · 受 · 你 · 熾 · 熱 · 的 · 心

·倪惠如 300美元	·陳映真 5000元	·麥可 3000元
·董慶圓 300美元	·郭承啓 5000元	·楊渡 3000元
·星火燎原工作室 10000元	·賴小姐 5000元	·鍾先生 3000元
·成露茜 5000元	·關曉榮 5000元	·公視觀點小組 2000元

本刊創刊後承蒙各界捐款贊助，謹申深摯的謝忱。

RCA職工系列專訪之三

# 走出憂傷的深谷

訪RCA梁台英女士

訪問■杜繼平 / 整理■林芳如

## 窮困的眷村生活

■：請你先談談成長背景。

□：我父親是空軍的士官長，民國37年跟著部隊從上海到台灣。民國39年（1950）我在台灣出生，還有個哥哥。我從小就住在桃園大園鄉北機場的眷村，當時房子只有四坪大，房間裡就一張大床、一張小床，外加個破皮箱。那時眷村裡大家都沒有錢用磚造牆，家門外就用竹籬笆圈起來，圈出塊空地當廚房，煮飯菜、吃飯，廁所用的都是公廁。十歲以前，沒有自來水，大熱天也得到外頭打井水回來喝，可是那井水喝起來很甜，這樣的生活當時也不覺得苦。那時還是農業社會，家裡面的水溝有魚，農田裡也是常有小魚、泥鰍，很多鄉下老阿伯就拿竹簍子去捉，夏天夜晚到處可以看到螢火蟲，那種田園之樂很令人懷念。我父親的收入微薄，小時候的印象就是窮，在上小學前，爸爸就叫我到福利社去賒欠買東西。一般來說，我們眷村的環境都不是很好，像我們建國十村附近埔心有一個教堂，教堂有很多人都在那裡領奶粉啦、領美援的衣服啦。我媽媽那時候就在做手工，去領髮網啦、勾毛

衣啦，來貼補家用，不然我爸的薪水根本不夠用。到我上了中學，我們房子換成十坪大，爸爸利用屋旁的空地自己加蓋房間，為了增加收入，也搞些副業，養過雞、賣過雜貨，但都沒成功，後來只好找家庭代工做，父親在下班後，就和母親一起幫人家刷毛衣。

■：你們住在眷村和當地本省人的關係怎麼樣？

□：我小學唸的是空軍子弟小學，學生99%是外省人，學校管得比一般小學都嚴，考試成績不好，錯一題都得打，因此空軍小學的升學率是100%。後來我能體會校長的用心，因為眷村的小孩除了公家提供的宿舍，家無恆產，沒有錢，不用功唸書，沒有競爭力，將來就沒有出路。那時出了我們眷村走在路上，莫名其妙地就會有人罵你「外省豬」，落了單還會挨打，我覺得很奇怪，搞不清楚怎麼回事，後來才知道有「二二八」事件。我哥哥很可憐，他小學一年級時不是讀空軍小學，我爸讓他去唸普通小學，結果他的書包、鉛筆盒全給本省同學丟到河溝裡，回家後我爸不明就裏，覺得家裡環境不好，我哥還不知道愛惜

東西，隨隨便便就丟掉了，發起火來就揍了我哥一頓。我進了中學才交了一些本省朋友，那時學校裡同學本省、外省會有些小圈圈，但我是兩邊的朋友都交，和本省同學相處得很好，有很要好的朋友，直到現在都還來往。

## 機會好，工作勤

■：你是怎麼進入RCA的？

□：民國59年6月我高職畢業，暑假沒事，眷村裡兩個同學要去RCA報名，就問我要不要一塊去。我們之前除了上學放學回家，很少到外面見世面，一到RCA，見到那個廠房、辦公室的氣派，像個大衙門，因窮而來的自卑感油然而生。進到RCA的人事部，裡面的冷氣吹得好舒服。我問我的同學要應徵什麼職務，她說我們高中畢業來當裝配員有些不好意思，所以來應徵二廠的夜班裝配員，這樣就沒人會看到，我對情況不瞭解，也就跟著去填表、體檢了。不知怎的，我同學跟人事部的小姐吵了架，人事部小姐就叫我過去，問我還考不考大學，我答說不會考了。那時大學錄取率低，非常難考，一般家裡肯讓孩子唸完高中，已經很不錯了，我的初中同學父母大多不給他們再升學，我那時一心一意就想賺點錢給家裡改善生活。人事部小姐聽了就说，既然你不考大學了，你也不必去當夜班裝配員了，這裡的檢驗員有缺。她這麼說，其實是故意氣我那兩位同學的。有了工作，我就很高興地回家告訴爸爸，進廠後，我才知道要當檢驗員多半要有人事背景或經人介紹的，檢驗員約工資是870元，

作業員只有650元左右。檢驗員幹了半年多，製造部的一個主任要升經理，需要辦事員，就先把我調到辦公室，然後要我參加考試，通過之後可補實缺。我為了通過考試，一天到晚勤練英文，猛練打字，考試合格後，我被轉調到物料部，薪水就調到了1500元。以後我又幹過材料分析的工作，分析材料的價格和用量，控制高價格的物料，學到滿多東西。民國66年又升為經理的秘書，薪水提到一萬多塊。然後幹了十年秘書，到離開的時候，薪水已近三萬了。調到辦公室當職員後，我才發現辦公室裡喝的是蒸餾水，而我們直接在線上裝配現場工作的人員，包括組長，每天泡茶喝的都是地下水，後來才知道那是污染過的。

## 丈夫罹癌過世，陷入極度憂鬱

■：你先生也在RCA工作，後來怎麼過世的？

□：我先生比我早兩三個月進RCA，我進去不久就認識他，當時他在物料部當副組長，民國62年我們就結婚了。他在現場工作了十年，當時線上經常煙霧瀰漫，可是我們這一代的人從小貧困，只顧到賺錢，根本沒有一點環保意識，工廠的老闆也都沒有教育員工環保意識。我先生每年接觸有毒物質，到民國76年就得癌症過世了。他得病後知道是癌症，但沒敢讓我知道。病情嚴重時，有一天就問我說，家裡面錢夠不夠用？我們當時買的房子沒有貸款，只上了幾個會，我便跟他說，夠用！夠用！你只管好好養病。後來我才知道，他是很擔心

他走了之後，小孩子還小，正是要受教育的時候，又買了房子，以後日子怎麼過？當時我還面臨RCA裁員的威脅，生活壓力確實很重。你看現在不景氣，很多人買了房子付不起貸款，孩子又小，需要扶養，承受不了這種沉重壓力的失業勞工就會自殺，這一兩年跳樓自殺的很多，就是負荷不了生活的重擔。我先生過世時，小兒子5歲念幼稚園，一學期光學費就五千多塊，每個月還得另繳月費，大兒子12歲要念國中了也得花錢給他補習，而我先生的勞保和公司保給的錢總共才90幾萬，而當時公司又在裁員，我的工作遲早不保，我又沒辦法到離家遠的地方另找工作，未來生活該怎麼辦？我就天天扛著這種壓力，心情極度沮喪、痛苦，得了憂鬱症，整天唉聲嘆氣，沒有一天開心的。

### 辛勤努力，走出困境

- ：RCA是怎麼裁員的？後來你又是怎麼走出困境的？
- ：從民國70年開始，RCA就已有撤廠的計劃了。當時世界的大企業有股併購的風潮，台幣又有升值的壓力。RCA在比較了深圳、新加坡、台灣的投資環境後，選擇了新加坡。於是台灣廠就開始逐漸減產裁員。它先從年紀比較大、屆臨退休的裁起，然後建立考績卡，根據考績優劣，一批一批地裁，辦公室裁員，在專員以下從辦事員裁起。像我們辦公室原有12個女生，到了75年時只剩3個人，我因為考績都是A等，是最後一批走的，但一個人得幹好幾個人的事。76年我先生過世，我為公司要關

廠、工作岌岌可危而憂煩不已。我爸爸見我為此整天愁眉不展、鬱鬱寡歡，就說我們家有店面，可以做生意呀！我一聽便豁然開朗，76年暑期開始，我一有空便到桃園街上訪查市況，跟一些商家詢問商情，著手準備。民國77年六、七月間就開起便利商店來。當時我爸說，你還在上班，幹嘛急著開呀！我答說，既然要做生意又不知道能不能做起來，就趁我還有工作，先試試看，爸爸媽媽年紀還不太大，也可幫我一點忙。結果，77年、78年正遇到股市熱絡達10000多點的時候，店裡生意很好，78年一年營業額有5百多萬，淨利100多萬。眼見這條路已鋪成了，我的心情便舒緩下來。那時我白天在公司的工作量很大，晚上6點多回家還得進貨、排貨忙到10多，禮拜六、禮拜天也沒得休息，真是夠辛苦的，幸虧那時才30多歲，身體還撐得住。這樣直到民國80年初，那時我在RCA的年資已滿20年了，按規定可以領八成薪退休，以後的勞保，公司還可以續保。我便跟公司主管說，如果還要裁員，把我裁掉，我可以回家看店。以前公司裁員的時候，有些同事為了裁員的事與公司、同事鬧得很不愉快，我是第一個高高興興走的人，上至主管，下到同事，每個人都說要請我吃飯。

- ：在爭取RCA工傷賠償事宜的過程中，你有什麼感受？
- ：政府沒有善盡維護勞工權益的責任。RCA留在台灣的20多億資產，輕易地就讓它們轉移出去，太對不起我們RCA受害的勞工了。◎

# 逆旅叻勞

外籍勞工在台灣

文■陳信行 / 圖■黃子明

**從**1990年代初以來，三十餘萬的外籍工人，所謂的「外勞」，已經成為台灣工人階級隊伍的一個固定的組成部分。這群處於幾近於人身依附狀態、從事著最苦最累的工作的勞動者的存在，不斷地觸動著社會各條最敏感的神經。圍繞著「外勞」問題的爭論，提供了一個切入點，使得我們得以深入探視台灣平素以文明外衣包裹得嚴嚴實實的醜惡面向，以及這個荒瘠的年頭階級鬥爭的複雜性。



對台灣經濟貢獻良多的外勞卻備受歧視。

這幾個月來，外勞課題又再次引起了注目。8月立法院臨時會期中，「自由貿易港區條例」審查在工業區資本家代表的施壓下險些通過讓外勞薪資與基本工資脫鉤，從而打破整體台灣勞動力市場的最低標準。9月勞委會大張旗鼓地宣布「加強查緝非法外勞」方案。相應地外勞權益關注者及工運團體發起了一次次抗議活動，到12月28日首次外勞集結遊行爭權益達到高潮。這一系列的活動，似乎預示著一個轉機，能讓移工逐漸從被擺佈、被剝削、被歧視、被「照顧」的客體，成為主動發聲的主體。而隨著開放蒙古成為第六個勞工輸台國家，台灣的外勞制度在可見的未來還會愈來愈根深蒂固地存在。



## 全球流動、但無處安身

勞動力的跨疆界流動與四處奔竄的跨界資本流動共同構成了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最醒目的景象。當酷嗜著便宜而馴順的資本逃離較發達國家中有工會組織、有法律保障的勞動力，轉往貧窮國家與地區時，貧窮國家掙扎求生的人們流向富裕地區求取生計，是市場經濟中再自然不過的事。然而，當代社會中這種流動已經到了另人驚嘆的規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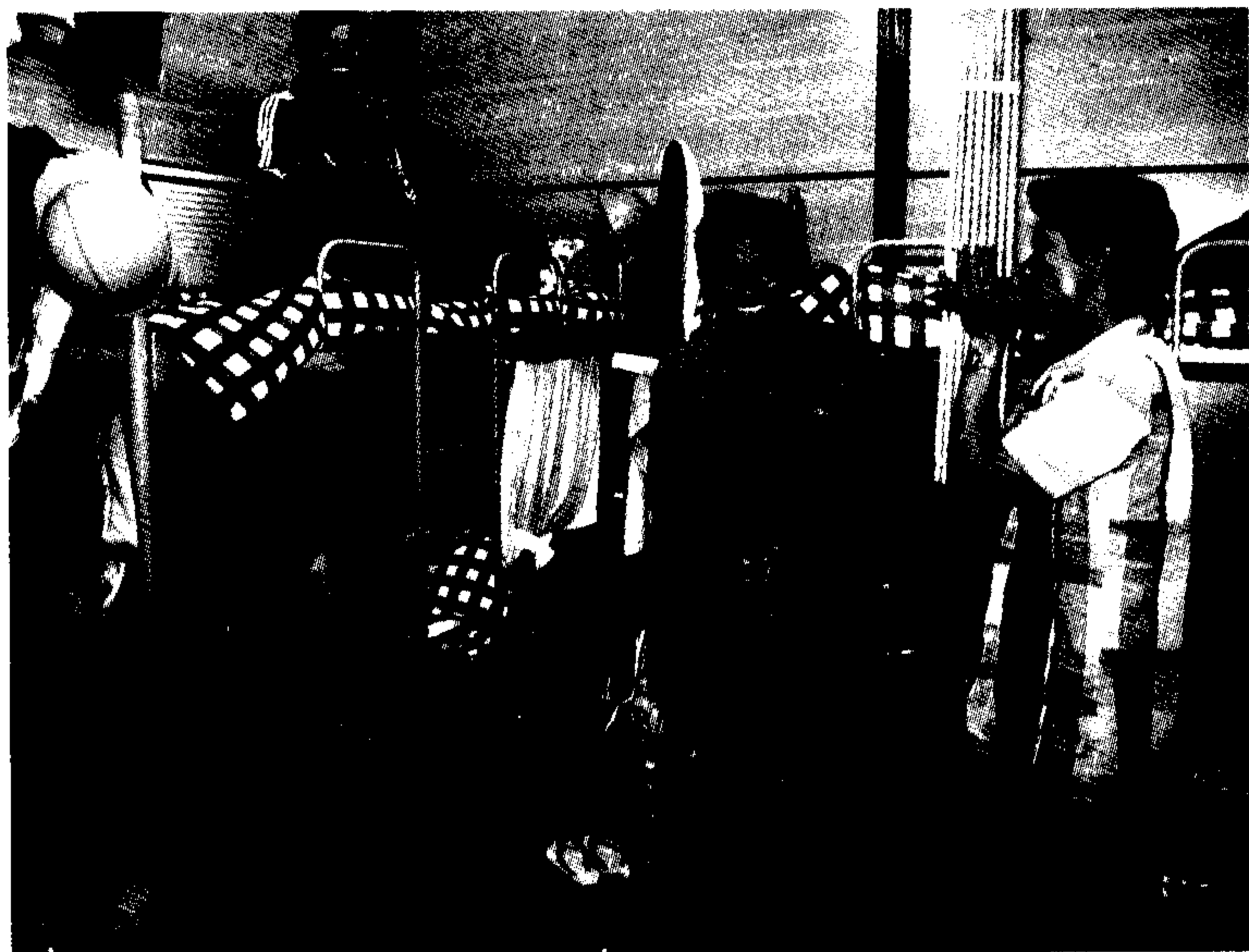
一些國家——如在美國後院的中美洲各國——人已經取代一切商品成為最大宗的外銷。例如，內戰過後的薩爾瓦多，六百萬國民中有二百萬在美國謀生，僑匯佔該國出口總值的63%。在亞洲，菲律賓是最突出的一個勞動力輸出國，全國國民有十分之一在國外從事定期契約工。而在許多較富裕國家中，新移民工人與外籍客工 (guest worker) 已成為社會運轉不可或缺的最底層的勞動力來源。

在世界歷史上，這不是什麼前所未有的現象。相較於19世紀末，今日的全球勞動力流動以比例而言未必較高。當年，成千上萬的歐洲、中國、印度移民工人也曾經離鄉背井地遷徙到工資較高的新世界去，以求活路。

但是，與十九世紀末不同的是，今日的民族國家疆界遠較當年來得封閉。移民法、簽證、入境管制，層層關口卡著討生活的人們無法如吸血汗的資本一般自由來去。甚至在許多國家中，儘管移民工人的勞動力已經成為經濟運轉不可或缺的元素，遠途而來的工人們卻永遠不能成為合法的居民，更遑論享有法定權利的公民。台灣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十餘年來，台灣的外籍勞工政策的一大前提與任務，正是如何剝奪移工的各種自由與權利，從而保證他們永遠不會成為台灣社會的一份子。

## 半奴役的台灣外勞制度

台灣外勞制度肇始於冷戰格局逐漸崩解、經濟成長依舊暢旺的1980年代末。寬鬆的就業市場中，台灣工人們愈來愈不需為一份活不了人的工資賣命，無法用低薪雇到人的雇主們，紛紛透過各種管道從東南亞招募工人。一時間，操著異國語言的南洋各國打工男女的身影開始出現在各個角落。學者專家、政府官員開始疾呼非法外勞與私娼、毒品同為「愛滋病的三大溫床」。同時，營建、製造業等大資本一再要求開放外勞，否則難再根留台灣。從當時到今日，「外勞」這回事，在台灣的主流論述



外勞在工寮中自娛。

中，就同時具有雙重面貌：一方面是「人力資源」，是政府用來留住不斷威脅著要外移的資本家的甜蜜禮物，一方面又是潛在對於台灣社會的威脅。相應著這種既愛又恨的矛盾情結，台灣的外勞制度遂被打造為一個怪胎，既是資本主義勞動力市場的一部份，又悖離這個制度用以妝點自我的自由交易倫理。

1992年在新通過的「就業服務法」(實為外勞管理法)之下，外籍勞工被納入法律管理，確定了他們人身依附於雇主的短期「客工」(guest worker)的地位。在這套法律之下，每個移工在台的居留權與工作權繫於與雇主訂定的兩、三年勞動契約，一旦契約終結，就必

須被遣返回國。換句話說，勞資雙方任一方不合意，爭議當事的工人就應該從台灣社會消失。雇主必須對外籍工人負「生活管理」之責，一旦外勞「逃跑」，雇主會受懲罰。而台灣與輸出國的勞務仲介收取的高額仲介費，使得十餘年來在台外勞必須都幾乎無酬工作一年以上還債，一旦解約，在老家的家庭就會墮入貧困深淵。

因而，在台外籍工人連資本主義勞動力市場中「自由工人」的地位都沒有，雖然他們彷彿自由交易一般地訂定勞動契約、幹活領工資。正常狀況的工人，至不濟也能「用腳投票」，遇到惡雇主，走路不幹。而在台外勞遇事只能忍氣吞聲。被雇主形同軟禁的狀況成為常態，而一旦忍無可忍起衝突，就得被遣送。再受不了離開雇主，就被當成罪犯，甚至被懸賞捉拿。勞委會職訓局9月開始的「加強查緝」專案宣傳，就理直氣壯地祭出「重裝上陣查緝落跑外勞」的口號，絲毫不覺得這種酷似當年美國奴隸主子帶著家丁捉拿逃奴的行事作風有何不妥。

受到這種不自由勞動者身份所害最嚴重的還不是在製造業與營建業中的外籍勞動者，他們雖然實質上被剝奪了組織工會集體協商的勞動權利，至少還在日常勞動與生活中能有些許的集體相扶持。一個個被孤立在個別雇主家中



被剝奪了集體協商權的外勞。

的17萬監護工與幫傭，幾乎除了依賴雇主的善念之外，別無可恃的支持網路。從而，外傭被凌虐、甚至被性侵害、被殺害的案例時有所聞。90年代的台灣報章上，時時有教導家庭主婦如何整治外傭的文章。時至今日，外勞仲介仍然喜歡廣告其「產品」「勤勞乖順不逃跑」、「試用不合可退換」，儼然一副奴隸販子的德性。

## 私有財產的國民身份

為什麼自命先進、文明、民主的台灣社會主流十餘年來會這麼甘之若飴地接納在這個島嶼上存在著一個類似奴隸制的外勞體制，甚至一再地拿外籍工人當各種社會經濟問題的代罪羔羊？事實上，如此對待外籍勞工並非台灣的專利。我們鄰近的新加坡、南韓，更遠的中東各產油國都不斷地浮現外籍客工的嚴重人權問題。甚至在號稱社會民主主義大本營的德國，土耳其客工在居留工作三代之後仍然無法取得公民權。我們固然可以就現象談現象地批判台灣社會缺乏多元文化的包容性，而這也是事實。但是，類似的現象發生在文化各異的社會中，顯示著至少有一大部分原因必須在這些國家共通的結構中找答案。

Samir Amin 稱之為「資產階級國家發展計畫」(bourgeois national development project)的視野，主宰著戰後許多新獨立國家的主流意識型態。在這個觀點中，資產階級所主導的經濟成長是全民福祉之所系，工人、農民與各階級人民在以民族國家的國民身份，最終總會分享到他們在本國資產階級領導下創造出來的財富。社會民主主義等改良主義思潮與資產階級國家發展計畫是相輔相成的，僅僅更注重由國家擔負起一定的財富重分配角色。這種觀點中，民族國家是一種私有財產的概念：「我們國家」的財富、建設成果、先人遺產……是只有國民能享有的，非國民則無權分潤。從而，各國以語言文化、認同、血



外勞幹的常是最苦最累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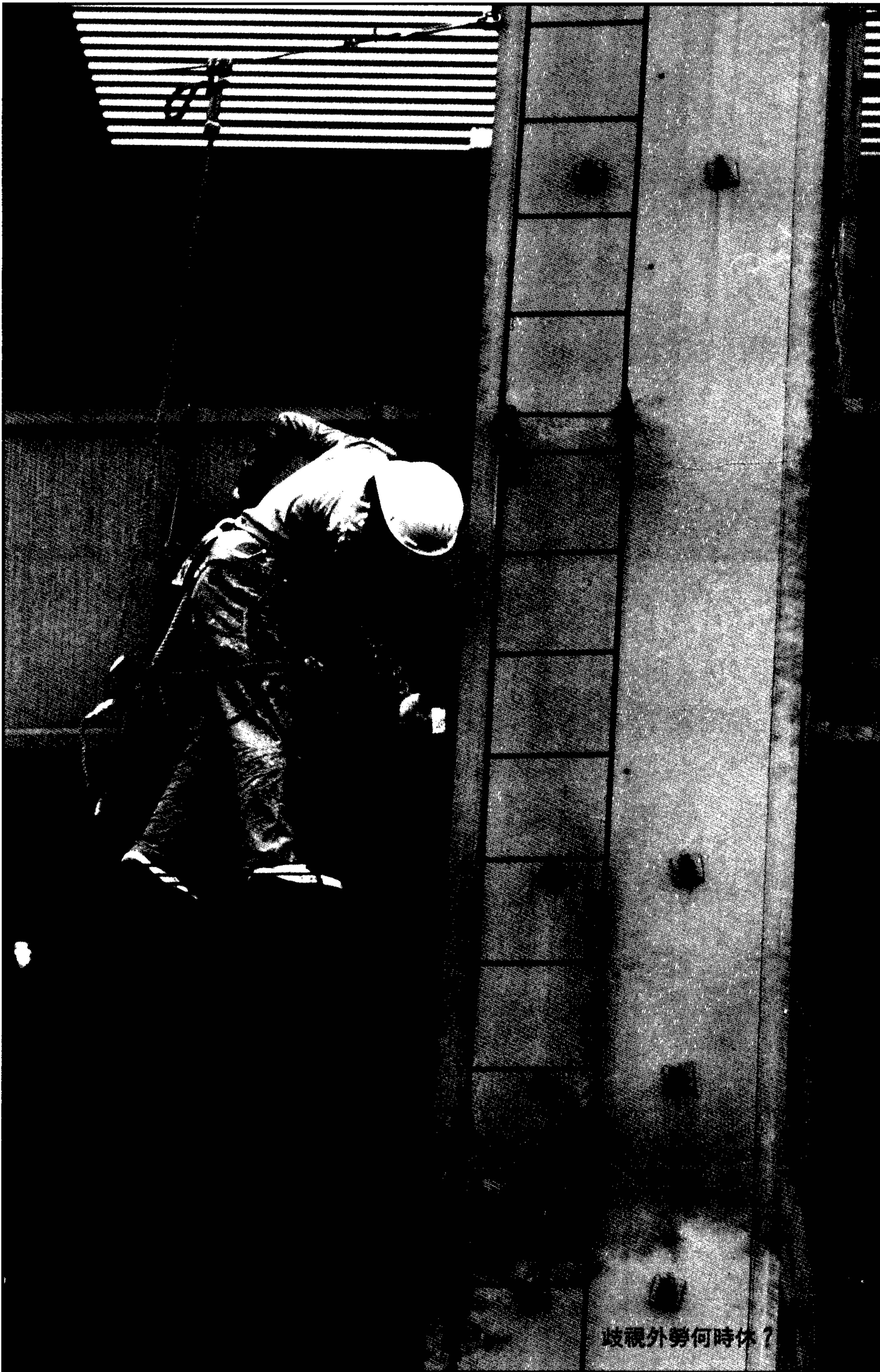
統、各異的法律制度等所訂定的國民身份，就不僅僅是一個政治與認同的概念，而往往帶著自私偏執的性格。

稍有良心的台灣人應該都會同意，十餘年來外勞對台灣社會貢獻良多。重大公共工程完工紀念碑上總有著泰籍犧牲者的姓名、許多家庭得靠著印尼、菲律賓或越南監護工來照護老幼病殘，大部分外勞做得遠比台灣人要辛苦、拿得更少這一切都不容否認。但是，口說著感恩的人們往往一轉頭又擔心外勞會「造成社會問題」。什麼社會問題？除了文化偏見與歧視所引起的無端厭惡感之外，振振有詞地說得出口的無非是擔心外勞搶了台灣人的飯碗、使用了納稅人給付的公共服務、分了台灣的健保勞保基金、以及諸多可能出現卻尚未出現的「社會福利」……彷彿這是「我們家的」，不容

「外人」分享。

問題是，誰是「外人」？是同樣以血汗參與著締造社會財富的外籍工人，還是利用這些社會財富與勞動者的血汗聚斂私產的台灣資本家？資產階級在這個問題上打迷糊眼是可以理解的，大多數普通勞動者在這個問題的糊塗，說明了我們社會中進步觀點的嚴重缺乏，也說明了工人階級運動的薄弱狀態。從這個角度來看，外勞問題在台灣要能夠有比較根本性的出路，關鍵還在於本地的工人運動。當台灣勞動者認同自己的階級大過認同剝削階級所主導的「台灣人」身份時，各種分而治之的手法才能不攻自破，「命運共同體」云云也才會開始有一些實質的意義，而非騙票的空話。在這個意義上，外勞問題遠遠不是一個「邊緣族群」的議題，而是考驗整體台灣社會運動的大哉問。◎

# 充滿歧視的廣告



任何一個菲律賓人看了12月23日台灣某大報頭版半頁篇幅的廣告應該是笑不出來的，某電訊公司促銷手機撥打廣告是以相當歧視性的字眼大刺刺地刊登了如下醒目的標題：「老公打老婆、菲傭打小孩、小孩打噴嚏，不管怎麼打……」。繼「愛滋天譴說」、  
「同志結婚

亡國論」引起社會嘩然後，這種對菲勞以偏概全的指控竟然沒有激起太多的漣漪，台灣人的自省能力未免太遜矣！同時，這些案例在在印證出台灣社會充滿了偏見與歧視的病態事實。

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加遽，更加深了第三世界廣大勞苦人民生活的窘迫與坎坷。新一波離鄉背井、出賣原始勞力浪潮成為貧窮者海外謀生寄望的救贖。上溯六零年代，西德開始引進大量南歐來的客勞（Gastarbeiter），當人數邁進百萬時，該名幸運的土耳其人還接受西德政府贈送的金龜車。客勞大多從事骯髒吃力的工作，法令的限制也使他們成為二等人民，但起碼的人道處遇如同同工同酬、退休養老醫療等與德國人並無二致。

台灣三十萬以上外勞（包含陸勞）的處境與「勞奴」幾無區隔：昂貴的仲介費用被剝削二層皮、同工同酬的原則不適用於外勞、沒有選擇雇主的權利、超時加班無法拒絕、不准結婚懷孕分娩、更不可為愛滋病帶原者、退休養老給付是遙不可及的夢……。外勞遭受凌虐的事件時有所聞，尤有甚者，因為職業的高危險與雇主的藐視人命，意外工殤的比例高的嚇人。如果今天我們還膽敢喊人權治國的話，身為「勞奴主」的政府與雇主，面對一樁樁、一件件違反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的案例，能不汗顏？！

長期以來，台灣人民並沒有學習到與外國人打交道的基本態度，換言之，是持雙重標準的。與日本、美國西歐人士交往，是出奇的友善禮遇，往往也諂媚得過了頭。面對亞、非、拉第三世界人民，財大氣粗的我們，頓然又自大起來。不卑不亢應該是我們處世待人的基調，尤其是與我們有過相同歷史傷痕的第三世界人民，似乎更需要多給他們一份人道的關懷。

德國刑法130條族群挑撥罪（Volksverhetzung）是本刑五年以下的重罪，凡對別種的族裔、族群、種族、膚色及宗教等群體以侮辱誹謗性文字語言加以攻擊，傷及其尊嚴者，均懸為禁令。筆者希冀吾人能以「平等待之」的胸襟，接納外勞成為台灣社會的一份子，縱然他們是短期的過客，也應跟本地人一樣活的有尊嚴！隨著大選日期的逼近，更衷心期盼「中國豬滾回去」、「台灣人選台灣人」、及「台灣第一」（有法西斯傾向）的夢魘口號不再重現。◎

# 美利堅帝國的吹鼓手們

美國新保守主義評介 ■汪立峽

**最**近應台灣有關方面之邀，來台參加美日台戰略對話會議的美方代表中，有一人格外值得注意，此人名喚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是美國新保守主義的中堅份子。他在應《中國時報》記者郭崇倫的專訪中，公開聲稱320撤飛彈公投並不會動搖兩岸現狀，因為此舉並不涉及統獨與台灣主權之爭。

陳水扁發動的公投明明是引據《公投法》第17條：「當國家遭受外力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這是說，僅僅遭受到外力威脅並不足以構成公投條件，必須同時"主權有改變之虞"，總統才能據以發動公投。什麼叫"主權改變之虞"，難道不就是統獨之爭嗎？

## 美帝與台獨的利害關係

克里斯托的見解是對此條文故意視而不見，還是別有用心，很需要探究一番。其實，在克里斯托來台之前的一個多月前，即去年12月初，這位仁兄已經在他主編的新保守主義喉舌《標準週刊》(Standard Weekly)上，寫了一篇《危險的對台新政策》，抨擊布希總統在中國總理溫家寶面前反對320公投的談話，指稱："等於是向北京磕頭，對台灣生氣蓬勃的民主嚴重打擊"。

克里斯托會有上述的見解和發言，一點都不意外，因為他同美國現任副總統錢尼、國防部長倫斯菲、副部長伍夫維茲，這些著名的美國新保守主義者，早在1997年就創建了一個名為"新美國世紀工程"(New American Century)的智庫，當時克里斯托是二名主任之一，另一人是羅伯·凱根(R.Kagan)，目前克

氏是該智庫的主席。

這個智庫在有"新保守主義之父"之稱的歐文·克里斯托(克里斯托之父)和唐納·凱根(羅伯·凱根之父)的主持之下，于2000年9月提出了"重建美國國防"的報告，此一報告實際上是以1992年伍夫維茲執筆的《防務計劃指南》為底本而草就的，是一個要把美國建成新羅馬帝國的雄心勃勃的計劃。隨著"新美國世紀工程"的主要成員紛紛進入小布希政府擔任要職，此一計劃正在逐步付諸實施。

威廉·克里斯托與伍夫維茲二人的地位有如"國師"，布希總統外交政策中的"單邊主義"、"先制攻擊"等想法和做法多出自此二人的政治哲學。他倆也是主張發動侵略伊拉克戰爭最力的人。克里斯托以及其他新保守主義者基本上視中國大陸為美國的潛在敵人和未來的心腹大患，如能運用台灣牽制中國大陸，絕對符合美國的利益。在他們看來，儘管陳水扁搞公投可能引發台海的戰爭，把美國拖下水，但姑息中國大陸是比縱容台獨"更大的邪惡"。

## 新帝國主義論的出爐

公元2002年6月1日，美國總統布希在西點軍校畢業典禮上，首次闡述了被西方世界稱之為"布希原則"的要點：美國擁有"先制攻擊"(Preemptive Strike)的權利，美國的價值觀普適全球(所謂"普世價值")。西方媒體甚至將"布希原則"稱之為"伍夫維茲—布希原則"，因為伍夫維茲早在1992年的《防務計劃指南》(Defense planning Guide)中就已經提出了今

日"布希原則"的基本思想。

伍夫維茲於1972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政治哲學博士學位，他的指導教授是新保守主義大師阿蘭·布魯姆(Allan Bloom)，而布魯姆則是新保守主義開山宗師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的真傳大弟子。據說，布魯姆曾稱讚伍夫維茲是"現代性第四波"中最傑出的學生，因為施特勞斯曾將現代性區分為三波：第一波以馬基維利和霍布斯為代表，第二波以盧梭為代表，第三波以尼采為代表。

### 三種新帝國主義理論：

事實上，近年來新保守主義所鼓吹的新帝國主義論述甚囂塵上，據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者佩里·安德森的研究分析，此類論述大約可分三派：

第一種理論謂之"民主和平論"。主張民主制不會用戰爭的方式來對待另一種民主制，但民主制可以用發動戰爭的方法來對待非民主制。此派的代表人物是邁克·多爾(Michael Doyle)和布魯斯·魯瑟特(Bruce Russett)，他們的理論據他們說是源自康德的"永久和平"概念，康德主張共和制是代表人民的，由於人民不能從戰爭中獲得利益，所以在共和制下就不會有戰爭，而只會有和平。多爾和魯瑟特對康德理論做了重大修改，將"民主"概念取代"共和"概念，然後再把"民主"概念以西方特別是美國觀點加以絕對化和普世化。

第二種理論謂之"霸權論"。主張僅僅為了一個國家的生存，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尋求權力的最大化，因此，生存的唯一保證，不是國家權力的均衡，而是一個國家對其他國家的霸權。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芝加哥大學教授約翰·米爾森(John Mearsheimer)，他的理論基礎是根據霍布斯的觀點，認為一個人的權力正好是對另一個人的權力的制約和抑制，因此權力本身就要不斷擴張，要超越另一個人的權力，由此，米爾森得出的結論是，"最好的防禦

就是進攻"，換句話說，國際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是侵略性、擴張性的，所有的國家從它們的國際關係的性質本身來說，都在尋求霸權地位。

第三種理論謂之"後現代國家論"或"市場國家理論"。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羅伯·庫珀(Robert Cooper)和菲利浦·波比茲(Philip Bobbitt)，前者是英國首相布萊爾的顧問，後者曾任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顧問。庫珀把世界上的國家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後現代國家，如北美、歐洲和日本；第二類是現代國家，即它們還是"民族國家"，如中國、印度、巴西等等；第三類是前現代國家，即"落後國家"，如伊拉克、阿富汗等中東國家及非洲國家。庫珀主張後現代國家首先要動用它們的國家力量包括軍事力量來制服前現代國家，同時要控制現代國家。

波比茲則主張國家已不再是民族國家，而轉變成了市場國家。這樣一種市場國家的對外職能，就是要通過一切手段，包括軍事手段，來保證其制度在全世界的所有地方能夠推行。市場國家可以通過發動戰爭和軍事干預的辦法來確保任何地區都遵守市場法則。

### 赤裸直白的帝國夢

看了這些新保守主義者們的帝國主義"高論"，真會令人背脊直冒冷汗，可他們卻說得那麼理直氣壯，那麼赤裸直白！這些新帝國主義理論和一般帝國主義理論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過去為人所熟知的帝國主義理論多半出自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和革命理論家之手，而且向來為右翼保守主義份子和反共份子所諱言避談，甚至堅決否認美國是帝國主義，而今，以美國知識菁英為首的一批新保守主義者公然高舉起帝國主義的大旗，為美利堅帝國的"宏圖大業"充實理論武器庫。歐文·克里斯托早就不遺餘力的鼓動美國建立"正式帝國"，他在1997年一篇發表在《華爾街日報》的文章中寫到：「美國人某一天一覺醒來會發現我們已經

變成一個帝國國家，這並不是外交政策菁英的陰謀，而是因為世界嚮往美國帝國，需要美國帝國。」比爾·克里斯托甚至乖張地說過：「如果人家說我們(美國)是帝國主義力量，那很好啊！」真不知台灣某些自稱台獨左派的知識菁英和政治活動份子今後再怎麼為自己不反美不反帝的古怪立場作自我辯解。

## 新保守主義的系譜

一般而言，許多人承認政治與經濟分不開，其實，政治與哲學也分不開，因為自古以來政治哲學從來都在指導著政治思維和行動，下面我們將會從新保守主義的理論傳承中印證這一點。事實上，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和政治上的新保守主義，聯手吹響了新帝國主義的號角。

什麼是新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和傳統保守主義有何不同？"新保守主義之父"歐文·克里斯托曾這麼描述新保守主義：「新保守主義是一個描述性的辭彙，它描述了一批為數不多但智慧超群的學者和知識份子從自由主義轉向保守主義的過程，但這一保守主義在一些重要方面與傳統保守主義不同。」有人曾生動描畫過這些新保守主義人士：「他們往往都是學者，往往居住在紐約，往往是猶太人，往往最初是左翼人士或自由主義者，他們經常隨身攜帶文學名著或政治雜誌，而非《聖經》……」

### 新舊保守主義的三點區別：

大陸學者崔之元曾歸納新保守主義不同於傳統保守主義的三點新意：

第一，新保守主義致力於將美國從"非正式帝國"轉變為"正式帝國"。

第二，新保守主義同美國南方新教原教旨主義建立了政治同盟。或者說，新保守主義是美國南方基督新教忠誠和中西部牛仔精神所綜合形成的"大美國主義"，布希總統可以說是他們的典型人物。

第三，新保守主義的哲學基礎不是伯克

(Edmund Burke)式的傳統保守主義學說，而是列奧·施特勞斯的"自然權利學說"。

既然如此，那麼說到新保守主義的系譜，顯然就必須從施特勞斯說起，因為他是新保守主義在理論建構方面的開山祖師。施氏1889年出生於德國索林根的一個猶太家庭，在柏林大學讀書期間曾受教於著名哲學家胡塞爾和海德格，獲哲學博士學位後在柏林"猶太研究中心"從事歷史學和政治哲學研究。1937年為躲避納粹而流亡美國，1949年至1967年在芝加哥大學任教。1973年逝世。

### 施特勞斯—新保守主義的開山祖師

施特勞斯被西方不少人譽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家，他最突出的成就在於將歷史學和政治學結合起來，對人類文明特別是西方文明進行重新詮釋。施氏在芝加哥大學期間建立了他不可動搖的政治史學和政治哲學領域巨擘的地位。他的弟子甚多，前面提到的布魯姆教授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布魯姆與另一位施特勞斯的得意門生阿伯特·烏爾斯泰特教授(Albert Wohlstetter)曾經共同指導過名叫保羅·伍夫維茲和理查·珀爾(Richard Perle)的學生，正是這兩個人成為了將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帶進布希政府的主要推動者。

《自然權利與歷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一書被公認為是施特勞斯著作中"最為貫通而又完整地陳述自己觀點"的一本，表述了他的政治哲學的基本思路。施氏在此書中將自然權利(或譯"自然正義")與歷史主義對立起來，認為歷史主義的是非標準隨時間地點而轉移，必然導致相對主義，最終走向虛無主義，自然權利則是一種超歷史，跨不同社會的是非標準，可以作為一種批判能力。他的意思是，按照歷史主義，既然各民族，各國家的歷史過程變化萬端，紛繁複雜，正義和正當的準則必然因人、因時、因地而異，那麼各種歷史觀念就無法提供客觀永恆的準則，從而導致了當下



的嚴重危機。

施氏強調強者自勝的自然法則，認為西方應該贏得大多數衝突，而且"保持西方世界信心的唯一途徑就是讓敵對力量對西方的力量產生敬畏"。

不難看出，"布希原則"的普世價值觀與施特勞斯的"自然權利"學說之間，有著一定的內在聯繫。難怪美國著名自由主義者霍姆斯(Stephen Holmes)會毫不遲疑地把施氏歸入"反自由主義傳統"的系譜之中，認為他的思想要點無非是以哲學家對於真理的壟斷來對抗民主制度下的平等。

### “先制攻擊”說的源頭

從一般的意義上講，新保守主義的"先制攻擊"概念甚至可以上溯到古希臘的亞里斯多德、古羅馬的西塞羅，以及文藝復興時期的一些人文主義者。亞里斯多德在其《政治學》中有一段名言：「戰爭的藝術是獲取的藝術，它包括對野獸的打獵和對奴隸的佔有。奴隸是依照自然的意圖應被統治的人，但他們卻反抗自然的意圖。因此，針對他們的戰爭是符合自然正義的。」很難說精研古代政治哲學的施特勞斯沒有受到亞里斯多德這種"自然正義"和"自然奴隸"觀的啟發。

古羅馬哲學家西塞羅在他的著作和演說中，多次強調潛在的威脅就足以構成"先制攻擊"的理由，他的名言是："罪惡在萌芽狀態最容易被消滅"。西塞羅認為"共合國的光榮"(這是西塞羅著名的政治概念。此處"共和國"意指古羅馬共和時期)是可以發動"先制攻擊"的充份理由，因為"光榮"的定義在他那裡已經是"通過征戰而達到不受危害的和平"。著名法國羅馬史專家保羅·維恩(Paul Veyne)曾指出，按西塞羅對"光榮"的定義，任何其他獨立自主的國家在原則上都是對羅馬利益的威脅。最近(今年一月中旬)，美國前財政部長歐尼爾在媒體揭露稱，布希早在2001年上任之初就已決意

攻打伊拉克，而非在911攻擊事件之後才做出決定。布希當年在白宮國安會議下達決心時，沒有官員敢質疑攻伊理由，因為布希只要大家："去給我找出執行的方式！"。布希的動機決非突發奇想，而是前文所述的那幫新保守主義謀士的新羅馬帝國夢在對布希發生催化作用。

### 形左實右的民主捍衛者

西塞羅是西方文藝復興運動的主要思想源頭，因為當時許多古希臘的哲學經典尚未重新發現，而西塞羅的作品卻一直廣為人知。16世紀著名人文主義法學家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即據西塞羅的思想而聲稱："對野蠻人和其他與我們的習慣和宗教截然不同的人群攻擊是正當的，即使他們以前沒有對我們造成傷害"。這些論調在西方國家的航海大發現，以及隨後的殖民地掠奪和奴隸貿易活動中，提供了現成的理論武器。有名的近代國際法奠基人格勞休斯(Hugo Grotius)也在其著作中直接訴諸"自然奴隸"說，來論證荷蘭東印度公司暴力侵奪印尼的正當性。

另一個新保守主義的晚近源頭是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霍氏在其"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理論中，"先制攻擊"也起著關鍵作用。依霍氏之意，在"自然狀態"中，"好人"出於對部份"惡人"的恐懼而訴諸"先制攻擊"，是導致"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的緣由。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塔克(R.uck)曾指出霍布斯是西方人文主義傳統"先制攻擊"理論的集大成者，自有其道理。

其實，那位在台灣學界大名鼎鼎的《正義論》作者約翰·羅爾斯(J. Rawls)，據佩里·安德森的研究，羅爾斯在其晚期著作《萬民法》中提出的正義觀與《正義論》的見解正好相反，也帶有濃厚的新保守主義色彩。羅爾斯在《萬民法》中主張美國和發達國家沒有任何道德的義務將"分配的公正"體現到它們同發展中國家的關係上，但是，發達國家卻有"道德的

正義性"以維護人權的名義來對其他國家進行軍事干預。根據《萬民法》的見解，羅氏將世界劃分為民主的人民和不民主的人民，民主的人民的道德責任就是派軍隊到不民主的人民那裡去推行民主。佩里·安德森不無感慨的指出，包括羅爾斯自己在內的許多人，竟然至今還認為羅爾斯是屬於美國的極端左翼的學者！

## 必須讓該離開歷史舞台的人儘早離開！

前不久也來過台灣參加研討會的美國"傳統基金會"研究員譚慎格，在台期間與返美之後，都不遺餘力為陳水扁的撤飛彈公投撐腰，聲稱除非布希政府宣佈中國大陸才是兩岸緊張的元兇，並反對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才能避免亞洲民主國家的災難。這個人並不屬於新保守主義陣營，其論調雖與新保守主義者貌似雷同，但所據指導思想仍有很大分歧。他的顛倒是非論調不僅在國際也在美國本土，已不可能被有識之士接受和苟同，只會讓他自己和台獨集團聽了"爽"而已。

就在譚慎格大放厥詞的同時，前美國國務院副發言人容安瀾在雜誌撰文直指320公投問題表示，"民主不是一張允許魯莽行為的執照，陳水扁威脅了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人也不會讓自己的家人替一些錯誤的政治判斷白白送命"，又說："台獨正是陳水扁帶頭衝的方向"，認為布希公開斥責陳水扁"根本是陳水扁自找的"。容安瀾甚至說："中國大陸也相信，除非美國能阻止這種(台獨)驅勢，否則中國可能會被逼迫採取行動"。

與此同時，不具名的美國政府高層官員公開表示："美國不能容許台灣誘使美國和中國大陸發生代價高昂的衝突"。本文起首提到的那位新保守主義帝國論大將威廉·克里斯托，在接受台灣記者訪問時，不僅支持320公投，而且得意的表示此事二、三個月之後就雲淡風

清了，對比容安瀾與美國政府官員的憂心忡忡，看來這些低估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意志和決心的美利堅帝國主義者，未免過於自信與天真了。

## 哈貝瑪斯與德里達發怒了

在美國侵佔伊拉克之後，美國新保守主義的帝國實踐驚醒了世界上許多為人類進步事業操心的傑出心智。去年五月間在德國《法蘭克福匯報》和法國《解放報》上，名聞全球的二位歐洲左翼大師哈貝瑪斯和德里達聯名發表了《歐洲的復興：首先在核心歐洲捍衛一種共同的外交政策》一文。此文係針對新保守主義要角美國國防部長倫斯菲所嘲諷的"老歐洲"，拍案而起的檄文，主旨在呼籲歐洲國家要儘早在政治上團結起來，設法避免分歧，以使用共同的外交政策抵制美國在世界各地的資本擴張和軍事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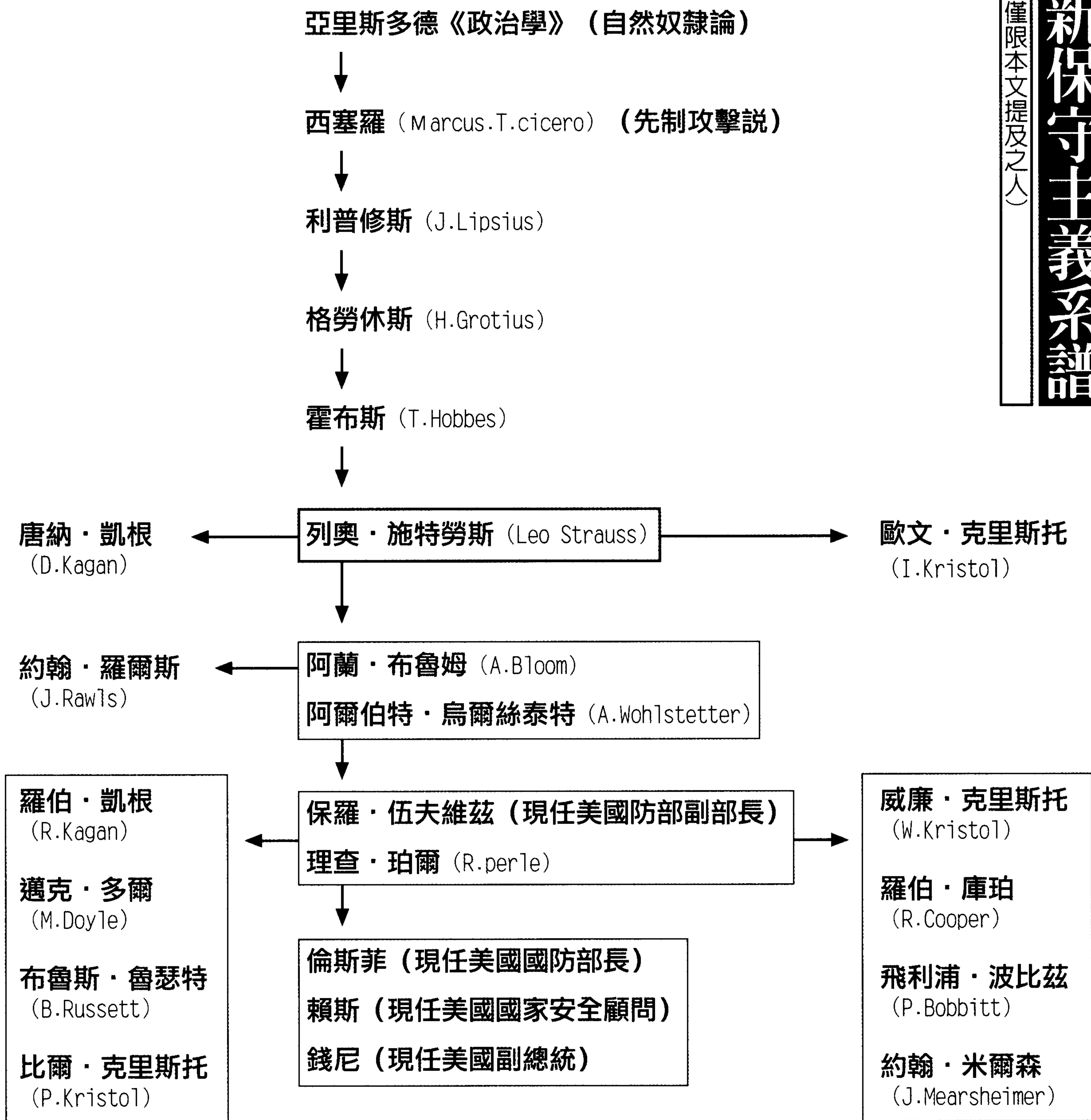
享有國際聲譽的美國哲學家理查·羅蒂(R. Rorty)響應哈貝瑪斯和德里達的登高一呼，發表《侮辱還是團結》一文表示："無論在歐洲，還是在美國，許多人都已經清楚地認識到了，美國人追求霸權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且全然不顧所做所為對於人類自由的影響。這是一個可怕的錯誤。已經醒悟過來的美國人有必要運用他們能夠得到的一切幫助，以便讓他們的同胞認識到，布希將他們的國家引上了一條歧途。"

連那位國際金融炒作家索羅斯都對布希及其新保守主義的同夥看不過去了，前一陣子他公開跳出來說："目前念在的就是如何扳倒布希"。索羅斯說："白宮的對外政策被美國至上主義所左右，因此布希執政後，美國成了世界的危險之源。"他還表示對日漸抬頭的美國新保守主義勢力"感到不安"，認為新保守派利用恐怖攻擊事件讓外界接受"先制攻擊"、"主宰世界"等觀點，"布希正領導美國與全球走向升高暴力的惡性循環"。

連繫到台灣的320大選和公投事件，布希及其新保守主義集團固然因不敢冒與中國開戰的危險，出而力阻陳水扁的台獨公投，甚至期望陳水扁敗選，但只要新保守主義帝國主義勢力仍在美國掌權，肯定還會有這個或那個國家遭到無理欺負，世界將不得安寧。至於陳水扁

實質上和後果上"反和平"的公投，若不負責任地執意搞到底，那就真須要套用羅蒂的話大聲疾呼：「已經醒悟過來的台灣人有必要採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以便讓他們的同胞也認識到陳水扁把這塊土地引上了一條多麼危險的歧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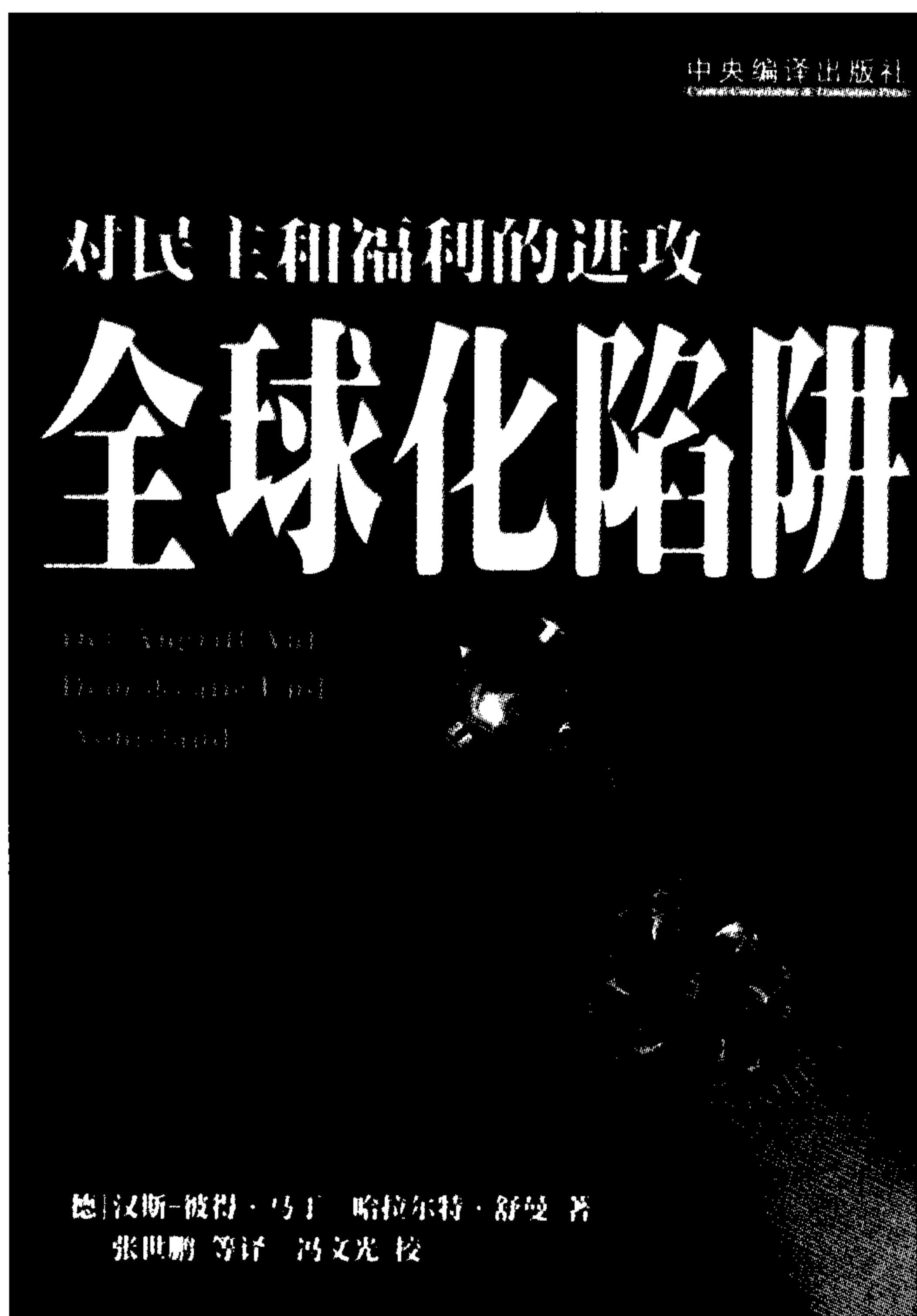
新保守主義系譜  
(僅限本文提及之人)



■金寶瑜

八十年代末，蘇聯解體，中國在「改革」十年後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已成定局，此時，保守右派在宣傳上採取了攻勢。他們放出了「資本主義全勝」與「人類歷史已經終結」這一類的狂言（註一）。到了上世紀末，世界資本主義危機進一步深化，這時囂張的右派比較收斂起來了。隨著世界壟斷資本以「全球化」為名放肆地在世界橫行，給世界上廣大的勞動人民帶來了難以解決的生活困境。這時反「全球化」的運動在世界各地展開，跟著也出現了一些反對「全球化」的言論。

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所寫的《全球化陷阱—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在這些言論中很有代表性。這兩位作者對「全球化」所帶來的災害作了調查和研究，並作有系統的整理與報告，他們在工作上的認真和努力是值得我們敬佩的。特別是近年來知識界的主流都在高呼“全球化是全人類的希望”是“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時，他們站在弱者的立場來質疑「全球化」的“真理”，更引起許多人



## 評《全球化陷阱—對民主和

的共鳴。只可惜的是他們的論述雖然給我們一吐心中悶氣的快感，但是因為他們的分析不明確，因此沒有觸及到「全球化」背後的基本動力，所以會造成讀者對「全球化」的誤解，因此在這裡將這本書的論點提出來討論。

### 全球化造成大批勞動貧民

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敘述了「全球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對「全球化」會普遍的給所有人帶來幸福的論點提出挑戰。他們從資本主義發展先進國家談起，再談到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在「全球化」下所受到的負面影響。十幾年來，在中國和台灣的知識界齊聲高唱市場至上、競爭唯一的贊歌，這本書對「全球化」下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提出質疑，因

註一：在1988-89年度，右派大本營芝加哥大學辦了「民主政治的理論與實踐」的演講系列，福克亞馬 (Francis Fukuyama) 被請去作主講人之一。福克亞馬的演講稿先以一篇文章發表，再寫成一本書，叫《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92)

此，引起了對這個議題關心人的注意。

《全球化陷阱》在書的第一章中就對「全球化」對德國的負面影響這樣的形容著：“1996年的德國：有600萬以上希望工作的人找不到固定勞動職位——數目之多是聯邦共和國成立以來前所未有的。西德人的平均淨收入近五年以來持續下降。”他們接著說：“在未來10年內僅在工業中至少將有150萬勞動崗位被繼續消滅掉。”（第7頁）這兩位作者更說：“（德國未來的）失業率可能從當前的9.7%上升到21%。”（第143頁）除了德國之外，他們對歐洲聯盟各國的就業情況都很悲觀，而美國則是更糟，美國的工人在近些年來不但大批失去固定的工作，使他們變成了臨時工、合同工，而且遭受到工資不斷的下降，和福利不停的削減，因此造成了大批的“勞動貧民”。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更對財富與所得分配不均而氣憤，在書的第二章中，他們舉證來說明不但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內越來越兩極分化，而且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與資本主義發展落後國家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大。

在書中，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對1995年的世界金融危機前後作了詳細的敘述，並且分析了這次由墨西哥披索貶值所引起的金融危機如何幾乎導致世界金融系統的崩潰。他們談到今日世界金融資本和跨國企業的龐大，使得現今國家根本無法對它們加以限制和約束。

### 資本主義國家機器並不代表人民

在對「全球化」給世界勞動人民帶來猛烈的衝擊作了深入的報導後，這兩位作者並且有力的批判了“自由貿易”和新自由主義。但是另人不解的是：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卻把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資產階級國家，與壟斷資本的合作看成是件很新鮮的事。而且，他們似乎認為當前資本主義大國的國家是萬不得已才屈服在金融資本和跨國公司之下。

## 福利的進攻》

1998年，中國的中央編譯社出版了德國的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同著《全球化陷阱——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一書的譯本。

在書的第153頁，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這樣說：“生產和資本越是可以無限制地自由地加以支配，那些有一部份可以說是巨人般的組織就越是強大和不可戰勝，這些組織使各國政府和它們的選民都感到心驚肉跳和被奪去權力。”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兩位作者把選民和政府看成一體，他們錯誤的認為政府和選民同時感到巨大的跨國資本所造成的威脅，他們沒有看出他們所說的政府正是代表這些巨大的跨國資本的利益。

他們有這樣的看法也不奇怪，主要是因為他們對資本主義缺乏深刻的認識，因此戰後在歐洲的一段「福利國家」的歷史，使他們誤認在資本主義的體制之下，國家代表著人民的利益，而且在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下，選民和政府是一體的。

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時，在西歐的一些國家中，社會民主黨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響力。在戰後的前二十多年中，西歐的當權者在社會民主黨派的影響下，用凱恩斯的政策來維持在經濟上的繁榮，用國家的力量來設立各種福利。在這二十幾年中，美國雖然沒有民主社會黨，它的民主黨也在工會的壓力下，提出對工人比較有利的政綱。在這戰後的二十多年中，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內，工人物質生活不斷提高，社會上的所得分配比較平均，一般人的生

活比較有保障，因此戰後前期的歐美社會常被美名為「福利國家」。如果我們只看這一段歷史，社會民主的確有它的吸引力，這一段歷史使有些人認為資本主義可以在有心人士所推動的改革下變得很人道。這也就是為什麼到今天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還對戰後那段日子念念不忘。

### 國家機器帶頭全面攻擊勞動階級

但是到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時，資本主義面臨了大戰後第一次嚴重的經濟危機，西歐國家和美國的統治階級都開始對前一時期政策作修正。1979年，柴契爾被選為英國的首相，1980年，美國共和黨的雷根當選為總統，他們都是戰後最保守的政治領袖。他們用國家的力量向工人階級全面進攻，取消了工人階級在戰後鬥爭所獲得的工資和福利的增長，他們也取消了國家對資本的管制與制約，結束了戰後二十多年維護資本主義政權的「福利國家」政策。他們一上台就用一連串的立法來把前一時期對人民較有利政策一一推翻，並且由國家帶頭來打擊工會。

1980年美國雷根總統當選後，他開始對勞動階級進行全面攻擊。雷根首先以削減聯邦政府赤字支出為借口，大幅度削減國家的福利支出，在削減福利開支的同時，他卻大量增加軍事支出。1981-82年，雷根借著航空導航工會罷工的機會，將所有航空導航工人解雇。聯邦政府的這種作法給各大公司後來用強硬手段來攻擊工會創下了先例。1984-85年柴契爾鎮壓了英國礦工大規模的罷工，礦工工會完全無法抵抗這樣由國家發動的攻擊而投降。美、英兩個大帝國的當權者帶頭把前一段與工會和平共存的政策倒轉過來。西歐國家——德、法、義大利、西班牙等國也跟著模仿英美所創下的先例。

到九十年代，美國克林頓總統就任後，就延續共和黨的保守政策。1994年，貝萊爾(Tony Blair)成為英國新工黨的主席。1997年，英國新工黨在大選中得勝，貝萊爾當選為首相。身為工黨主席的貝萊爾必須提出至少在表面上與柴契爾不完全相同的政策。此時社會學家安東尼·紀登斯隨著湯尼·貝萊爾當權而紅了起來的。貝萊爾出任首相，紀登斯和約翰·格唯(John Gray)就成了新工黨的智囊和它的政策的鼓吹者，安東尼·紀登斯寫的《第三條路，社會民主的更新》就是為新工黨的政策提出了“學術上”的依據。但是新工黨所提出的第三條路，事實上已經脫離了前工黨的社會民主的政綱。新工黨的第三條路就是要在前社會民主和英國保守黨柴契爾的新自由主義（完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之間找出一條路。但是它的作法卻很難跟保守黨區分出來，它同樣的要爭寵於英國的壟斷資本，在國際政策上它對國際壟斷資本的支持是徹頭徹尾的。

### 資本主義強國的政府也是「全球化」的主謀

《全球化陷阱》這本書的兩位作者不瞭解壟斷資本與資產階級國家之間的關係，他們看不出資本主義國家的權力是來自壟斷大資本的支持，並非來自選民的支持。在戰後的前一階段由於各種原因，特別是因為工人階級爭取福利的鬥爭，「福利國家」的政策有利於資本積累和資產階級的統治。但是到了六十年代底和七十年代初，資本主義進入戰後危機後，資產階級國家在國內向工人階級進攻，在國外協助壟斷資本打開世界各地的市場，在壟斷資本主義下，對統治階級來說，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事。資本主義的國家的職責是在資產階級的統

治下，使資本積累得以順利進行。只有把國家的職責誤認是保護全民利益的人，才會為這樣的發展而心驚肉跳。

這兩位作者難道看不見每一次七個超級大國（G-7）開會時，這些大國的國家代表都在協商如何進一步取消國家對跨國資本限制的事宜嗎？他們難道看不見每年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開會時，超級資本主義大國在這兩個金融組織內，如何利用它們的特權來迫使欠債的落後國家屈服於國際壟斷資本的宰割嗎？他們難道看不見在國際貿組織中，這些大國如何聯合起來迫使落後國家放棄最後僅存的一些保護嗎？這兩位作者一方面唱著前一時期國家對國民的保護不再的哀歌，而另一方面他們又向世人警告「全球化」是個大陷阱，但是，為什麼他們卻完全看不到代表資本主義強國政府就是策劃「全球化」的主謀之一呢？

我想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對「全球化」下廣大的受害人群是同情的，但是他們反對「全球化」是不徹底的。他們認為：“市場經濟要取得繁榮，就無論如何都需要有企業界的自由。”（第311頁）他們只是覺得在「全球化」下，企業界的自由太多了一點，需要有一些節制，他們希望再回到西方戰後的那一段日子，他們認為在那一段日子裡，企業的自由發展與國家的管制達到了“恰當的均衡”。

### 歐美帝國主義同為一丘之貉

因此，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的理想是在世界次序重整下再回到這個“恰當的均衡”。他們認為美國雖然有這個重整世界次序的能力，但是美國為了自身的利益卻不會這樣作，所以這兩位作者就把希望寄託在統一的歐洲上。在321頁上他們這樣的說：“不要建立歐洲壁壘，而是要作出一種富有生命力的、充滿力量的歐洲式選擇來代替那種具有破壞性的、盎格魯—薩克森式的市場激進主義。”他們接著說：“借共同的幣制、多災多難但已成過去的共同歷史組成一個政治聯盟，會在世界政治力量角逐中不遜色於美國與未來的強國中國與印度。經濟上的強大是世界市場上唯一重要的力量因素，多年來美國的貿易戰略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看不到所謂「全球化」實際上就是壟斷資本在帝國的協助下，在全世界擴張的全球化，就是帝國主義。他們不滿美國稱霸的帝國主義，他們看到統一歐洲有未來在世界稱霸的可能性，他們對在歐洲霸權下的帝國主義抱滿了希望，認為到了那時，將會能達成有國家管制的均衡式的「全球化」。他們這樣的希望的基礎到底在哪裡？

近年來歐洲不管是保守派政黨當政，還是社會民主派政黨當政，他們同樣的、毫不猶豫的銷毀了前一時期「福利國家」所遺留下來的一些對一般人的保護，這是有目共睹的，並且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在書中也講到的。他們沒有分析為什麼歐洲的當政者一步步將「福利國家」解體，一步步取消了對壟斷資本的限制，卻只是靠著懷舊的心情要重新回到他們的理想世界，難道他們真的如此天真的要我們相信，歐洲牌的帝國主義真的比美國牌的帝國主義要好嗎？◎

#### 參考書目：

《第三條路，社會民主的更新》安東尼·紀登斯著（1999）鄭武國譯，聯經出版社（台北）

中國大陸自實行經濟改革後，工人階級的政治與經濟地位即逐步滑落，出現了貧困化、無權化、分散化的嚴重問題。原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劉實的這篇文章，深刻扼要地點出了當前大陸工人階級的困境，是了解大陸工人階級現況極好的材料。■□編者

# 當前中國工人階級狀況

■劉實（原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人階級在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方面起著主力軍的作用。目前廣大職工創造的GDP占全國GDP的比重為72.1%。

1978年，全國在職職工總數為1.2億多人。2000年，全國在職職工總數2.7億人。加上農民進城長期務工以工資收入為生活主要來源的7000多萬人，工人階級隊伍已有3.5億人，佔城鄉從業人員近一半。這對於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和社會政治生活，都有著重大意義。

工人階級的文化、科學、技術水準，都有了比較大的提高。工人階級大部分成員的生活水準也有了提高。

經過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工人階級，主要是產業部門職工的狀況有了深刻的變化。

## 一、雇傭化

目前，約有一億職工在私營企業、個體經濟、“三資”企業等各類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就業。黨的十三大指出，職工在私營企業勞動是

雇傭性質的。

鄉鎮企業中，有的名為集體，實為私營，這樣企業的職工也是雇傭性質的。

國有企業如何？對國有企業的改革，實行了“小賣”和“大股”。一部分中小國有企業賣給私營企業主，變為私有企業；一部分實行經營者持大股。2002年8月7日，浙江工人日報刊登一篇新華社記者的國有中小企業改制調查《“新百萬富翁”震盪大江南北》。調查指出，在日益深化的國有中小企業產權改革過程中，“經營者持大股”正被認為是一種有效的改制方式，受到各地政府和企業廣泛推崇。通過多種多樣的購股方式，一批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在“一夜之間”擁有了數十萬、上百萬、甚至千萬元股份，形成一個特殊的“新百萬富翁”社會群體。這樣的企業經營者，各顯神通，破解籌資難題。有的是通過向親朋好友借，有的以個人資產作抵押向銀行貸款，有的以現金購買。此外，更有當地政府從財政收入拿出一部分錢借給經營者，或政府獎勵經營者



一部分技術或管理要素股，虛擬入股，持大股的經營者都未出錢或只出了一小部分錢。有的是經營者和職工購買企業時自己出了一部分錢，然後動用職工工資節餘基金配股。獲得了大股的經營者坦言，與過去“一刀兩斷”，為自己好好幹。國有中小企業經過改制，職工也改變了原有的地位，成為雇傭勞動者或實質上具有雇傭的性質。國有大型企業改為股份制，有外商和私營企業主入股，國有股部分強調企業經營者是產權代表，企業經營者持有股份，並實行年薪制，年薪所得高於普通職工的十幾倍、幾十倍、以至百倍以上。在這樣的股份制企業中的職工，勞動也帶有雇傭的性質。

## 二、貧困化

比之於私營企業主、外商投資者、個體經營者和為他們服務的知識份子上層，工人階級的生活改善是有限的，是相對貧困的。

統計表明，1978年沒有私營企業，到2001年，私營企業達到202.85萬戶，擁有註冊資本18212.24億元，其中註冊資本在1000萬元以上的2.3萬戶，億元以上的383戶，雇傭職工2253.03萬人。私營企業主和外商投資者資本積聚的重要來源，正是無償佔有職工的剩餘勞動。

《中國教育人力資源問題報告》報導，1995年—1999年的製造業，每個勞動力的成本，中國是729美元，相當於美國四十分之一、日本的四十三分之一、韓國的五分之一、泰國的四分之一，甚至比印度還低。還有材料反映，中國製造業的工資水準每小時不到60美分，遠遠不到40個便士，還不到英國最低工資的十分之一，不到英國一般性工業部門工資的二十分之一。私營企業能夠發展起來，外商投資者願意到中國辦企業，重要原因是低廉的勞動力成本。

職工相對貧困，勞動條件和工作條件也差。一些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勞動時間長達十小時以上，工資很低，還時常遲發、欠發，安全條件很差，有的還沒有人身自由或人格受到侮辱，工傷事故或幾十人死亡的事故時有發生。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招用農民工的單位，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極差，用農民工的話說，“起的比雞還早，幹的比牛還重，吃的比豬還差……”。

工人階級中還有一部分處於絕對貧困狀態，即最低的生活水準也難以維持。這有兩種情況，一是只有最低工資收入和最低工資線以下的收入；二是雖然收入超過最低工資線，但家人有大病，或遇到其他災害，生活過不下去的。絕對貧困的職工有多少，可以從一個數字作出推算。全國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有2053萬人，還有漏保的，實際的數字會比這個大。他們維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難，更難以承受子女上學、看病買藥、住房的負擔。在他們那裡，就發生過賣血、自殺等情況。

近年來職工的貧困，是以失去勞動和工作條件為特徵的。除去社會上失業的，還有大量職工下崗。1998年以來，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達2700萬人。此外，還有停產、半停產企業職工實際上失去勞動崗位，有些企業還搞了內退、終止勞動合同、有償買斷工齡。能夠就業或再就業的卻逐年減少。

這幾年提出減員增效、搞下崗，是值得重新研究的。下崗、不勞動，怎麼會有效益。所謂效益，只不過是在冊職工勞動生產率的統計上高了一些，減少了一些工資、福利性的支出。但是，下崗的職工仍然要維持最低生活，要組織他們再就業，還要維持社會的穩定，這都要投入，給政府和社會增加了很大的負擔。要增效，只能是轉崗。轉崗增效能不能做得到？這幾年已有一些企業這樣做了，證明是行

得通的。以黑龍江一個林業局為例，林木採伐完了，人員富餘下來，轉為搞造林，又利用山地、水面搞了種植業和養殖業，利用建築物和場地搞了加工業，富餘人員都得到安置。就在最近，2003年3月24日人民日報頭版報導了浙江富潤集團，十年兼併企業二十家，九千職工無一推向社會。富潤集團總經理趙林中說：“我們的宗旨是，兼併過來的企業要增效，但減員並非增效的唯一選擇，要依靠職工辦好企業，辦好企業讓職工有依靠。”還有一些地方和企業，採取先放水，後養魚的辦法，也沒有把富餘人員簡單地推向社會。

我們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三個前提。即以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國家宏觀調控。現在看來還應加上一條，有勞動能力的人能夠就業。“砸爛鐵飯碗”的口號極為不妥，由此引發的主張和措施，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只要搞社會主義，就不能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造成大量的勞動後備軍，國家必須保證公民勞動權的實現。

### 三、無權化

對職工群眾，有“困難群體”的稱謂，是就其經濟生活狀況而言；也有“弱勢群體”的稱謂，是就其社會政治活動狀況而言。

職工群眾每日每時能感受到的權力是對企業有參加管理權。過去，儘管職工代表大會有形式主義，但總是起一定作用的。現在，有的嚴重形式主義，有的乾脆不召開了。特別是企業如何改制，企業要職工買斷工齡，這樣影響到企業命運和職工命運的重大問題，都很少讓職工討論。

第十屆全國人代會中，工人、農民的代表是511名，占代表總數2984人的18.46%。現在有一種說法，說工人、農民沒有議事能力，因此工人、農民不能選為代表。現在黨和政府

召開各種徵求意見會、座談會、茶話會，參加的各界都有，唯獨不見職工界。

很多輿論宣傳工具，除了講到下崗、就業問題外，很少出現職工群眾的聲音，也很少報導職工群眾在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上所作出的重大貢獻。

職工群眾裡共產黨員的比例，《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反映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課題組的調查結果，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產業工人中共產黨員與私營企業主中共產黨員的對比，見下表：

	私營企業主中 共產黨員比例	產業工人中 共產黨員比例	無業失業半失業中 共產黨員比例
貴州省 鎮寧縣	0	10.3	3.9
湖北省 漢川市	9.1	5.9	1.8
安徽省 合肥市	24.4	13.3	9.1
廣東省 深圳市	22.2	0	2.0

《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指出，私營企業主中的黨員比例明顯上升。1993年私營企業主中的黨員比例為13.1%，1995年上升至17.1%，2000年進一步上升到19.8%。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私營企業主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產業工人中的黨團員比例明顯下降。現今的工人與黨組織沒有多少聯繫，他們很少參與也很少關心黨組織的活動和有關政策精神的宣傳學習。這些情況表明，工人的政治地位下降，與黨的關係逐漸疏遠。

### 四、分散化

工人階級是靠社會化的大生產培育起來的最有組織、有紀律的隊伍，以工廠為家是我國工人階級的優良傳統。現在，職工群眾與企業的關係是一紙合同，職工對於用工者來說，總

是處於弱者和依附的地位，合法權益常常受到損害，職工對於說自己是企業的主人很有反感。至於終止合同後，職工只能另尋生路，基本上是個人顧個人。失業和下崗職工，有的做小買賣，有的打零工，有個體化的現象。

原來我們的企業，是經濟組織，又起著社會基層組織的作用，黨、政、工、團等基層組織把職工嚴密地、有層次地組織起來。現在只強調企業是經濟組織，終止合同或買斷工齡後，職工就找不到什麼組織了，就無依無靠。大慶職工買斷工齡後，黨員關係都不知道轉到哪裡。他們反映，不但買斷了工齡，連黨齡都買斷了。

在全國的3.5億職工中，工會會員1.3億。許多私企、“三資”企業和農民工中沒有成立工會組織。

由於在職工群眾中很少進行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的教育，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嚴重地侵蝕工人階級。

職工維護自己的權益而發生群體事件時，職工卻甩開黨政和工會組織，自發地組織起來。美國等西方反動勢力，妄圖支持成立與黨和政府對立的所謂“職工維權組織”，必須高度警惕。

實際上，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我國工人階級從整體看，無論在我國的經濟生活，還是政治生活中，正逐漸地社會邊緣化，並積累著社會矛盾。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思考。

為了使工人階級的狀況從根本上扭轉，建議：

一、重申堅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指導方針。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關乎黨的性質、國家和社會的性質，關乎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順利進行，是我們黨的根本指導方針。對黨的十六大報告和黨章中所講的“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必須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制度”，應作完整的準確的理解和貫徹執行。對黨的建設、基本經濟制度、分配制度中的兩者關係，前者是主，後者是輔，不能等量齊觀，更不能把工作的重點放在後者，而使前者成為一筆帶過的虛文。

二、請中央政治局在調查研究和徵求意見的基礎上，討論和制定貫徹執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指導方針的重大措施，這特別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中充分體現。

三、必須治癒中國工會的軟骨症。這就要對中國工會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特別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把職工群眾充分地組織起來，特別是如何把私營企業職工、“三資”企業職工、農民工充分地組織起來，如何真正成為職工群眾的代表者，如何堅強地維護職工群眾的合法權益，進行歷史的全面的考察和研究，並做出有指導方針性的切實可行的決定。這就要改善黨對工會的領導，使工會工作者能據實反映情況，依法依理力爭。

四、黨所領導的一切宣傳工具，都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宣傳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對我國革命和建設所做出的偉大貢獻，宣傳工人、農民、知識份子的創造性勞動對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大作用和意義，批駁輕視勞動和勞動人民的錯誤思想，旗幟鮮明地維護工人階級的合法權益，揭露和斥責損害工人階級權益的言論和行為。

以上反映的情況和建議，如有不妥之處，請指出，並給予批評。

劉實

2003年4月28日◎

轉載自：<http://www.gongnong.org/bbs/>



葉紀東談——

# 我所認識的 謝雪紅

訪問整理 ■ 葉芸芸

謝雪紅的一生曲折多故，在台灣現代史上是個充滿爭議的人物。她具有堅定的民族與階級立場，在日據時期，參與組建台灣共產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在光復後的「二二八」事件中，組織人民武裝力量對抗國民黨部隊，展現了頑強的鬥爭精神。但不論在台共時期或到大陸後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時期，她都與諸多同志發生嚴重的摩擦、內鬨，導致組織渙散，傾軋頻生。由於她的階級出身與婦女身份，從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後，即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視，列為重點培養對象，選派她於一九二五年末赴蘇聯的莫斯科東方大學留學。一九四九年赴大陸後，也由於她在「二二八」中的表現，深獲中共中央的信任與重用，出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席等職務，成為大陸台籍人士的頭面人物。但不過數年卻因領導作風與政治問題而遭受黨內的嚴厲批評，迅速失勢。對謝雪紅一九四九年後在大陸的遭遇，多年來外界有多種不同的評述。長期從事戰後台灣歷史整理工作的葉芸芸女士〔編著有《證言二二八》（人間 1990）、《愛憎二二八》（與戴國輝合著，遠流 1992）〕特別就謝雪紅在大陸時期升沈榮辱的際遇及其與台盟同志的恩怨，於1990年訪問了曾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宣傳部長的葉紀東先生（1927年生於高雄，2000年歿於北京），為了解謝雪紅的歷史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材料。本文雖為十一年前舊稿，但首次在本刊公開發表。

■ □ 編者。

謝雪紅，攝於1942年元月1日。



## 謝雪紅何以從備受信任迅速失勢

問：三十年代的老台共，當上中共中央委員的只有蔡孝乾和謝雪紅兩位。蔡氏很早就加入中共，曾參加兩萬五千里長征並長期在延安。謝氏卻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後出亡香港時期，才正式加入中共的。她確實受到中共中央信任呢？抑或是當時特殊政治情勢之需要？

答：她並沒有當過「中共中央委員」，但確實很受信任。一九四九年到北京以後，她的頭銜有「全國青年聯合會副主席」、「全國婦女聯合會副主席」、「華東局軍政委員會委員」、「中共華東局台灣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全國政協委員」等，這表示當時中共非常肯定她在「二、二八」當中的作用。二、二八之後，她到香港結識很多當時在香港的中共負責人，還有其他反對國民黨的民主人士，她和蘇新等辦了《新台灣》叢刊，揭露國民黨在台灣的反動腐敗統治。當時在台灣島內堅持的同志，都高興並且支持她能夠利用香港比較自由的環境，替台灣人說話。也能夠諒解她誇大吹播個人作用之處，事實上，也無法出來和她爭辯。她的中共黨籍問題，是在上海時提出申請，經李偉光介紹，而在到香港以後才正式入黨的〔編者註〕。

問：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謝雪紅和蘇新等人在香港創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解放後該組織遷到大陸，成為流亡大陸台灣同胞之政治組織，何以短短數年之後（一九五二年）「台盟」中央在上海改組，謝氏即失去領導權？

答：謝雪紅等由香港到了北京之後，「台盟」中央本來是在北京的，一九五〇年，第九和第十兵團都集中到華東、福建沿海，準備解放台灣，台灣幹部也都集中到上海受

訓待命。當時設在上海的華東局負責領導台灣工作，書記劉曉（後任第一任駐蘇聯大使）認為台灣幹部思想上不統一，互相之間矛盾是非很多，無法工作，乃要「台盟」先整頓內部，這麼一來，謝氏的種種問題都暴露出來，主要是台灣地下黨出來的同志不滿她竄改二、二八歷史，而且對她那種霸道的領導作風很有意見。後來朝鮮戰爭爆發，「解放台灣」擱下來了，乾脆集中整黨整風，搞了兩年多，到了一九五二年，台灣幹部的意見頗為一致，領導方面才認識到讓她繼續領導「台盟」是不恰當的，根本無法工作，於是「台盟」才進行改組改選，改選以後她仍然掛主席名，但不再掌握實權，本來她是不可能連任主席的，但劉少奇認為這樣對台灣的影響不好，所以仍然讓她當主席。

## 謝雪紅失勢，除了作風之外，主要是原則性問題

問：除了不滿謝氏個人領導作風外，是否有政治路線上的分歧？當時中共中央對台盟內部問題持什麼看法？海外流行一種觀點，認為謝雪紅是強調主張台灣高度自治而不能見容於中共的？

答：據說中央領導幹部中，有人給「台盟」的整風運動定性為無原則的派系糾紛。我不能同意這樣的觀點。當時我在北京，沒有參加在上海的整風，許多具體情況不很清楚，但是可以想像既然搞了運動，就難免在個別的問題上搞過頭，傷一些同志的感情。但是就謝雪紅的個人問題而言，除了作風之外，主要是原則性問題。「台盟」最早在香港成立時，我們是完全支持的，我還在台灣島內散發《新台灣》。日後到北京籌辦之初，她亦常找我去開會討論問

題。我曾提過三個意見，一個是針對「台灣民主自治聯盟」的名稱，我建議取消「自治」兩個字。因為在國名黨反動統治下，爭自治是有積極意義、是進步的。但是當時情勢發展很快，大家都預期解放軍很快會渡過台灣海峽，清廉政治將可實現，則爭「自治」不再有具體意義。這是當時的情勢與認識，現在提「高度自治」當然沒有什麼不妥當的。但是如果因此而認為謝雪紅有預見，那就未免太武斷了。第二個意見是反對她重用一批日據時代就來大陸，替日本人幹事的台灣人，例如楊克培（楊克煌之兄）曾在汪精衛政府幹過河北省的一個縣長，戰後曾作為漢奸處理，但未被關。另外像有一些生意人，這些人當年依勢日本人，欺侮過大陸同胞，本地人對她們的印象並不好。我當時的反應是，我們自己也才進城，人地兩生疏，團結這批人是需要的，但是把他們放到「台盟」的主要骨幹則不恰當。第三個意見是針對她個人的不民主作風，希望她也聽聽別人的意見，不要凡事一言堂。如今回顧，我所提的意見，前兩項其實是反映了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兩個問題，但這純然是我個人的意見，並不代表中共中央的意圖，而事實上也沒有被中共中央所採納。「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名稱四十年來並未更改，『自治』兩個字一直都在上面。

### 因提意見而不見容於謝雪紅

問：她曾經是你所崇拜的英雄人物，日後你與她個人之間的矛盾是怎樣形成的？

答：一九四六年秋，我在台北延平大學讀書時在廖瑞發家裡認識她的，雖然並沒有組織上的關係，但我們是同一戰線上的，因為

有這樣的淵源，在北京重逢之初，我們是非常親近的，因而我也才會那麼坦率地向他提意見。沒有想到她的反應非常惱火，開會中，當眾指著我罵『不懂事，瞎出主意』。時我只有二十二、三歲，年紀輕是比較固執一點，就私下再去找她談，希望能把事情討論清楚，沒有想到一進門，她還是那些話把我臭罵一頓，還說我這樣是阻礙統戰工作。我在極度失望之餘，就和吳克泰討論，我和吳在台灣學生組織時就一起工作的，到大陸後又在同單位工作，後來我們兩人就聯合寫了一份對台盟工作和謝雪紅的意見書，經由我的主管梅益（廣播電台總編輯）交給周恩來總理。當時周總理在南京參加國共兩黨談判，梅益也是代表團成員。據說，周總理看過意見書以後很重視，交代統戰部處裡。但當時統戰部對她很信任，向他了解情況的時候，就把我們寫意見書的事透露給她知道，從此她對我和吳克泰恨之入骨。解放不久，台灣幹部全都集中到上海，準備配合解放軍到台灣的工作，謝不准我和吳克泰參加，所以我們只好留在北京。

### 謝雪紅在失勢前就誣陷同志

問：蘇新曾說過，謝雪紅失勢後誣陷很多台灣同志，確有其事嗎？

答：她誣陷台灣同志並非失勢之後，而是一九四九年就開始的。凡是不聽服她的，她就誣陷為敵人。一九五二年『台盟』整風之後，主席的實權被掛起來，她沒事幹，待遇卻很好，找一些人在一塊，惹事生非，散佈謠言。我和吳克泰被她誣告成國名黨的特務，漢語語言學家陳文彬和她的女兒陳惠娟也被扯進來，可能是我向她提意見時，曾說過陳文彬先生在台灣時任過建國

中學校長、台大教授及《人民報導》總主筆，社會上有點名氣，也受人敬重，「台盟」應該多重視像他這樣的人，對台灣才有號召力。萬沒想到她竟編造出這麼荒唐的故事來。當時北京市公安局根據他提供的材料，到廣播電台來捉我和吳克泰，幸好我們電台的領導很負責，認為公安局捉人沒有根據，也不合規定，給擋了回去，我們才免遭被捕之難。但是有的單位比較輕率，陳惠娟就被捉審查了半年多才釋放，她現在是國際旅行社日本處的處長。我和吳克泰是已經工作好一段時間了，領導層對我們有一定的認識和信任，若是剛來大陸時就受她一告，肯定也要坐冤牢的。

**問：受她誣陷的一共有多少人？公安局怎麼不仔細調查，就依她所提供的材料捉人？其他人的遭遇如何？**

答：我聽說有二十多人像我這樣受她誣告的，詳細情況要問反右時處理其事的陳炳基和徐萌山，我因涉及其中，他們不願跟我多談。地方的公安局對台灣事務不了解！一看她的頭銜很多又是「台盟主席」，很可能就是先信了她的說辭。而事實上，當時中央仍很重視她的，「台盟」內部問題也只有少數直接相關的中央領導才了解，並未擴大。遭遇最慘的要屬蕭來福和潘欽信，他們兩位也是老台共，二、二八以後謝雪紅、楊克煌、蘇新、蕭來福、潘欽信等人都在香港待過一段時期，並且都和廖文毅有過短暫的合作，後來廖公開搞台灣獨立運動，謝雪紅與之決裂。蕭來福和潘欽信則利用廖的財力，為台灣的地下黨在香港辦訓練班，栽培青年幹部。這些事當時都經過地下黨同意的，謝雪紅也很清楚。等到後來這些人回到北京，她卻誣告

他們是與廖文毅同伙的台獨分子，使得他們被關起來審查，後來蕭長年精神失常，潘一度自殺未遂，五〇年代初期就病故了。據說蕭來福寫了一本小冊子——【台灣的出路】，受到香港中共領導人的批評，蕭不服，把小冊子帶到北京想讓有關中央負責人重新審閱，結果小冊子落到謝雪紅手裡，謝竟以此為證據，要求有關單位以「台獨」罪名逮捕蕭來福。

### 謝雪紅被列為右派未必恰當

**問：反右運動謝氏被劃成右派是根據什麼？你認為恰當嗎？「台盟」主其事者何人？**

答：反右時批謝是「台盟」內部自發的，因為台胞的圈子裡對她有意見的人很多，特別是她誣陷許多同志的事情揭露出來以後，大家情緒很氣憤，她和楊克煌兩人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被劃成右派的。至於說，從政治的界線上來評估，她是不是該當右派呢？這就未必是恰當的。當時台盟的幾個領導人是李純青、陳炳基和徐萌山，李純青是一九五四年「台盟」開始批謝時，上面派來主持工作並擔任副主席。李純青來接任之前，「台盟」的第一把手是秘書長徐萌山，批謝的準備工作可以說是在他積極領導之下進行的。實際進行的情況我知道的很不清楚，一來因為我涉及其中，二來我在廣播電台工作很忙，而工作性質對台工作無關，所以「台盟」的活動我並不很積極參加。

**問：文化大革命當中謝雪紅受到迫害沒有？有人認為紅衛兵去抄她的家，她和楊克煌受揪鬥毆打，是「台盟」的負責人指使紅衛兵幹的，你的看法如何？**

答：文革時他基本上並沒有什麼問題，文革是造當權派的反，他已不在位，非當權派。

文革初期，有很短一段時期（大約半年左右），她結合了一批造反派向「台盟」的領導人徐萌山造反，可以說是他這派人的反撲，「台盟」組織了反擊，有這一小段混亂的時期，但很快就過去了。而且大部分台盟的成員也都在各自的工作單位，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受檢查，尤其像我這種曾被檢舉的人，他提供的那些黑材料，給我們找來很大的麻煩，被整的慘淒淒的，真是不亦樂乎，實在是沒有精力在去理她了，何況她再一九七〇年就病故了。

問：一九八六年雪紅得到平反，是否因應海外統戰工作的需要？大陸台胞尤其是吃過她的苦頭的人反應如何？

答：謝雪紅的平反的確是中央統戰部提出的。文革結束之後，當年的右派都陸續得到平反，本來她的平反也是遲早的問題。不過，七零年代海外台灣獨立運動的言論，好像都說謝雪紅強調台灣的特殊性，主張台灣高度自治，固而被中共迫害被打成右

派。當時海外保釣運動的朋友回來常反應這件事，雖然與事實有很大的出入，但是這種偏頗的說法卻成為當時海外的主要意見，因此統戰部才廣泛徵求大陸台胞的意見，處理她的歷史問題。最後是平反了她錯劃為右派這一部份。誣告同志這部分卻無法簡單地一比勾銷，因而在骨灰移放八寶山革命公墓時，追悼文上提到一句「儘管她一生中有過曲折和錯誤」，但還是肯定她在抗日與反蔣時代的貢獻。◎

1990年二月二十日初稿

1993年二月十七日修訂

〔編者註〕

關於謝雪紅加入中共的時期，說法不一。根據謝雪紅自傳《我的半生記》（台北，一九九七），她早於一九二五年八月便在上海成為中共黨員。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在謝雪紅的骨灰移放儀式上發表的《謝雪紅同志生平》，認可了謝雪紅的說辭。

## 【勘誤】

第三期

- 一、《世界的貧困、貧困化與資本積累》一文，p.3.右欄第四行第四、五字與倒數第一、二字「階段」應為「性質」之誤；同頁右欄第十八行第三字「個」之前漏植「兩」字。
- 二、《台灣的財政剝削與鉅額國債》一文，p.16.表二及p.17.表三的「債務數額」，其單位應為「百萬元」。
-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自由主義》一文，p.33.小標「(1) 價格的自由化」、「(2) 資本市場自由化」、「(3) 緊縮的財政政策和高利率、固定匯率的金融政策」、「(4) 貿易自由化」，其標號「(1)，(2)，(3)，(4)」應為「(2)，(3)，(4)，(5)」。



# 霜降 (四)

## 顏世鴻的回憶錄

著■顏世鴻 / 編註■藍博洲

### 六、從北所到軍法處

**因**為單獨隔離，不知道的事情實在太多了。六月二十五日的韓戰，他們把消息封鎖得很緊，所以，我們完全不知道。八月，台南案被送來時，又一直隔絕在A6和A7房。八月底，他們的案子集中在A1和A2房時，我又在A10房，所以也不知道這個消息。原則上，「南所」來的就集中在A1，原來在北所的人就一律到A2。大人物A1居多，不過在A2的也不是都能逃過劫數。

風聲甚多，以後甚至有人說，這裡移送檔案時，都挾上彩色的紙片，以做為分等的依據。其實就判例來說，大都是以案情，加上軍法官的主觀判斷，然後就要看上級的批示了。而行情往往又受到客觀的種種因素的變動而大大不同。我們1950年判的可以說還算不重，1952年、1953年，只要承認，或被人家指認參加組織的，都是二條一項起訴。（1952年，可以看到起訴書了，但1951年，似乎沒有起訴書，而且沒有上訴的機會，一審決定終身。）

風聲裡仍有那「感訓」的雜言，我也未曾做過任何反駁。不過知道有「懲治叛亂條例」，連「資匪」的最高刑都是死刑，即使不死，財產也會被沒收。

有人說，青年時代，死亡離得遠，不大有現實的況味。日據末期，美軍轟炸期間，看了許多死亡的例子，生死在呼吸之間的味道，在我們少年人心內煽起諸行無常的、無可奈何的「死亡的哲學」。生到死的距離，不一定由年月

的尺度去量。一枝稻草可以改變人心的平衡，說年輕人不怕死亡，是自以為死亡與他們無關。這種說法是還不知道死亡如何時時刻刻貼在身邊的人的邏輯。或許，人到一個年齡就會逐漸怕死，而過了這歲月他又逐漸對死亡感到親近，一直到死亡就是它本身。這是一種拋物線型的生死觀。不過，事實上死亡並沒有對任何人可以適用的法則。

人類可能要自發明文字以後三百代，才能擺脫自古老年代便埋伏在心內的禁忌、恐懼、圖騰、自私。

不知道的事情，實在太多了。就韓戰來說，為什麼要對同一民族進行如此慘烈的戰鬥和殺戮呢？由三韓的時代，高麗、百濟、新羅，就如此互相征殺。而後有了李王朝，卻產生了那麼無能的皇帝及官僚。權力這種東西，如眾人所說，會使人腐敗，而人卻那麼熱衷於權力。

人是不該賦與他什麼權力。可惜，人的才能在非常之時及太平日子有些迥異，而權力卻會誘惑人心。扭曲的權力和對人類命運的理解，迫使那些無權階層的人們，要在屈辱的死亡和戰鬥的死亡之中擇其一，反正他們只剩下那麼一條死路。歷史上，善戰者都會留下一條路，讓敗者可以走。如白起，如項羽，都不能善終，都是因為沒有這麼一顆善戰者的心地。對那麼絕的人，別人也只好那麼對待而已。

不知道的事情有可以不知道的，也有不可以不知道的。而一個人，在個體或群體中，不

可不知的事情也很多。那個時候，偏偏什麼事情都不知道。

「北所」是因為「南所」人多，臨時在五月砌好的。隔間只有一層瓦磚，水泥和得也不勻，所以處處有些小洞。以後又有人用鐵絲把它通大一些，所以這隔牆的細孔，可以當作通話之用。不過，通常押房內都有一兩位特殊份子，大家心中有數，不敢冒這個險。因為談話雙方都要有人當哨兵，尤其「白臉」動作很快，所以時間也要看對方。

當A1和A2都是同案的人時，這條牆的孔道就發生一些作用。其實也不用那麼急，到了看守所就知道太不值得了。八月上旬，我移A10，這種作業才開始的。A10比A2要亮一些。B5至B8感覺上比較窄了一點，深度應該是夠的。以後十三年七個月，我住的地方，A10可能是最好的。綠島、小琉球是比較自由，睡的地方也寬，但上下舖，總使人覺得有點侷促。

其實一個人睡的地方，六尺長四尺寬，甚至三尺寬很夠了。我睡相不好，三尺寬的床，極可能一翻身就翻倒床下。坦然睡個好覺，木板床、榻榻米都不錯。舒服與否，一個人的主觀也佔很大部分，

台北案離開北所以後，就輪到我們「學委」案集中了。除黃采薇（註二十七）小姐，四十四個人，分在兩個房。李水井（註二十八）、陳水木（註二十九）、楊廷椅、陳全目（註三十）等人同房，這說明他們已經不怕我們套口供了。換句話說，到軍法處不過是換個衙門，過到手續而已。傳說吳石案的許多人都沒有經

過軍法局，就由此地直接到最後一場。當時軍隊沒有正式的戶口，這倒方便，甚至也不用「死亡診斷書」來註銷戶口。

我記得，北所的人搬到A2，南所的人就到了。那段時間，那牆上的孔道很熱鬧。我也利用過一次，是葉盛吉要我去聽的，不過內容本來就知道的。只是那親切的聲音，好像有一點黏性。後來在倒馬桶時，也見過他一次，只是一句問候的話：「好嗎？」

有許多話要說的。葉盛吉可能也是對我如此，但究竟時間和空間都不允許了。

有的人，真是有那麼多的話，又那麼多次一而再佔用那孔道。孔道當然不只一處，但在安全性來說，只有最裡面的比較安全。其實他們可能也知道，只是閉一眼，裝傻而已，好像是如來佛看齊天大聖。說來四十四個當中，真正住過大陸的只有我一個人。大約七年多，八年不到。他們唸過歷史，卻沒有我的臨場感覺。這時候的我，比以後在綠島、小琉球所表現的還要沈穩。我沒有向任何人提到自己的想法，連在襯衣內側上寫上姓名及家裡地址的用意，也沒有向人家提過。衣服曬在外面，寫上姓名，不會搞亂，這沒有什麼不對。當時是夏天，連汗衫都省了，襯衫穿的機會甚少。一進來，人家就會說：「馬馬虎虎三個月，糊里糊塗半年。」所以，連秋天的衣服都寫上也不為奇。因為借到硯墨毛筆，不是一件易事。不過，沒有人注意到我連地址都寫上去了。

這裡是「森嚴」的，當然不會有人跑煙，而且值班時間，他們也不抽煙。只有放出去曬太陽時例外，時間長，開口要，他們會給幾

註二十七 ◆ 台南女中高山學生，當時十八歲，後被控以「參加叛亂組織」之罪，處刑五年。

註二十八 ◆ 台南人，日本山口商專畢業，曾任開南商工教員，被控為學委會委員兼書記，處死刑。

註二十九 ◆ 高雄人，被控於就讀師範學院時參加地下黨，領導學運，處死刑。

註三十 ◆ 台南人，被控於就讀師範學院時入黨，為師院支部委員之一，處死刑。

根。一個房子二十多個人，抽煙的也不過是半數，一個人過幾口，癮也夠了。

那時候，我還不會吸煙，所以也不覺得這個癮如何。

八月底的某一天，我們全案到外面照團體相，以後這張相大概到處展覽了。兩個人扣在一起照的，我和黃小姐扣在一起。

我心中盤算，我們的遭遇是什麼？風聞中已經知道，我們去處是軍法處看守所。我笨到連看守所就在醫學院的近鄰也不知道。其實，台北的街路我不算頂熟。

在可以感覺到秋天的冷意的下午，我們離開了北所。這一次，我和原先不認識的葉雪淳兄（註三十一）扣在一起。我們兩個人分在A區的十號押房，成為三十三及第三十四位住客。A10大約不到二十平方公尺，長是否七公尺都成問題？沒有馬桶的那邊，一排睡十八個人；有馬桶的那邊，睡十六個人。一個人大約三十公分多一點。這麼算，只有六公尺左右。而寬度，兩個人的腳要相插，所以只有三公尺多一點。到了這房子，我才記起當日本的學生兵時到這裡出差過一次，是陸軍經理部的倉庫。外面的初秋，一到裡面，就為汗酸味甚濃的酷熱世界。

## 七、A區10號押房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日，在韓國的戰場，只剩下釜山的一角，不過美軍的火力已經增強了。客觀地看起來，北韓軍的攻擊，從七月底到八月初是一個巔峰。九月上旬，仁川的登陸戰已經被認可了。

仁川附近只有一個團，而且是沒有實戰經

驗的兵。這在北韓來說，在戰術指導上是一個不可寬赦的錯誤。在拖長的戰線，在重點不置重兵，在韓國戰史上是愚劣的。因為日本人當年就由仁川登陸，中國與韓國交戰的年代也在仁川登陸過，甚至豐臣秀吉也用過。

我們去軍法處的時候，仁川之役還沒有登場。九月三日開庭，葉盛吉、葉雪淳和我都是九月四日早上，第一批上法庭。生死攸關的事情，我不敢用那不大通的普通話，就用河洛話，所以還要經過一個翻譯。三十分經過這麼一翻就去了一半，實際說的只有十五分鐘。葉盛吉曾小聲吩咐我，把一切推到他身上。我知道葉盛吉的行情比我險得多，所以只好攔在自己身上。這一慮，在結果來說，未曾救了葉盛吉，而自己卻多了二年（這是按照行情來說的）。

「我只是一個理想的社會主義者而已。」

對我這句話，軍法官很得意地搬出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一講的話：「有了理想，就產生信仰；有了信仰，就產生力量；有了力量，就想推翻政府。」真是老天！法官的聯想力認定我有力量了，加了一碼。前一天，人家已經一再叮嚀，千萬不要和法官抬槓。法官是人，不是天秤，感情上的喜惡，一來一去，相差甚大。我不再纏辯下去，低聲下氣地求大人多多原諒少年無知，而結束了這一幕過場戲。也許本來要加兩碼的，因此減了一碼也說不定。以後我們所知道的行情，吳瑞爐（註三十二）和鄭澤雄（註三十三）都被加了碼，判個無期，到了上面批下，六個無期一律改為「極刑」。法官是無心的，他只是肚裡有氣，給你小子一個「無期」，殊不知，後面還有一關。有位軍

註三十一 ◆ 葉雪淳，台大理學院學生，被控「參加叛亂組織」，處刑15年。

註三十二 ◆ 台中人，台北師範畢業之後，任斗南中學教員，被指為「台中支部」重要幹部，處死刑。

註三十三 ◆ 澎湖人，就讀台北師院時參加學運，畢業後，任教於澎湖水產學校，被控於一九四七年十月入黨，擔任小組長，處死刑。

法官，四十出頭的上校，他真有一套，判兩三個死刑，其他一律十年。後面一關可能是很忙的人，不能來個前面幾個陪走馬場町。同刑要另分高低，就得批下充分的理由，不像在五名死刑和六名無期上面，紅弧一勾，寫下一個「全」，那麼省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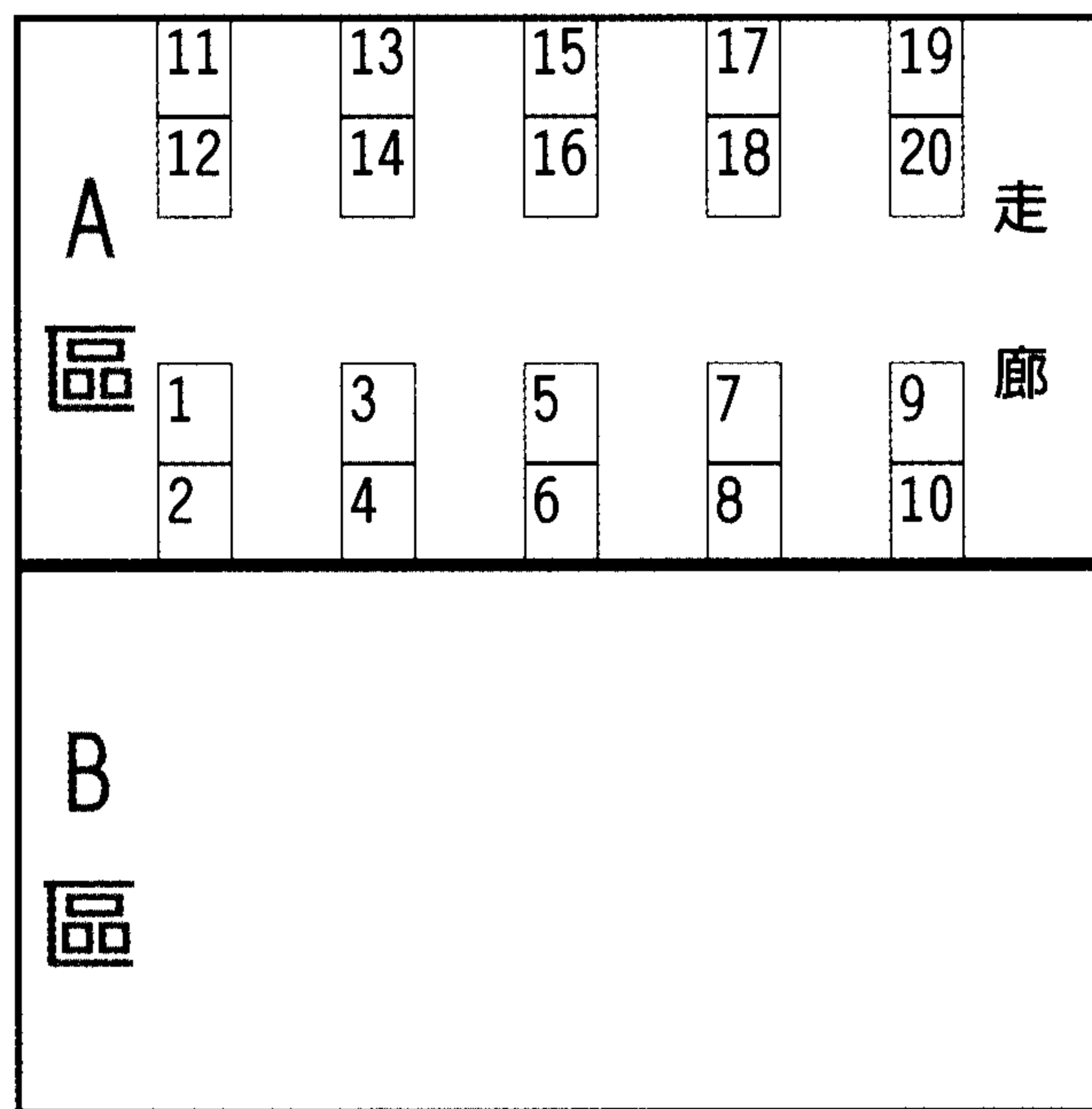
我們的案件，四十四位的訊問，三天就結束了。只有三個人多開一次庭，李水井、楊廷椅、陳水木。我們的判決書上，結案的日子寫的是九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訊問以後三個星期。不過我們遲到十二月三十日，到了軍人監獄那一天，才真正拿到判決書。而判決那一天，在新店看守所的樓上，只離軍法官不到兩公尺（那地方就是那麼窄），我看到那紅色的弧和「全」字。這是拜當時視力二·0之賜。而法官的表情，也沒有絲毫得意，甚至有一點失意的樣子。

順序有些倒置了。這裡，青島東路三號，「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看守所」，就是以後的主題。這是「悲壯的快板」的第二樂章。看守所押房的大小已經說過了。第十押房的南邊是約六吋的木條格子，以鐵筋串起來；北邊是面向外面看守所常駐的走廊；向西是與九號房相隔的木板牆，很厚，只不過是不讓犯人互相看得見的牆而已，木牆上有一道架子，可以放一些各人吃的東西；向東邊是與B區相隔的很厚的水泥牆。

A區共二十個押房，B區可能少了一個，這是我們有一次到那邊理髮時大概的印象。二樓是女押房和受優待的人物的押房。優待是生活空間的優待，並不是「早點名」（槍決）的優待，而且可能是屬於國防部軍法局。所以，那位因好色出紕漏的軍法局長包某，不但親自嘗了這裡的味道，也嘗了「早點名」的味道。

進了十號押房，我讓葉雪純睡上頭，自己就睡在馬桶邊。以後來了新客人，我仍舊睡在馬桶邊，一直到十一月一日離開為止。「北所」

的馬桶是新的，這裡卻是陳年老貨，口徑也小一點。這裡，家裡可以送菜，蛋白質一多，味道就不像「北所」單純了。而且吃壞了肚子的人難免，人數又多，非常熱鬧。如果以一家卅四人共用一個廁所，就可以聯想到了。



軍法處看守所一樓平面圖

大家都以袍袱一條把衣服筆記之類包起來，上面敷一條用舊的毛巾，就是枕頭了。枕頭的長度，按照各人分下來的寬度，所以也間接地代表一個人的領域。活動空間由此延伸到中線止，不過它偏偏不夠一丈二尺，所以，躺下來的時候，雙方的腳必定要一些尺寸相交。而且寬度不夠平躺，所以要同向側臥，反身的時候，就得大家一起來，才不致於把秩序搞亂。

「拉風」也是這裡遇見的。用竹片把毯子兩端固定下來，一端吊在天花板，下面綁著兩條繩子。兩個人各站在東西牆上，你拉我放，我拉你放，隨著毯子的飄動，就會有空氣流動。

這裡不似其他的牢，沒有老大。我守在馬桶邊，不愛說話，一天到晚看書寫札記，在雜犯（走私、販毒、搶劫、殺人及一般軍事犯）眼中反而有點威嚴。他們如果不守規矩，我把

那象眼一瞪就生效了。在我們這批中，我是一個小卒，然而我向人家借書，大家都爽快地借我。我看得勤，又看得快。初向一位法律系畢業的借了孫本文的《社會學原理》，連看帶抄，五天就還給人家了。我們房裡只有一個小電泡，晚上不能看書。好在向北邊有兩個鐵格子的窗開向看守的走廊，白天還可以看書。

葉雪淳的父親，消息靈通，我們到軍法處的那一天，他就在門口看到兒子。九月三號的早上就送東西來。葉雪淳問我有沒有舊衣服要帶出去洗，我就把那一套深淺藍色小格襯衫，和草綠色的美軍褲子送出去。第二天，就由葉家裡，以我的名字，寄來了東西。而第三天大妹就來了。（送東西的條子上有名字，這邊要寫收到某某的字帶出去。）我這才記起，襯衫和外褲，都有我的名字，家裡的地址，還寫了父親的名字，在這裡居然派上用場了。

以後，在這裡寄出的信也到了。我寫信很勤快，一天曾經寫過七封信。明信片是兩角，不用信封信紙，也不要貼郵票，所以寫的明信片可能多一些。除了在刑警大隊時黃華昌和陳子元兄給我的十五元，我身邊再沒有錢。毛巾、草紙、信封、信紙、郵票都得花錢。在這裡，家中寄了錢就掛帳在福利社的戶頭，一星期買兩次東西，由那戶頭扣掉，東西並不貴。我需要看書。公共衛生、內科診斷學和熱帶醫學，這一些為主。只要不是社會科學的書，都可以看。不過，書上面還要蓋章。所以這些書，包括台大圖書館的書都可以借到。

在這裡，我只寫讀書的札記，卡片不寫了。我當時雖很節省，札記的筆記簿，總會買好的，耐用，而且經久也不怕損壞。卻不知道（應是預料到）落到這種空間，一切花費，連時間在內都是多餘的了。人生有許多變數，且大部分不是真正能完全控制的。用台灣的諺語說：「千算萬算，不值天一劃」。當人類由境遇知道了自己能力的極限，就會走上這古老的

諦觀的路上，設法來安撫自己。

從主觀和客觀，我是這亂世的一條小魚而已，而且只有甚幼稚的邏輯。人生的一切往往都得做二中擇一，糾結徘徊在未知的等待或索性放棄之間。而且信任的朋友，也怕朋友懷疑我已不信任朋友，所以，信任的代價就是昂貴也不足惜。「士為知己者死」的古老、封建時代的義俠的慷慨心情的血的溫度，仍然環流在我身上。

為知己者死，男子平常事。畢竟，對變化無常的生活的變化，尤其死亡，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的心情是早熟的。但對異性的情感，卻是偏於「遲開的玫瑰」。

## 八、點名

偶而，晚間有一個特別的節目，看守長來晚點名。我頭一次遇到時，感到一股詭異的氣氛，似乎大家的情緒有些出奇的緊張。看守長的點名，一房一房地來。千餘人的點名要花費不少時間，而且，他偶而會抬頭，認一下應聲的人。這似乎是緊張局面的頂點。等節目完了以後，我默默聽各房互相傳遞的消息，我立刻知道，明天破曉之前，又有人要走路了。而被抬頭一認的人，大都是凶多吉少。以我六十一天所經驗的，和別人差不多，什麼案是大概可以肯定的。而早點名的可能率也高到一半以上。當然也有例行的點名，不過，那時候彼此之間卻沒有那份難以形容的緊張的氣氛。那是如打輕機槍的速度那麼快，一個「有」或「在」還沒有出口，他已唱出第二個名字。這就是他的特殊的地方。我們是邊房，看不到對面第八房，在這時候，可以窺看那個生死簿上做的記號來判斷是真是假。我在六十一個日子裡，沒有送過「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場面。不過，當事人在那晚上都得做種種準備。不過，這晚點名或早點名，卻不是絕對的。有時候不來這一節目，隔天早上卻仍然有早點名，所以，沒

有晚點名也不是準保明晨無事。

我的國語，勉強可以聽，但一些「官語」是不懂的。這一點完全要怪我自己的心態。一年級有各一小時的國語和國文，國語是一位燕大出身的白老師，我卻多半蹺課。當年，自認為在紫江小學唸了一年半旭瀛書院，雖是日本人的學校，地位特殊，一星期有兩堂課，教北京官語。紫江學的是「小狗叫！小貓跳！小孩子哈哈笑！」，而旭瀛是由「羊！小羊！」開始。而且我學過四書、詩經、唐詩、古文觀止幾十篇，「父親大人膝下，稟敬者」，寫一些古文式的書信也不難。日本人的中學，有「漢文」一課，專教「中日兩國的中國式古文」，不過要用日本人的方式唸。有時候，真如德國人的分離動詞，前後顛倒。在中學，漢文我是全年級的成績最好的。這些心裡的累積，致使我對國語不甚熱心。分析起來，是很大的錯誤。語法，我以後讀王力的《中國語法》，看些副刊的小說和專論也勉強通了。就是發音，尤其四聲老是不對。綠島是普通話的天下，而後遇到年輕人，這普通話就不通了。我可以不經過日語、台語的翻譯，直接說國語，而發音又如此荒腔走調，很多人都肯定地認為我是雲南人。只是，中國四百餘州，我只到過泉州、廈門和上海市；深滬只算泉州管轄下的南邊小漁村而已，而且也只住了半年，只記得唯一的街路的斜度很大，除了幾家華僑砌的比較出色的家，很像台灣的一個漁村，不過一家肉攤子，蒼蠅很多，本來深滬的蒼蠅就多了，還有臭蟲。

那時候如國語學好，不必經翻譯官，或者如那一位「老莊」是懂河洛話的，我心中必多一些餘裕，也不致於多惹了是非。本來這是我一生的大疏忽。這個一問一答是必定的，早些打好腹稿，就不會錯得太多，給我的軍法官無端逮了一句「理想」的字眼。不是損他們，他們除了三民主義以外的書，可能很少讀過。不要說拉斯金，可能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

是什麼也不知道。對他們談，就該投他們所好。像那位老上校是鳳毛麟角。也不像日本特高課的警視，個個都是高等考試出身，馬恩列史的著作都看過不少。臨時準備台詞，沒有心中反覆的檢點，當然一遇到小小風浪，就有那難應付的感受。

由點名開始心中有點徬徨。由行情及風聲的起落，我也在某一天，寫了約一千字左右的「遺書」，結果是沒有派上用場，而且到最後也不知放到什麼地方去了。那時候的國文，還是「初學入門」，自己稱為五花肉式的那一千字的文章，如能留下來，確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幼稚」吧。

## 九、押房生活

「軍法處看守所」一天開飯兩次，早飯九點左右，晚飯下午五點左右。大概當時軍隊的情況也是如此。那時候可能還是物價不大安定，尹仲容先生還取高利率的時代，吃兩餐，慣了也無所謂，日本人在戰國時代以前也是吃兩餐的。一飯一菜，飯是吃得飽，可以添飯，菜則無魚無肉，玻璃菜什麼的加湯，上面還浮些油水煮成一桶，每人一碗。當時的軍隊和苦一些的老百姓，過的日子大概也是如此。在判決以前不准接見，不過家裡可以送菜，也可以用記帳方式買些罐頭、奶粉。不過家裡菜送得太多，或太好，反而不好。因為外役由外面帶到押房的路程中可以揩油，太多和太好都是促使他們起意的動機。我即由葉雪淳家裡以我的名字每天送小菜，大妹來的時候都是衣服和書居多。

開飯大都是取小組式的。家裡送菜的和幾位沒有的，分成幾組用飯。遇到進貨是大批的，如中秋月餅，來了就全房各分一個。有次葉雪淳的家裡送來了大鍋的炒麵，大家都分到一小碗。後來，我才知道父親為此每個月付葉雪淳家裡二百元。被捕前，我們兄妹兩個人每

個月只拿二百元。我自己有獎學金四十三元，米二十八斤，加上破例的工讀生，每個月廿五元。所以，我大都只拿五十元，一百五十元給妹妹。我還有一個副業，賣血。當年舊台幣換新台幣，一錢黃金十六元，血一百西西兩百五十元，可見當時賣血是好副業。但血價一直沒有上漲，黃金卻漲了一百倍了。

所以當我知道每月送菜要花二百元，到軍監以後，我就跟父親商量，不再送了。刑期十三年，不是可以速戰速決的。我大略知道，家裡的經濟當時還是艱苦的。我只向大妹要小魚干和多種維他命，其他就是書的來來去去。

我在這裡住了六十一天。除了吃飯、拉風、開庭、倒馬桶、或理髮，都是看書、寫信、寫札記。押房裡面有律師、外交官、十八歲就畢業於聖約翰的企業家、醫師，各行各業都有。讀書，大家身邊都有書，只要開口借，是可以借得到。而且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開口問，也沒有問題。我一直寫札記，卻一直留在各地，醫學院的不用說，在綠島就留下很多，小琉球也留下不少。

除了讀書，在那種環境下，也難得做什麼事來打發漫長而溽暑的白天。後來聽說，于凱案的陳平明知是禍逃不脫，每天仍背英文的辭典。押房太擁擠了，連下棋的空間都不自由。不然就是睡覺，晚間若是難入眠，白天補一補睡眠也不錯，可算是消耗時間的好辦法。當然夢裡不會有好夢。三十八年後，我仍然時時做夢，回到那押房，甚至夢到出早庭。我沒有李後主那福氣！「夢裡不知身是客，一嚮貪歡」。

我們的房間可以看到早上一批批洗澡的人群。有的人索性以毛巾圍著下部就出來，到了池邊猛沖水，喝水，身體馬馬虎虎一擦，將內褲就地洗一洗，穿上以後又回來，口杯帶著自來水用毛巾蓋起來。一批兩個押房，時間是五分鐘，就說一切很順利，兩區的人洗完也得一小時四十分鐘。所以五分鐘實在是很寬大的時

間了。而我連來回的一分鐘算上，三分鐘就足夠了。不過有許多事情要先準備好，我們可以用「龍角散」的小罐子的水刷牙，而且漱口的水還得利用，把衣服打濕，抹上肥皂。這一套功夫，大多數的人都學會了。反正如要好好漱口，到了池邊，立刻可以做。

那時候，一個人一天一公升的開水，加上菜湯，兩餐大約可有一公升。在室內汗流不停，水是不夠的。而池水（水龍頭不夠，七十多個人用，我一向選池子那邊，池子很淺，大約五十公分高，池水也只要一尺左右吧。）可以隨意地用，隨意地沖，還可以帶回一公升的水。有些雜犯身邊有錢，不喝生水，他們可以包月，由外役供給額外的開水。不過外役，他們這些「叛亂罪起訴」的大小兒郎，是沾不到邊。（這一點刑警大隊好一些，連簡文宣在那裡也當過外役。）

憶昔當年，在軍法處看守法，我們如前面說過根本沒有見到什麼起訴書，當然也不知道是什麼罪，什麼條文起訴。以後蓋的那棟死囚獨房（也有不少故事，不過不屬這裡的），還沒有蓋。那些可能是一九五二年的故事了。那時候，都是一審決生死，該走的人先判決。都是在破曉時刻，是法庭驗明正身，只唸主文，就由憲四團出紅差，兩個人陪一個綁起來，背上還得插上那中國固有傳統文化，帶到馬場町，（由有篷的軍用字車搬運）在如今的青年公園的一角，當年的川端河畔的沙灘斃掉。

那邊的故事很多，我非親眼看到，只提一些比較可信的。那年的「秋決」是由九月卅日「麻豆案」開始的，零星的，在這以前就發生過；簡文宣案，是什麼時候？我也看不到資料。由《中央日報》追蹤，刊載不漏的也是到我們這一案為止。十二月份，就有許多案件沒有見報。不過，據說台北車站和軍法處，倒是每案必有海報。是否有理由和說明，就不得而知了，因為見過的人也不記得。

反正心內自認為離那行情不遠的，心上就比較複雜一些。倒是鐵定是大禍難逃的人，到那時候就灑脫一些。自以為一劫難逃，卻好運道落個無期徒刑者，回房時像一個打了勝戰的軍士，臉上有欲蔽還露的喜色。白以為無緣卻突然被請到的人，因為私物沒有整理，交代的事情也沒有頭緒，就有些手忙腳亂。事實上，行情是起落無常，直似台北的氣候，很難捉摸。千萬別誤會，這與怕死又是另一回事。但話又說回來，「死者不可復活，亡者不可復興」，這是不可不慎的事。而當年這一災禍，在另一方，卻是似乎多幾個人，少幾個人都是小事一件。批此生死簿的人，大權在握，似乎隨自己的心意，偶而可以多加幾個。如我們的案件就把六個原判無期的一王超倫、鄭文峰、吳瑞爐、鄭澤雄、賴裕傳及葉盛吉，一筆勾了一個「全」字，湊成十一個人，加上前一天台北案的十四個，遙向廿六日起向美軍突襲的中共二十萬「義勇軍」，來個回應吧。

所以，「朝鮮戰爭」看似遙遠的另一世界，卻如月亮對地球的潮汐的影響那般，有一些引力的存在。六月二十五日，在「北所」二樓約十一點時聽到的貝多芬的第五的那三連音，還有，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一個人生命的結束，剛好有許多美軍狼狽地死在北韓的雪地上；時間那麼湊巧地連在一起。

對擁擠我後來也習慣了。晚間睡不好，白天補。反正，每天、每天，就大部分的人來說，都是「最長的一日」。我倒覺得日子過得太快，可能在當時，似我行情的人來說，是一個異例。一下子開飯，一下子又要睡覺了。並不是我對死亡有不懼的勇氣，只是看了書，就可以忘掉一切。那時候也不管眼睛會如何，一

直到日落，那如豆大的燈泡亮了，外面漸黑了，我仍是一直讀書、寫札記。難得可以不被騷擾地專心看書。而且讀書，我真可以忘掉一切，尤其時間，身在縲紲，還有或可能明天早上有人來請上路。

如果說我是心和氣靜，那一半以上可能是假的。當年底事，我仍然沒有辦法理出一個明晰的認知。只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我還做不到如史可法、譚嗣同那般對生死泰然。

當年，先修班的國文老師金先生，那浙江口音甚重的普通話，帶我們唸「四月十四督鎮史可法，匆匆奔揚州」開始的〈揚州十日記〉。那時候，史可法分明是去與揚州軍民赴死的。每讀近代史，最感動六君子中的譚嗣同自己選擇死亡，而且死得那麼泰然。

「生」，對似我之輩，是不頂重要，這話並不大離譜。但對台灣那一群精英來說，甚至今天，我心中的痂皮下，仍會隱隱作痛。

開庭之後，大約兩個月到三個月就結案；留的，到軍監；走的，到馬場町。

整日，難得說幾句話。自小時候，一半是環境，一半是習性，我很少說話。

林書揚（註三十四）兄在中學高我一屆，而且因莊孟侯夫人的娘家就是林兄的家，偶而有事情找他，算是點頭之交。同房許久，總共談不到十句話吧，而林書揚兄也很少說話的。他們的案子判決以後，我才知道，他不是台獨的案件。

當年，許多人都是出之於無奈，為了救人而出來自首。蕭道應（註三十五）夫婦就是如此。台獨的廖文毅則牽涉到廖家的財產問題。在軍法處，政治與法律是一體兩面的一隻怪獸。

註三十四 ◆ 台南麻豆案，處無期徒刑，實際坐牢卅四年又七個月。

註三十五 ◆ 屏東客家人，台北帝大醫學部第一屆畢業，與鍾浩東同赴廣東，參加抗戰；戰後加入地下黨。詳見藍博洲《紅色客家人》。



不吠的狗，也有好處。當時我七十二公斤，一七五公分。在還不富裕的台灣，當時胖子還不多：以我的噸位，大概看起來很狠。不說話，那些牢霸反而有點對我敬而遠之。開水走私，太不像話，白眼一瞪就見效了，倒很管用。

事實上，在此以前，我不但少說話，也拙於說話，自小如此。中學沒有朋友，小學也只有三位。很少說話，可能也是原因之一。該說的不說，不該說的廢話一大堆。這也是我的現況，仍是屬於不會說話的那一類。

沒有坐過牢的人，不會瞭解，這裡是最赤裸的，也是最黑暗的地方。

在看守所購買物品是轉帳式的，匯來的錢一律存在福利社，你買多少東西，就由此扣去。身邊應該是沒有現款的。但「禁忌的遊戲」就貴了，而且要付現款，那些現款的來路就妙處多多。那時候，看守不似現在那麼黑，而且也沒有人敢到「匪諜」家裡去拿現款。當時一包七角的香蕉煙是十元，有的穩了，甚至二十元買三包。當時是鬥鬥腦筋，一半是看守檢查時也半閉著眼。我當時不抽煙，不喝酒。純粹是一個旁觀者而已。紅燒豬肉，骨頭穿一小洞，小洞中有一捲塑膠袋，裡面就是捲得緊緊的數張拾元大鈔。煙來了，洋火卻沒有。最普通的方法就是抽幾枝乾稻草，外面以綿絮包上，然後借用馬桶的那塊木條，用力摩擦到有絲燒焦的味道，立刻抽斷成兩段，用勁一吹，火便來了。吹風是有祕訣的，不是亂吹就著火。點煙的法子還有許多，連造酒的方法，這裡就不用一一介紹了。

一枝香煙，一個人頂多兩三口，有福同享，見者有份。但煙要嚥下，不能輕易噴出口外（多麼不衛生），怕人家看到那青煙，麻煩就來了。有時候，看守聞到味道就來查房，我在那十號押房住六十一天，來過幾次，都無功而退。

除香煙以外，還有老鼠尾巴，把一支煙撕

開，或把外面撿到的煙屁股加上，利用日文版的簡易英和辭典或聖經紙最好，捲成一枝小火箭，抽幾口過癮。

開水有價，一隻紅燒雞也可以混進來，這些都是外役搞的。對他們倒頂客氣的。我們那些浩浩蕩蕩的「早去不歸兮」的人們，都是從容不迫。在像他們那些人則是哭帶鬧，不成又得拖帶拉，實在替他們心裡難過。這些都是在戒嚴令下，改為軍法的貪污、走私、搶劫、偷軍用汽油或電線的案子。當然，他們也有「視死如歸」者。

每天，不管寒暑、晴雨，都有倒馬桶的節目。如以每個人的大小兩公升計，三十四個人就有六十八公升。我後來挑過不少水桶，那馬桶頂多只能容納六十公升左右而已。我們在「北所」每天也做過，沒有什麼新鮮事。不過「北所」是在石棉瓦的屋頂下，而這裡卻是衛哨下面的空地。風大的日子倒要小心。有時候吹起的點點滴滴，會灑到臉或身上。還有一個任務，幫他們撿幾條煙屁股回房，更可以吸近十分鐘的外面的空氣，當然要用一點拖字訣。但那牆上的小碉堡，有人荷著卡賓伺候，不是頂輕鬆的節目。你也可以做到視而不見。不過，時間太久，看守先生就會出來，那時候臉色就難看。天下事，致中和，天地位焉，萬事太平。

這裡放出去曬太陽是難得的。「北所」幾天可有一次，我住了六十一天才遇到一次。所以唯一的好日子是理髮，全房出去。他們也有好處，利用機會查房，看看有什麼違紀的貨色。理髮自「北所」就是和尚頭，兩個外役來理，一個人三分鐘，不管鬍子，不管洗髮（可以自己洗）。一個押房一小時就完了。理髮都在B區的前面，前面四個押房，如有熟人還可以聊一聊。當時我不知葉盛吉在二十七押房，而且他的押房不面向外邊，也是看不到。

他們發的囚衣（事實上，還沒有判決就發

囚衣，有些不對吧！）是紅色短褲和短袖布衫，只差沒有發一頂紅帽子。他們只管發，也不問你的尺寸大小。我的實在太小，短褲一穿，屁股就開了洞。反正那種場所，光著身子睡覺的人也有，也管不了什麼好看不好看。囚衣就是囚衣，再斯文的人，穿了就有那落魄的楚囚的味道。有許多人，根本不穿，我倒是不禁不忌。

## 十、秋決

押房與走廊，兩區都有個鐵門。早晨如果鐵門開得太早，那不是放洗臉，而是來請走路的。有一些心內有數的人，沒有開門以前，總要去蹲馬桶，然後用乾毛巾，摩擦身體，換上一套新內衣。我看過吳思漢做這種節目三十多天，就是那「秋決」閉幕以後。不過有些人不管這一套，在十月底的台北，天色未明，就有人光穿著那一條紅短褲，連鞋子也不穿就走了。「反正身後事，管他好看不好看，也不是要去時裝表演」，這位羅姓仁兄（註三十六）的高見，倒是有理，他連自己的衣服都預先送給那些難友了。開庭後，還在法官面前和太座（註三十七）吻別。當看守問他，為什麼不帶東西，他說：「你是要我這個人，問我的東西做什麼？」看守似乎見多不怪，默默把手銬帶上，領他走了。他也不強做微笑，也不喊口號，也不做愁態，好像平常出去散步那般地走了。夫妻雖不是同月同日生，倒是真的同年同月同日同時亡（註三十八）。他可能是福建人，是老蔡直屬的無線電操作者。

東坡當年的念奴嬌，「大江東去，浪淘

盡，千古風流人物。」我就另一角度，感觸到這段詞的意義。杜甫的流亂，王維的逆境，義山的不遇，放翁的失意，稼軒的灰心，東坡的巔波，這些都是中國文學詩詞意境最高的原動力。李白何曾不如是，香山又何曾不如是。而法國法朗西的「眾神之渴」（註三十九），就是對一代法國精英的弔亡。

我不懂詩，除了背一些詩詞，平仄不分，不是做這種工作的材料。充其數，不過是這大時代的奔流中的小泡沫，地球這部大百科中的一字誤植。我並非自不量力，只是趁尚未老得糊塗了，寫下一些追思的方塊的堆集而已。

在那種環境中，曾經是常犯偏頭痛和十二指腸出血的老病號，自入「北所」就沒有痛過。好像是一場奇蹟，或者老天爺的偏憐。只是照舊每個月大約要犯一次扁桃腺發炎。在「北所」，有一次，那位女的馬醫官問我，為什麼知道昨晚發熱三十八度以上，我只淡淡地回一聲：「我是唸醫的。」她也一聲不響，居然給了廿八粒Sulfadiazin。

軍法處的醫官是小氣鬼，而且小病根本也不讓你去看，做這判斷的就是看守先生。我只好買一盒拜耳的阿斯匹靈，泡水嗽口，也當做含片。這是許強先生教內科時，教我們的一個偏方。（如不相信，不妨試試，這偏方還蠻有效的。）鐵盒裝的拜耳的阿斯匹靈，似乎不是現在上市的五百公絲，而是三百公絲。

等新店的看守所開張，部分不夠格「早點名」的，就陸續離開這裡了。而且「秋決」來了，大開殺戒。第一批是九月三十日，麻豆案的蔡國禮醫師、謝瑞仁醫師、張木火老師先走

註三十六 ◆ 羅定天，廿九歲，雲南昆明人，處死刑。

註三十七 ◆ 賴瓊烟，廿六歲，台中市人，處死刑。

註三十八 ◆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八日清晨六時。

註三十九 ◆ 阿納托爾·法朗士（1844-1924）以十八世紀末巴黎革命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小說反映的現實是：革命雖然勝利了，但不幸的窮人仍像以前那樣不幸。打倒了貴族，卻出現了新的老爺—資產者。

了，而且無期徒刑一大堆。連不識字的，根本認不得馬克思、牛克思的鍾益老先生也派了一個，不過他還好，後來特赦歸台，過了幾年才在高雄去世。

這時候，「北所」的馬路消息的風聲，就再也沒有人去信它了。蔡孝乾是為了這一套說辭，才被說服的嗎？（成功中學波及台大法學院的部分，倒是真的「交付感訓」，但那時候『叛亂條例』還沒有出爐。）真的這樣才把全案繳出來的嗎？他是在瑞金當過內政部長，走過二萬五千里的人呢！還是怕死？千古艱難惟一死，唉！

這歷史的謎題，多想也是沒有用。據說，本來李蒼降（註四十）早就被捕，硬是不開口，硬軟都挨過了。但見了老蔡，蔡孝乾對他說：「說了吧，三個月的感訓而已。」李蒼降沒有到過大陸（註四十一），沒有見過大場面，既然蔡先生這麼一說，他就把羅東、基隆的關係交了。洪幼樵又偏偏記性那麼好，全省近一千黨員，那一個支部有多少人，都沒有忘掉，這才逼壞了那些中下級幹部。

下來就是洪國式的案子，選的正好是十月一日。他們的案子（槍決）九個人，包括台中的江博士（註四十二）。有位廿六歲的（前東南長官公署作戰部）上尉參謀劉全禮（安東人），他們似乎是約好的，穿得很體面，整整齊齊，那位郭秉衡（註四十三）中校穿了西裝，還開口言道：

「今天，天氣還算不錯」。

至於洪國式本人，沒有在那九個人裡面，九月廿七日的報紙早就有他「自新」的聲明。

關於洪國式，以後有緣在火燒島見過，論才氣與學識都是一位很突出的，或者是屬於瞿秋白那一類型學院派的悲劇角色。不過，他沒有機會寫下《多餘的話》，在改為綠島的那島上，教我們希臘哲學，手上只帶枝粉筆，把希臘哲學那雜亂的思潮，分析地很簡要，使人人可以接受。他應該屬於教書匠那一類的，亂世使他走到這一條路，浪費掉一個比蔡孝乾更難得的人材。他是後來以另一種模式走的，所以全案走的應該是十個人。

吳思漢是另一種典型。他與郭琇琮不同，更不像施部生，也不能歸於那位姓羅的那一型。他並不大肯定自己在歷史上的角色，但是對生命與死亡都是認真的。他是走台南一中（日據時代台南州立台南二中）台高、京都帝大醫學部的秀才路線的人。卻在畢業之前，遁走釜山，冒險渡鴨綠江而入東北，經過許多曲折，到了抗戰將快結束的陪都重慶，寫了一篇述志的文章旄「奔向祖國三千里」。三千里是指日本人的里，約等於四公里，即八華里，所以他的路程是一萬二千公里，約近於赤道的三分之一。與中共的二萬五千里也相差不多。

他當時就在七號押房，我有時候可以看得到。很少說話，一清早就穿得整整齊齊。但是十一月一日，我們離此到新店時，他仍在那裡。要有吳思漢、郭琇琮這等腦袋，不知十年是否能有一個。那是大量生產才子的年代，葉盛吉、陳震烈和戴振翹，也被家鄉的人稱為三才子。當你要他們走路，一顆子彈就夠了。所以有人深信，這是對台灣精英份子一次計劃性的肅清。 >> 待續

註四十 ◆ 蘆州人，李友邦將軍的姪兒，1950年10月14日與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同案槍決。

註四十一 ◆ 按：李蒼降曾於1946年到杭州高中就讀。

註四十二 ◆ 江德興，苗栗銅鑼人，郭琇琮的姻親，台中健元醫院院長。

註四十三 ◆ 福建人，保安司令部政工處科員。

## 文化廣場

**隔**天清晨起床，走出屋外，以剛學的西班牙語向印地安人及政治觀光客們道早安。

我們被邀請到村落一間公共廚房吃飯，水泥爐灶在戶外升起火，印地安男人看顧著材火，煮著蛋湯。屋樑懸掛閃爍的小燈泡，印地安婦人烙著玉米餅，炒著洋蔥與豆泥，而政治觀光客們像吃自助餐般拿著餐盤，趨前取用食物。過年後仍留在Oventic的政治觀光客以墨西哥人居多，他們有的還帶著年幼的孩子前來呢。吃完餐，排隊在水龍頭下洗餐盤。我們等待著EZLN的領袖通知我們會面。

會是誰來見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不確定。

傍晚，伙伴們被通知去等待。濃霧不散，白色霧氣中樹林根本看不清輪廓。小心翼翼爬著，我們來到山坡一間已然廢棄的工寮，傾倒的柱子已在斷面長出青苔，黑泥地留有之前篝火的殘餘。沒地方坐，坐在哪裡屁股都會濕掉，只好走來走去。等不到EZLN的領袖，索性再去附近撿些細材來，打火機及紙張，努力在陰冷中生起火——奇妙的火呀，祭典不可或缺的火苗，城市生起不來的火！被點燃後，旺盛燃燒，看著火舌席捲過深褐色的木材，亮出神秘的橘紅，大夥都伸出手迎向嘩波作響的溫暖。終於在黑夜來臨之前，火苗竄升間瞧見兩位游擊隊幹部，一高一矮，從霧氣深厚中走來。

他們穿著牛仔褲，蒙著面，站在坡地較高的位置，問我們有什麼問題要問？

伙伴們熱切地發問，由Carl及Ernesto將之翻譯成西班牙語；我想知道查巴達面對觀光以及個別買賣的態度？

濃霧中游擊隊幹部的話語，像是從遙遠的

外星球傳來，異常溫柔緩慢。「基本上，我們當然希望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分享，但是對於某些人私自去賣東西，我們也沒什麼辦法，只能努力將組織做得更好，讓教育更全面……。」我非常專注地聆聽，但感覺場景總有點超現實。寒冷而安靜的山坡只有我們幾個人，視野穿不透濃霧背景，世界彷彿只剩下篝火所能亮著的這一小塊山坡地。一高一矮兩個游擊隊幹部，樹幹般站立，蒙面的臉更增添神秘色澤。問答間，急切的去慢條斯理的回，火星飛舞間，我隱約看見矮小的那個幹部，像我一樣拿著筆記本，努力將問題記錄，說是要回去報告給查巴達改進。

## 十五、長征後，接下來呢？

當時那些提問，尚未明晰其後演變。我離開墨西哥時，查巴達的處境仍介於曖昧不明的轉變期，介於快要從地下組織正式浮出檯面的階段。福克斯競選總統時，政見之一便是儘速與契帕斯省的「亂軍」和談。而政府也確實在新年前後陸續釋出善意，但疑慮仍普遍存在。電視報紙無不以此為頭條。查巴達從一九九四年武裝革命以來，以退為進地在契帕斯省山區佈點、佈線，朝國際知名度推進，其支持度，在墨西哥市時隨便問一個計程車司機，便會從點頭中得到大致的取樣。福克斯上任後第二天，當國際注目的焦點放在墨西哥七十一年來首度的政黨輪替，（轉移，轉移）Marcos宣布了長征計畫。

從Lacandon叢林區展開為期十五天、走過十二個省分、三千多公里路的一步一腳印。從邊陲到中心逆轉的路線，當時我搭公車搭到屁股快要著火的漫長旅程，Marcos率EZLN成

員及查巴達相關組織，浩浩蕩蕩，在夾道成千上萬支持者送上茶水及感動之意的簇擁中，步行往墨西哥市。步行，以印地安原住民普遍貧窮的速度，踏踏實實昭告土地及神靈，昭告玉米田及咖啡樹，昭告黑夜與白晝，所有支持與反對的人民，查巴達要步行到總統府前發言！

那是二〇〇一年冬春之交，我已回台灣。然後在二〇〇一年三月十一日，查巴達的領袖們在近十五萬民眾的歡呼聲中，首次登上總統府前的講台，鎂光燈齊聚，Marcos說：「現在是福克斯及墨西哥民眾，聽聽我們聲音的時候了。我們在這裡，以反抗者的身分要求：民主、正義、自由！」而我剛好在島嶼鄉間吃晚飯時瞥見電視播放那樣人潮歡騰的場面，短短幾秒的國際新聞。

革命之後年年變化的情勢，水湧出後，渠道形成。

後來從網路閱讀到相關文章，我才驚訝的發現，原來那次長征，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葡萄牙作家薩拉瑪戈（Jose Saramago）、美國導演奧利佛史東（Oliver Stone）、演員勞伯瑞福（Robert Redford）、法國前總理夫人密特朗丹妮爾（Danielle Mitterrand）、法國農民組織者坡維（Jose Bove）、法國社會學家阿南·杜罕（Alain Touraine）……等都親自前往，表達支持之意。

雖然人在現場時我已約略感受到查巴達的國際魅力，尤其在San Cristobal時遇到來自各方的左翼白人青年，更體會到查巴達像是個「符碼」，但確知那麼多「名人」前去，仍有些驚訝。也許有機會U2也會去吧。但亞洲人呢？非白人呢？在地緣及歷史源流之外，有色人種在反全球化運動的發聲力量是否有在串連及拓展？還是仍處於全面接收的位置？

民主！正義！自由！Marcos身穿軍裝，戴著滑雪面罩，仍然斜背著象徵意味濃厚、陽

光下閃著銀光的子彈匣，他在演說時手拿墨西哥國旗，「墨西哥的三色旗，是我們原住民的旗子，紅色是我們鮮血的顏色，綠色是我們種植的作物，白色是我們的心智，我們的國旗是我們的作品，但是我們在自己的國家，卻沒有地位，從現在開始，讓我們為了爭取而前進！」彷彿可以想見Marcos向群眾揮出手勢，（前進——）而前方，和談將啟。

查巴達在多次公開的場合都再三強調，印地安原住民革命的目的不是要從墨西哥分離，而是要政府「承認」印地安原住民也是墨西哥的一部分。但「承認」、「尊嚴」、甚至「自由」、「民主」、「正義」等字眼所指涉的意涵，想像中也許氛圍相似，不過落到現實脈絡裡可就常被各自詮釋，各自詮釋的背後，各自權力及理念，甚至「革命」這字眼都曾經被屠殺墨西哥原住民的統治者「革命建制黨」使用過呀。

在我理解中，查巴達所提及的「承認」更具體的意思是，給予印地安原住民自治權——包括土地、文化及組織架構。查巴達提出了原住民法案。福克斯也迫於現實（現實是查巴達發出的聲音，已非政府所能強行打壓或視而不見），向議會提出隱含重新制憲的原住民法案COCOPA，但法案在議會裡幾經折衝，因為如果全照查巴達要求，印地安原住民自治區的資源開採權，要全部交還原住民——那不止威脅到墨西哥的富裕階層，更是對美國為首的跨國資本嚴重地損傷；商業利益已是民族國家政權背後最大的作手。因而，法案在議會討論，權力在交相鬥爭。

誰說和談的局面，比持槍攻佔城市容易？

墨西哥政府請Marcos去議會報告，一個持槍的游擊隊員去到議會，向那些穿西裝的議員報告？和談過程中，行為之拿捏。Marcos沒去，他在抵達憲政廣場後隔天，應社運團體

邀請，在演說中自行提出了當時媒體及人民都開著鏡頭關注的焦點，「我們已經來到權力的中心，且發現頭上被帶了花，但問題是，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在原住民法案仍在議會衝撞時，社會運動者Sam Ashman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只建立自由基地是不夠的，國家及資本無法像路上的障礙物，避開就好，若查巴達要繼續抗爭，他們無法獨自對抗自由經濟。一個有力的運動應當結合同樣深受其害的團體。墨西哥目前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人口位於貧窮線下（每日所得四美元以下），而百分之十五的人口過度富有。查巴達正面臨選擇，他們將選擇哪一條路我們不知道，但正如法國報紙（daily Le Monde）指出的，如何將印地安運動拓展到更為廣泛的社會及政治運動？將是查巴達接下來要面對的問題。

和勞工運動串連？和貧窮階級一起使力？該如何做？怎麼走？

離開現場後的我持續（並不積極地）注意著墨西哥的新聞。二〇〇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及二十八日，墨西哥參眾兩院分別通過COCO-PA法案，並沒有全部符合查巴達的要求。有評論者指責查巴達過於妥協（奮戰那麼久，不該只是這樣），也有聲音肯定印地安原住民長期抗爭後的初步勝利。但接下來呢？

接下來，死神難道已收起鐮刀？敵人難道不會在明晃晃的槍枝放下時，來個背地裡的偷襲？而對抗的姿態如何不失去準距？當查巴達被冠上冠冕，接下來呢？

## 十六、我想慢

回到島嶼，我坐在城市公寓堅硬的沙發椅度過手拿遙控器的尋常日子，沒錢裝無線電視，遙控器只有四個選擇。還好有公視。公共

電視播出國際新聞時會在片頭快速流動來自「世界」各地的短暫畫面——「世界」，於我童年電視不普及的鄉村，世界最遠的想像邊界，常暫停在台北。「世界」，於我報社上班後不得不成為虛擬國度的公民時，世界常由線路銜接得到、鏡頭獵取得到的訊息構成。我知道我的行動遲緩，尤其站在「發展列車」進站的月台，心底隱隱抗拒，猶如烏龜無言哀傷沙灘被水泥逐年攻佔，而心不甘情不願地仍舊回到出生地追悼。我所理解的世界，正往羚羊與獅子的競速前去！天黑後，短暫的休憩，獅子時常失眠，因為牠知道若是隔天沒有早點起床，羚羊可能會搶先跑走，牠就要餓肚子了，而羚羊同樣也苦於失眠，明天要如何趁太陽還沒升起、獅子還未動身前快跑。矽谷高科技產業的工作人員，慣用獅子與羚羊的比喻，強調速度的重要。「別讓孩子輸在起跑點」的廣告詞也普遍恫嚇。於是，地球成為獅子與羚羊踩在腳底耍特技的玩具，越滾越快，越滾越快，色彩斑斕地滾成灰色——連帶滾出一堆烏龜，被獅子與羚羊狂奔的蹄，狠狠踢去。

在南非的馬拉威、新巴威、尚比亞、賴索托……持續上百萬人處於嚴重飢荒營養不良的惡境；在中東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殘破不堪的廢墟黃沙般流竄著難民；在亞洲的越南、緬甸、寮國、印度……瘦黃的兒童在觀光區沿街乞討；而墨西哥市，這座人口一千八百萬的大城，因為企業超抽地下水正以每年2.5到5公分的速度在往下沉。

人類社會往富者越富，窮者越窮的方向失衡發展。

我想慢，（就安插我懶惰之罪吧！）我想慢慢的吃飯，享受食物之美味，坐在石頭上享受微風吹過肌膚時打心底的戰慄。我想慢，想好好的睡，沈入最深的夢底遊蕩。我想慢，想在颱風來臨前放肆的欣賞天地澄藍橘黃，大氣

魄的瑰麗伴隨著烏雲難得的氣勢。我想慢。盡量不往傾斜的一方發展；盡量不購買，盡量在城市滋生出千萬慾望如卵呼喚的視覺外，別過頭，想一個人於天地所要追求的到底是什麼？

從墨西哥回來之初，我腦中仍踩踏著印地安婦人的赤腳，瞧見百貨公司潔淨豪華的櫃臺前，女孩們為指甲衣服鞋子樣式考究再三，曾一時落差地覺得，好虛幻。

我想慢，但自覺個別理念無法逃脫物質基礎的牽制，我，一位女性，出生島嶼經濟大致已揮別吃不飽的年代，出生中產階級家庭，也逛百貨公司買衣服，因而才有餘裕坐在電腦前打上「我想慢」三個字吧？

貧窮缺乏「本錢」實踐著慢，但看看島嶼的情形吧，發展，難道必然重複著一條老路的錯誤？

建設、建設，如今我聽到建設就害怕。坐在車廂裡，雙手安放膝蓋，抬頭，注視窗外風景一站站經過——白鷺鷥被迫沿人類的交通路線不斷擴張、不斷逃亡地遷徙，這一站要蓋監獄，下一站要蓋警察局，下下一站是行政大樓，還有周邊腹地四通八達的商圈……，我從車窗看見競速的道路旁一小塊樹林，白鷺鷥在高速駛過的車燈旁低垂著族群認命的羽翼，不安的群居睡去；看見都市原住民在九二一大地震後，去到河邊徒手造屋，蓋出家園簡陋的違章建築，像墨西哥叢林山區的印地安原住民，位於現代社會的底層，且缺乏自然美景的撫慰。一站一站，車廂連結，誰在駕駛艙裡？我們搭上了「發展列車」，那感覺很像上錯了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前方已沒有任何出口，但不准回頭。

除了順從，難道沒有其他路可走？

.....>>

註三◆「大學炸彈客」卡辛斯基是哈佛畢業的數學教授，但後來多年隱居蒙大拿州一間沒電沒水的山中木屋，在那裡閱讀寫作，並郵寄炸彈包裹給世人，以宣揚他反科技的理念。可參閱《大學炸彈客》一書，Nancy Gibbs等著，黃裕美翻譯，聯經出版。



我想慢！但沒辦法像美國的「大學炸彈客」卡辛斯基（註三）郵寄死亡包裹給科學家，大聲喊，停，停止科技為權力作嫁，沒辦法自島嶼現有的運轉體系抽身，跳出來以身阻擋發展列車的蠻橫，我只是深切的體認到，當金融勢力主導著科技與資訊的發展，有些問題像地球臭氧層的破洞——在貧富不均的基礎上，問題叢叢地加劇。

紐約、非洲、阿富汗、巴西、塞爾維亞……，當墨西哥印地安人因為貧窮而在大自然裡餓死病死，回到相對富庶的島嶼，有車階級常在城市裡因停車問題而與人爭吵氣得半死；有職業的婦女常為愛情耗費著心力，夜歸時，更要恐懼青少年無處發洩的無聊與恨意；而青少年也無時不氣憤著警察仗恃公權力的威魄掃

蕩，還有那些位於貧窮線下的烏龜（這世界超多烏龜）；拾荒者在島嶼骯髒污穢的溝渠旁討生活。眾生相。各地差異著讓人類生活不快樂的因由，種族、性別、宗教、教育程度……當學習之旅的夥伴們去到墨西哥叢林學習印地安原住民為了免於餓死而奮戰，回到美國，他們要對抗的更大成分是在高度開發中國家生活所易於被纏繞的虛無。眾生相。地球各地的故事豐富多樣，但背後，像雲層背後，天空的破洞，權力結合著財富，壟斷在極少數人手中，是不爭的事實。

如同二〇〇二年五月出版的《如果世界是一百人村》一書中所說。書中將一封廣為在網路流傳的郵件，搭配圖畫出版。這封郵件是根據英國一位環境學者杜奈拉\_梅多茲（Donella H. Meadows）在報上發表的、將世界公民（The Global Citizen）縮小比例為「如果世界是一千人的村子」的現狀報告再簡化：

目前全世界有六十三億人口

如果世界縮小成

只有100人的村子

會變成怎麼樣呢？

這100人之中，

52人是女性，

48人是男性。

70人是有色人種，

30人是白人。

至於全村的財富

有6人擁有其中的59%

而且他們全都是美國人

有74人擁有其中的39%

有20人分著剩下的2%

至於全村的能源

有20人耗費掉其中的80%

有80人分用著剩下的20%

簡化後的數據統計，令人驚懼的現實。但

面對地球資源及財富巨大的失衡，電子郵件中僅消極地強調能收到郵件者的「幸運」，要人們不要抱怨，而只是溫馨地結尾到：「請發自心底的唱歌吧！請你去愛這個有你和其他人的村子吧！」——如此而已嗎？「愛」要如何具體落實？我討厭虛假的溫情表象。但身為這樣「地球村」裡的渺小一員，該採取什麼態度面對歸納出的大原則之下一個人吃喝拉撒睡的現實生活？在理念的推演與觀察中，我想慢的行動該是什麼？

## 十七、Zapatismo：查巴達提出問號

Zapatismo（查巴達思想）不是主義

不是教條的買賣

而是種態度——

開放且柔軟地發生在任何地方

Zapatismo提出問號

「什麼拒斥了我？」

「什麼孤立了我？」

每個地方的回答不同

Zapatismo陳述問題

並講明這些回答

是複數的

回答也包含在Zapatismo之內……

——節譯自Marcos的話

Zapatismo！

查巴達提出問號！

在學習之旅結束前，伙伴們回到San Cristobal，最後一夜，Carl帶我們去San Cristobal的PUB，僅一天之隔，我們從貧窮的印地安村落來到喧囂頹廢的地下酒吧。PUB的階梯狹窄幽暗，踉蹌的吸毒者、飲者及舞者在分貝張狂的小空間裡摩肩擦踵，拉丁舞曲搖擺著民族情緒。伙伴們也在擁擠的舞池裡伸直手朝絢爛的燈光劃圈圈。跳舞，跳舞。我坐到舞池旁的高腳椅喝啤酒，想起來到酒吧前，伙



伴們聚在Carl住處的工作室，學習之旅將結束，火爐前總結並期許。Carl說他想創造一個自由基地，有自己的電台及相通的社區，教育人成為真正的人，在他的想法中，「一個人應該要會煮飯、用槍、寫字、看書、照顧自己並與人溝通；而成為查巴達分子，其實就是成為一個『人』(To be Zapatismo is nothing more than being a human)。」Emmanuel補充提及網路，虛擬的網路連結很重要，那是由下而上對抗全球化財富權力分配不均的重要武器，而網路背後的真實也要在地蹲點經營，基礎力量發展好，網路一發聲，背後才不會是虛的。但我疑惑著，說不出大聲的我要做什麼。

城市不同於叢林，菸酒、音樂與毒品，當印地安人拿吉他面山清唱，回到地下酒吧，樂團在舞台邊抵禦商品炒作的邏輯。當印地安人為玉米的收成持槍武裝，大麻合法化的運動在街巷流竄。人之為人呀，原本尊嚴的角度簡單一致，但落實到各地方的個人顯然又像泥巴各憑手勁捏塑。隨興或嚴謹，進入體制或邊緣打游擊，廢的特質滲透著積極，外在環境牽涉著內在矛盾。遠道來墨西哥取經的左翼青年，和印地安人有著成長背景及立足點的差異，經驗或可借鏡，回返「平日」後革命具體的內涵是什麼？

Zapatismo!

查巴達提出問號！

在學習之旅最後一次討論中，伙伴們列舉出查巴達運動的特質，除了大量使用詩及象徵、具國際煽動性、去殖民化、落實村落組織、不走選舉路線等，再三提及的便是Zapatismo（查巴達思想）。我不確知該如何翻譯Zapatismo，因為Zapatismo的字眼難以圈圍。既非哲學也非主義，更不是條列的明文規定。隨著查巴達運動而廣為西方左翼青年接受

並傳頌的Zapatismo，若真要定義，可說是某種生活方式吧（Zapatismo as way of life），以人之為人，有尊嚴的活著所需要的基本需求而奮戰而思想，Zapatismo 提出問號：

「什麼拒斥了我？」

「什麼孤立了我？」

拒斥了、隔離了你我他，作為一個有尊嚴的人，吃飽、睡好、享受生命基本美好的權利？

問號！

問號衝擊墨西哥政府，衝擊美國跨國公司，衝擊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銀行，衝擊那些掌控多數財富的少數階層，同時也像浪頭打來般，我問我自己，短暫的叢林之旅帶給我什麼影響？

總是我想起那年新年在La Realidad，游擊隊員宣讀完革命宣言，說：「新年快樂！」新年快樂，伙伴們輕輕擁抱，站在草地上，迎向靛黑山巒堅定陪伴著村落，迎向時間剎那湧過來記憶洶湧。當音樂從舞台的擴音器響起，政治觀光客陸續退到涼亭準備欣賞印地安人赤腳跳起新年舞，我站立著，一時之間不想移動，是新年呀，地球繞轉，而我在此，肩膀仍留有伙伴們鼓舞的餘溫，耳朵仍迴盪著Marcos的話語，像是在親切的對我說：

「查巴達不只是為了瑪雅原住民的權益而奮戰，而是為了對抗自由貿易市場中的一支隊伍。我們就是你！Marcos可能是三藩市的同性戀者、南非的黑人、歐洲的亞裔人士、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者、以色列的巴基斯坦人、波士尼亞的和平份子……可能是一個沒有土地的農夫、一個失業的工人、一個不快樂的學生、一個單身女子走在十點過後的街道……。」

一個單身女子呀！Zapatismo！我想我不會忘記，在我生命困頓時，跟隨Estacion Libre的團隊去到墨西哥山區，認識了為理想

苦撐的美國左翼青年及查巴達民族解放軍的男女，實地觸碰大規模的貧窮，傾聽故事，世界——世界於我內裡彷彿一路隱晦地朝邊緣又跨出了些，外貌沒什麼變化，行為也看不出具體轉向，但那為愛鑽牛角尖的小女孩呀站起身來，意識到腳邊被框起的界線有些褪去的跡象。跨過經緯線，如今二〇〇二年又近秋天，我惦記著自己答應EZLN朋友們的承諾，那時迎戰飢餓的他們鼓勵容易虛無的我，去看看，去看看，世界會歡迎一個女子少點依賴、更無懼自在的勇闖！

當問號持續發聲，縱使大環境如此敗壞，縱使有生之年我們看不到烏托邦稍具雛形，但重點不在於我們能否「成功」的翻轉世界，而是在意識到現狀後，我們揉雜著歡欣挫敗痛苦與感動，對理想採取的行動與態度——黑暗中開出的花，像Marcos抵達墨西哥市憲政廣場後所說，接下來，接下來要在日常生活中，奮戰地綻放！

## 後記：

延宕好久，文章終於暫告段落。從墨西哥回來後，我投入家鄉選舉體驗所謂民主制度的粗俗及人際互動的鬥爭與感動。Emmanuel回到那間專賣中南美洲及原住民書籍的小書店當店員。Tim繼續當電腦工程師，很高興他結婚了。Carl在查巴達運動獲得初步勝利後離開墨西哥，回紐約居住。而Zenon去中國大陸念書，與我通了幾通電話，九一一事件發生後，他告訴我一個「笑話」——知道美國本地為什麼沒有政變嗎？因為美國沒有美國大使館。這其間，偶爾我坐在島嶼電視機前，看見反全球化運動出現西方青年熱血澎湃的畫面，心裡就會惦記起那些朋友，他們可能就在那群人當中吧！我們都像Marcos說的以各自的方式摸索著人之為人的種種，遇見契合的同志微笑點點頭。雖然局勢從未好過呀，但我堅信，夢想必然被磨難卻也從未消失過！◎

## 稿約

## 歡迎踴躍投稿

《批判與再造》旨在提供一個用左翼觀點曠觀寰宇、立足本地的公共論壇。我們歡迎引介世界思潮、評析國際與中國兩岸政治經濟形勢及社會文化現象、回顧反思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的文章，與反映社會現實的文學創作。同時也期望不同觀點之間開誠布公的論辯，以有助於釐清觀念、深化認識，促成左翼力量的團結進步。因此，我們衷誠盼望各方朋友來稿，充實《批判與再造》的內容，推動台灣左翼以至世界左翼聲勢的再興，抑止人類處境的進一步惡化。

我們的徵稿原則如下：

一·文字請力求簡潔扼要，一般以5,000字

以內為宜。

二·理論文章以10,000字為度，特殊狀況不在此限。

三·論辯文章務必觀點明確、邏輯嚴謹，秉持實事求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原則，切忌曲解論辯對手原意，或迴避論題，言不及義。

四·我們充分尊重所有來稿的觀點，但有時視編務需要，須在不損及作者本意下，酌情刪改。如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五·本刊因經費所限，無法提供稿酬，敬請見諒。

六·來稿請於每月十五日前寄達。

《新二二八史像》 編著◎曾健民 / 定價NT350

80篇歷史證書

首次大量出土新史料；事件當時大陸、香港報刊雜誌上的二二八評論、報導，以及詩、小說、創作

有初次公開的第一手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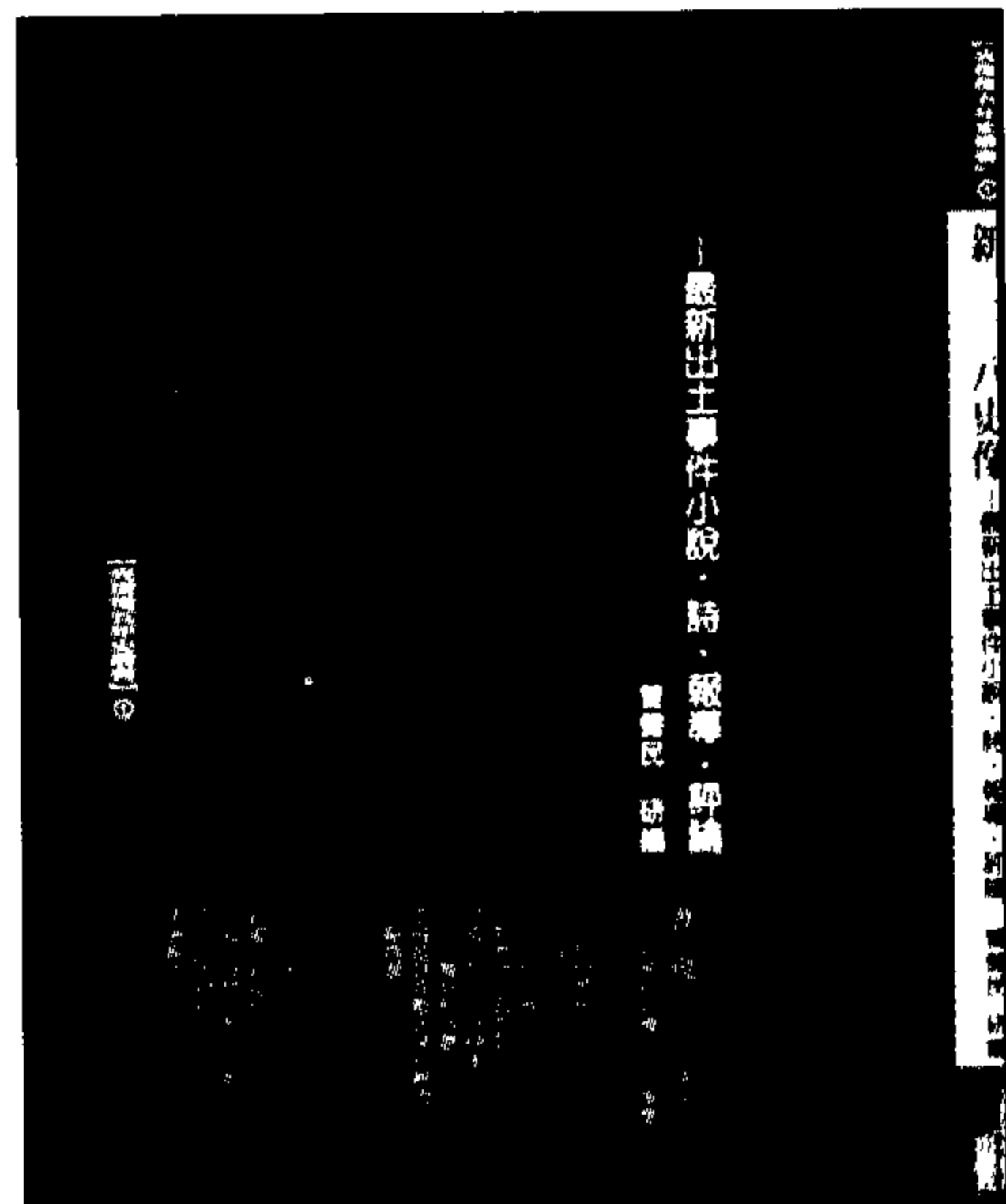
二二八女鬥士謝雪紅《告同胞書》

名記者范泉《記台灣的憤怒》

文匯報記者董明德《孤島一月記》

蘇新的《台灣的前途》

名作家郭沫若的《還要警惕著不流血的二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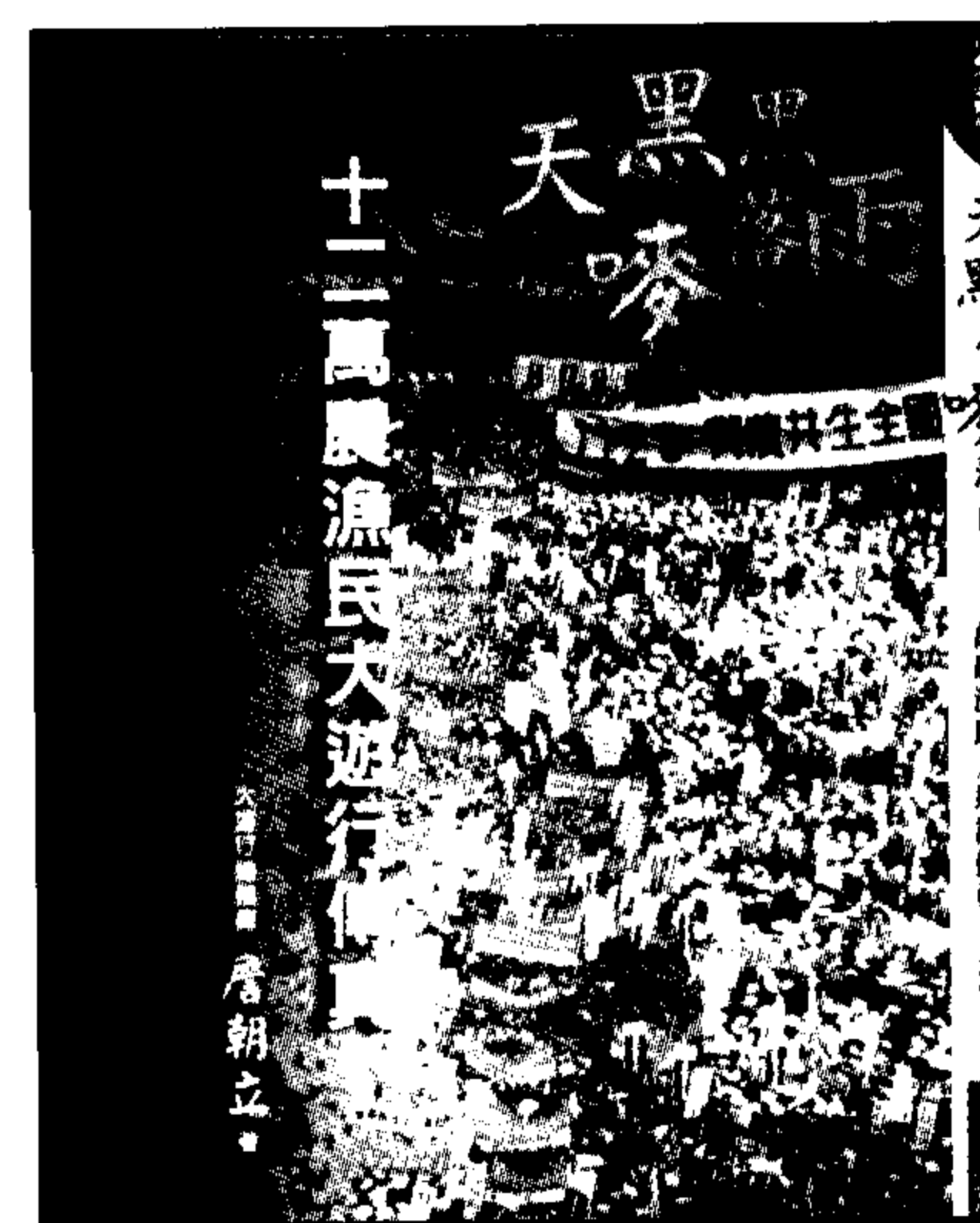
《天黑黑嘜落雨》◎詹朝立 / 定價NT350

——十二萬農漁民大遊行傳真

「1123·與農共生」大遊行總指揮詹朝立親筆力作

文化評論家南方朔推薦：

「這本著作，所記述的不只是一次大遊行的因果經緯而已，更是當今台灣農漁民和農漁會艱苦情況的紀實報告，充滿了理解與悲憫的抗議情懷。」



《走進台灣》◎周良沛 / 定價NT300

——光和影的心靈紀實

作者周良沛是一位大陸資深的進步作家，且在台灣有豐富的生活經驗。本書超越了兩岸的歷史糾葛和現實迷障，以更廣闊的視野和深刻的感情，用獨特的紀實散文風格，描寫了台灣生活底層中許多不知名的或知名的人和事。藝術地概括了九〇年代前後台灣複雜的社會變動中的光和影，有鮮明的時代感。



直接訂購 優待

郵政劃撥 / 19747069

■電話 / (02)87714051 ■傳真 / (02)87713801 ■電郵 / tssra@sinamail.com  
■地址 / 台北市敦化南路一段238巷2號2F

## 台灣戰後資本主義論 / 台灣社會性質論名著

□涂照彥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 四八〇元

從日帝獨佔資本與以地主、佃農制為主軸的本地資本間之矛盾，解明殖民地台灣經濟形成的過程與本質……

□劉進慶

《台灣戰後經濟分析》 三五〇元

從「公業」、「私業」雙重構造，官商資本的支配，對美日經濟的附從化剖析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一九四五～一九六五）的性質與構造……

□段承璞

《台灣戰後經濟》 三五〇元

探討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一九四五～一九八五）中官僚資本、集團企業資本，僑資、外資、中小企業資本，分析台灣外貿與產業構造的變貌……

□谷浦孝雄

《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 二五〇元

以六〇年代後高度成長的構造為焦點，解明做為美、日中心國家加工基地而發展的台灣戰後資本主義之結構……

□陳玉璽

《台灣的依附型發展》 二四〇元

分析深層結構轉化及帝國主義體系功能變遷，以解明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發展之機序，並批判地探討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的相應性……

□隅谷三喜男 / 涂照彥 / 劉進慶

《台灣之經濟》 三六〇元

刻劃台灣「獨裁下的成長」和民間經濟向海外擴展的勢頭。從農業、工業、勞動、金融財政、貿易和經濟體質，解明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的實相。

□Winekler等編

《台灣政治經濟學諸論辯析》 三八〇元

以西方當代保守派的、自由派的和激進派的社會發展理論，分析台灣資本主義的本質和結構，並交互進行各派分析之分析，檢視三派政治經濟學在台灣研究上的貢獻和極限。著名社會學者，除編者外，R. E. Barret、T. Gold、D. F. Simon之台灣資本主義論的總匯，向台灣在地社會學界提出無從迴避的詰問……

■杜繼平

《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 三八〇元

——統獨左右的上下求索

台灣戰後世代第一個接受完整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育的學者杜繼平，在科學對待當前大陸社會主義性質的基礎上，闡明當前台灣左翼應以克服民族在外力干涉下的分裂構造，追求祖國統一，並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揭發台獨運動的本質，批判郎中「左」派陳芳明知識上的荒疏，振臂呼喊「做一個理直氣壯的統一派」……

/ 本書要目 /

1. 從世界體系的觀點看台獨運動的過去與未來
2. 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
3. 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  
——評陳芳明的所謂左翼台灣史觀
4. 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
5. 從《台灣論》風波剖視台灣分離主義的奴才意識

凡 可享有以上書籍 優惠，郵撥時  
請填上訂戶編號。若須 則加收。

出版社  
郵撥帳號：一一七四六四七三 / 電話（〇二）二三二二二三五七